

天主教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林靜伶教授

總統國慶演說的語藝類型——以馬英九與陳水扁國
慶演說為例



研究生：謝孟哲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六月

摘要

國慶大會是我國每年重要的國家慶典，總統發表的國慶演說在國家政策、國家未來的走向上具有指標性意義。我國自 2000 年後至今，前後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兩次政黨輪替兩位總統陳水扁與馬英九，分別來自不同立場的兩個政黨。國家經歷政黨輪替的巨大轉變，同時也面臨兩岸關係的重要轉折。這樣的轉折也體現在總統的國慶演說中。

本研究試圖以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的國慶演說為例，以類型批評為研究取徑，探討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的語藝類型。其次，在國慶儀式的情境下，兩位總統在政黨立場、兩岸政策主張互異的情況下，兩位總統所展現的語藝類型與策略為何？最後，則要了解國慶儀式情境與政黨立場和總統的語藝間是否彼此產生影響。依此，本將探討以下問題：

一、來自不同政黨的元首在國慶儀式情境下，所表現的語藝類型有何異同？

具體而言，元首在其展現的語藝類型上，如何在實質、風格與組織上展現異同？

二、在不同的兩岸政策主張下，馬英九與陳水扁兩位元首如何在國慶儀式情境下，各自展現其語藝策略？

三、國慶儀式情境與政黨立場如何對元首語藝造成影響？

透過對兩位總統國慶演說內容以實質內容、風格形式和組織方式進行內在分析以及外在重大事件、國內情勢等外在分析後，發現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的五大議題上，國家主體意識不論在實質內容和風格形式上都受制於國慶情境，實質內容上在外交、兩岸關係和內政議題上出現差異。風格形式除國家主體意識外，其他議題兩位總統都有多元的呈現，組織方式則受制於國慶情境而變化不大。

在國慶情境與政黨立場影響方面，發現總統在國家主體意識受制於情境，卻因政黨立場在論述上出現差距。兩岸關係議題兩位總統呈現方式也顯現出落差。

關鍵字：總統、國慶演說、類型批評、馬英九、陳水扁、兩岸關係

目錄

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目的	1
第一節 國慶演說的宣示與說服	1
第二節 國慶演說中的兩岸政策	3
第三節 政黨輪替與兩岸路線變化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我國元首演說研究	9
第二節 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研究	15
第三節 類型批評與其在地應用	25
第四節 小結	37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9
第一節 類型批評的適用性	39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文本選擇	42
第三節 分析步驟	44
第四章 研究分析	49
第一節 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國慶演說與內外在分析	49
第二節 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國慶演說與內外在分析	84
第三節 陳水扁與馬英九國慶演說的語藝類型比較	118
第伍章 結論與討論	122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22
第二節 討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127
參考書目	130

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一節 國慶演說的宣示與說服

國家元首所發表的演說或論述，對整個國家的政策或政治風向有重要的意義。在我國每年舉辦的國慶大會上，總統都會發表國慶演說，而這份國慶演說內容，從國家內政、經濟、外交到兩岸關係都有所著墨，除了對政府過去一年來施政成績的總檢討，也對接下來新的一年有所展望。國慶演說屬於一種儀式性的演講，足以勾勒出整個國家在過去與未來一年的施政輪廓，讓人民透過元首的國慶演說，得以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

元首發表國慶演說，不僅是對全體國民宣示國家重要的政策走向，另外一個目的，是讓全體國民將元首所宣示的政策和價值觀，試圖說服每一位國民，支持元首所提出政策與方向。因此，國慶演說可被看做是一項盛大的內化工程，例如過去威權時期，元首總是要國民相信，兩岸終究會統一，政府必將光復大陸。該怎麼在國慶演說的論述中打動全國民眾，將政府施政的價值讓人民能夠認同，是元首國慶文告最主要的目的。

元首可以將自己的信仰及價值觀傳遞給百姓，要求百姓接受、並持用，這是一種將原先僅具「個性」的價值觀轉化為「群性」價值觀的過程(葉啟政，1991，頁 236-238；紀慧君，1994)。

隨著時代演進，元首對國民進行政策性的宣示，已不止於國慶這種重大場合，可以透過廣播、電視媒體鏡頭，甚至是社群網站如：臉書…等新興媒體進行宣誓的工作。儘管時代和科技推移讓政府說服性的宣示得以多管齊下，不過在國家每年最重要、盛大的慶典上，元首於此發表的國慶文告，其重要性仍最具指標意義。

學者 Fairclough 表示，政治的差異就在語言的使用上，政治掙扎總有個部分在主宰語言的掙扎上。(Fairclough，2000；轉引自王齊賢，2006)因此，政治人物公開發表的語言中，多含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動機，國慶文告作為指標性的演說，當中的政治目的自然不在話下。

我國在走出威權體制後，個人擁有更多自由和信仰空間，不過在總統出席、發表演說的各種國家慶典場合中，國慶大會仍是我國最盛大、最正式的慶典，此時，總統在這樣盛大的慶典上發表演說，對國內民眾來說，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意義；對國外聽者或其他國家來說，總統在國慶大會上發表的演說，更是一種正式的、具指標性意義的語言。因此國家元首該在國慶演說中，運用何種言說策略重新凝聚國民，再進行說服至少讓多數國民都能信服，使宣示的效果達到最大化，當中元首所使用的言說策略和國慶演說中出現的言說類型，都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第二節 國慶演說中的兩岸政策

元首的國慶演說內容必須全面性兼顧，如前所述，舉凡國家的內政、對外的外交與國際關係、經貿政策以及軍事，其中與對岸中國大陸的兩岸關係，卻總是對我國各方面的政策有連動性的效果

武力的威脅是台海之間最大的「恐怖陰影」和「黑暗勢力」。目前海峽對岸有超過六百枚的飛彈瞄準台灣，平均每年以五十到七十五枚的速度持續增加，這是台灣人民及國際社會絕對不容坐視的嚴重威脅。（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頁 8）

前總統陳水扁先生在 2004 年的國慶演說上，提及來自對岸中國大陸的飛彈威脅。用「恐怖陰影」和「黑暗勢力」形容對岸的武力威脅，不僅透露出當時緊繃的兩岸關係，在如此緊張的氛圍下，陳水扁先生在國慶文告中帶出國家當前的國防政策，對岸始終不放棄以武力犯台的想法，讓我國家安全飽受威脅，長久以來我國的軍事政策制定，始終以中國為最大的假想敵，兩岸關係的穩定，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有緊密連結的關係。

今年 6 月臺灣與大陸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已經在 9 月 12 日生效。這是兩年來兩岸最重要的一項協議，為兩岸經濟合作開創新的里程碑，我們沒有開放大陸勞工與新的農產品進來，反而為臺灣農業、傳統產業與服務業爭取到新的商機，早收清單部分即可創造 6 萬個就業機會與 1,900 億元產值，讓臺灣加入亞太經濟整合行列，免於邊緣化，同時加速國際化。（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頁 4）

兩岸政策議題同時也和經濟互相連結，馬英九總統任內積極推動和對岸簽署的經濟協議，成為當時國慶文告中關於經濟議題的主軸。我國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因素，與中國大陸關係的發展越加密切，兩岸關係發展的平穩於否，在在都牽動我國其他政策的走向，面對武力威脅的挑戰、全球化經濟競爭下是否遭邊緣化的危機、以及日益緊縮的國際外交空間，來自對岸的因素都參雜其中。

兩岸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往往也在我國元首的國慶文告中，佔有舉足輕重

的位置。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以大國崛起的姿態快速發展，並在近十年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快速發展也帶動中國的國際地位跟著提升，滿懷能量的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比過去更加投入。隨之而來的卻是讓周邊國家一陣緊張，過去擱置已久的南海主權問題、釣魚台衝突重新被點燃，對周邊國家來說，充滿動能的中國卻像是一隻張牙舞爪的獅子，隨時準備出閘。

然而對我國來說，海峽兩岸隔海分治超過一甲子，兩岸關係上遭逢的挑戰從不間斷，如今面對中國崛起，我國自然無法獨立於紛爭之外。「中國因素」對我國各方面的影響，未來只增不減，海峽兩岸的下一步該怎麼走，牽動國家的未來。

因此，本研究在元首的國慶演說文本分析中，審視馬英九和陳水扁兩位元首在兩岸關係上的論述為基礎，對總統在國慶演說上的語藝進行檢視。



第三節 政黨輪替與兩岸路線變化

我國在 1996 年選出首任民選總統，成為結束威權體制後重要的里程碑，2000 年總統大選，更成功締造第一次政黨輪替，由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贏得大選，歷經八年執政後，2008 年由國民黨籍候選人馬英九再度奪回政權。

短時間內歷經兩次政黨輪替，2013 年已經是馬英九總統執政邁入第五年。我國接連完成政黨輪替，寫下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新頁，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元首先後上任，卻也是對岸中國大陸崛起的時刻。

面臨兩岸關係新的轉折和挑戰，加上兩任總統來自意識形態迥異的不同政黨，在兩岸關係的詮釋上，長久以來支持台灣「統一」和「獨立」的立場就不斷角力。既然彼此立場差距甚大，意識形態的差異是否也會顯現在元首在國慶演說的語藝上，也是本研究關注的其中一個焦點。

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來自強烈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過去由國民黨執政的漫長歲月中，我國的兩岸政策從兩蔣時期的「一個中國」路線，到前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類台獨路線。陳水扁先生上台後，在兩岸政策上一改過去主張台獨的立場，反而在國慶演說上提出兩岸和解的基調。

個人也要再次呼籲中共領導人以宏觀的佈局，拋開過去僵化的思維模式，重新面對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例如，以人道的關懷，打開目前僵滯局面，同時以雙方共同的文化資產、對和平的追求、以及讓兩岸雙贏的渴望，在經貿與文化交流中，打開政治的死結，唯有以彼此相互扶持的情懷才能解開沒有必要的歧見。（總統府公報 6423 號，2001，頁 8）

作為我國首位政黨輪替的元首，陳水扁先生呼籲兩岸和解作為開創新局的的第一步，主張台獨的色彩反而在上任時放緩許多。然而在馬英九總統上任時首度的國慶演說，也採取相同模式。

在兩岸方面，海基會與海協會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重啟中斷十年的協商，化解兩岸對立情勢，開創和平新局，穩定東亞局勢，贏得國際社會肯定。我們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在開放鬆綁的政策指導

下，逐步推動包機直航、陸客來台觀光、小三通擴大及台商回台上市等，為海峽兩岸開創一個開放而穩定的新局。（總統府公報 6828 號，2008，頁 4）

打破僵局、化解歧見開創海峽兩岸新的關係，成為兩位元首上任之初的首要任務，兩位元首各自提出「以台灣優先」、「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當作論述主軸。過去對於兩岸關係的論述，向來就是一種文字遊戲，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元首的國慶演說中。

經發會達成有關兩岸政策的共識係秉持「台灣優先、全球佈局、互惠雙贏、風險管理」四大原則，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總統府公報 6423 號，2001，頁 8）。

陳水扁先生對於兩岸的經貿政策，在國慶演說上宣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目的在取代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戒急用忍」政策。到了馬政府時期，對於兩岸經貿政策的口號，轉變為「開放是常態，管制是例外」。

扁馬兩人對於兩岸經貿政策的態度，似乎都是以開放為大原則，然而在馬英九先生拋出「開放是常態，管制是例外」政策後，外界的解讀卻是馬英九將陳水扁政府時期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反過來用，變成「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經過這樣的轉換，雙方在兩岸經貿政策上的態度，似乎就走在不同的方向上。

本研究挑選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於國慶演說上的文本，希望探討不同政黨的總統在國慶大會的情境下，想要說服全國民眾是否會採取不同的言說策略，若是採取的策略不同，又會分成哪些類型？本研究希望透過語藝中的類型批評理論進行分析。

林靜伶(2000，頁 34)指出，特定語藝情境會引起人們某些共同的預期心理，以致影響言說者的語藝實踐，產生共同的語藝特性。類型批評的預設是語藝的情境會影響言說。

而總統的國慶演說作為一種儀式性的演講，最主要的目的即是向人民宣示、並讓國民內化、認同自身所提出來的政策。這樣「宣示性」類型的演說，形式和目的都相同的語藝情境下，但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元首的兩岸政策，即使是從相

同基礎出發，政策走向卻出現差異。

本研究希望透過語藝的類型批評分析總統國慶演說文本，但類型批評的核心概念強調「情境影響言說」，兩位元首既然都在國慶演說的相同情境下，以剛上任時的情形來看，言說的目的和基礎也都相同，但後來的兩岸經貿政策卻大玩文字遊戲，讓之後的政策走向大相逕庭，元首的演說因為身處國慶「宣示」的情境影響有相同類型的表現，但馬英九和陳水扁先生來自不同的政黨，同時抱持不同的政治立場，是否也讓本該相同的語藝類型，因為意識形態相左而出現差異？

學者 Campbell & Jamieson 認為，類型批評的概念是一種融合(fusion)，其形成還可以分成「實質形式」(substantive form)、「風格形式」(stylistic form)與「情境因素」(situational characteris form)。(Campbell & Jamieson, 1978; 林靜伶, 2000, 頁 36)。其中，對於「實質形式」和「風格形式」，林靜伶(2000, 頁 37)指出，實質形式和風格形式分別指「說什麼」、「怎麼說」，前者指意念或思考，後者指表現形式，也就是文字風格。除了觀看言者在實質與修辭上的作為，同時還得解析言者在文本當中的組織方式，若應用於元首的國慶演說中，將有助於了解這兩位不同元首在各自的國慶演說中的表現方式。

隨著兩岸關係發展越來越密切，與中國大陸的互動往往牽動我國各方面的政策走向，元首提出的兩岸關係政策路線，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元首先後上任，兩岸政策的路線變化和元首所傳遞出何種價值觀，是本研究所關注的另一個焦點。元首的國慶文告是國家慶典上儀式性的演講，透過宣示性的演說，對國民形成內化的作用，兩位元首所發表的國慶文告，到目前為止總計 14 篇，兩位元首擁有各自的論述策略向國人宣示政府的兩岸政策，希望藉由語藝類型批評加以歸納，了解十四年來我國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策走向變化。

本研究以「國慶演說」為主要架構，探討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的語藝類型，藉由上述的背景與動機介紹，歸納出以下三點研究目的：

- 一、以總統陳水扁與馬英九為例，探討總統在國慶演說中所展現的語藝類型與策略。
- 二、探討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在統獨立場與不同的兩岸政策主張下，各自於國慶演說中展現的語藝策略。
- 三、了解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國慶儀式情境與所屬不同政黨的立場為總統國慶演說的語藝帶來的影響。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透過文獻探討，試圖了解並回顧我國元首對於兩岸關係論述的語藝研究，從語藝的觀點切入，了解元首的語藝與我國兩岸政策的轉變。由於元首的演說形式多變，從儀式性的演講如：國慶、元旦到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或是總統公開道歉、危機處理等公共性的演說，本研究將從總統的語藝形成開始，針對元首公開演說形式和研究取徑進行分類探討。另外由於研究範疇置於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元首上，也將針對國內對於兩位元首在兩岸關係上的研究進行回顧，最後，也整理出關於語藝「類型批評」理論的實踐與發展。

第一節 我國元首演說研究

一、領袖語藝的形成

語藝的發展起源可追溯至希臘城邦時代，當時在民主制度的發展下，公民之間相互辯論作為一種參與城邦活動的表現。語藝從公共活動中誕生，隨後演變成公民實際參與政治的一種具體實踐，語藝從誕生之初就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

任何政治群體，只要不是處於失序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就需要一群公共事務的治理者，這是政治的必然；而這群治理者又需要有人作為其代表，這則是語藝的必然(游梓翔，2006，頁 7)。在這兩個必然交融下，整個群體之中才誕生了最高的代表和負責人，這位代表人物即是領袖。由於領袖是整個群體中唯一且最強而有力的代表，他所發表的公共演說即是領袖語藝(Leader's rhetoric)。

在現代國家中，領袖所發表的言論代表整個政府對外發言，甚至是代表整個國家和國民說話。孫中山在就職臨時大總統的宣言中提到「於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孫中山的一席話點出了領袖於群體乃至於到國家的重要性。

領袖站在一個言者的位置代表國家，受眾不僅僅是來自本國民眾，同時也是對外的窗口，他所宣揚的政策也有機會對外國人說話。在游梓翔《領袖的聲音：兩岸領導人語藝批評》中，認為元首的語藝通常是公開的、訴諸公眾的。領袖的

基礎終究來自本國人民，美國學者 Kernell(1997；游梓翔，2006)提出的「訴諸公眾」理論(going public)中表示，總統必須透過語藝來凝聚公眾對他的支持，以便消除來自立法和行政官僚的重重阻礙。一個國家由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的群眾組合而成，領袖作為言者，更重要的目的是透過領袖傳達出的語藝，達到說服和認同的目的，讓整個群體能夠凝聚在一塊。學者 Lewis(1997)年針對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美國總統電視演說進行研究，當美國總統遭遇內政和經濟議題的阻礙時，特別會透過電視演說將議題和政策訴諸於公眾。

游梓翔《領袖的聲音：兩岸領導人語藝批評》中，整理兩岸領導人在演說上的相關論述，其範圍橫跨一整個世紀包括兩岸五代共九位領導人，挑選一百篇演講進行統整分析，研究將焦點放在「群體意識」轉變上，因此在挑選文本時採用 Aristotle 的三分法為基礎，分別為司法演講、議事演講和儀典演講。其中儀典演講下又細分為就職演講、慶典演講和外交演講三類，文本內容以含有重大宣示、就職、慶典演講和重大事件過後的演講為選擇標準。研究者使用幻想主題對文本進行檢視，語藝的幻想主題認為，最終的幻想將有機會成為整個群體乃至國家的共同想像，呼應了研究所關注的群體意識。對於兩岸領袖如此大範圍的研究，作者透過語藝情境分析，呈現兩岸一世紀以來的政治變遷，領袖的價值觀影響兩岸群體意識的走向，一個海峽分隔的兩個世界觀，研究者透過領袖語藝的比較，更對比出兩岸間彼此的差異。

Van Noije, L & Hijmans, E. (2005；轉引自游梓翔，2006)在《法國總統的元旦演說對國家認同的影響》中，以法國五任總統的元旦演講做為文本分析，從 1958 年至 2005 年，分析法國歷任總統在元旦演說中的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為何。研究中發現，法國總統在元旦演說中帶有非常濃烈的情感訴求，用詞帶有豐富民族情感外，也常使用「優秀法蘭西民族」故事，即便歷任法國總統來自不同政黨，他們卻有志一同的在演說中強調國家認同的重要性。

從語藝研究的取徑上，想要了解文本中的語藝型態，則必須透過背後的歷史脈絡和框架。研究法國其後的背景發現，法國元首之所以會將國家認同當作每年

元旦演說的重點，是因為法國加入歐盟之後，深深感受危機感，害怕因為加入歐盟而喪失原有國家本質。元首在此時此刻的對外發言，即是希望凝聚並重新塑造法國民眾對自身國家的認同。領袖語藝的基礎即是建立在「說服」與「認同」上，只要缺少其一，領袖的語藝就失去意義。

領袖的公開演說已經被視為公共演說的一部分，隨著傳播管道的進步，電子媒體的興起更成為強力的傳播管道，我國屬於民主國家政體，元首得以執政必須經過四年一次的民主選舉考驗，現任元首若想連任，則必須和其他出馬角逐總統的候選人一同競爭，為了讓選民了解各候選人陣營的政策，同時讓候選人更加透明化，「總統的電視辯論」應運而生。然而，我國的第一場完整的總統電視辯論在 2004 年舉辦。總統的電視辯論歷史在美國則淵遠流長，可追溯回 1960 年代的甘迺迪與尼克森總統電視辯論，當時認為是因為電視辯論的緣故，讓甘迺迪得以贏得總統大選。元首在總統電視辯論上，不乏為了政策闡述、宣示自己的理念，由於透過電視對公眾進行播送，在這裡也將其納入元首在公開語藝的一部分，視為領袖的公共演說的一環。

溫偉群在《總統電視辯論：語藝策略與類型批評》一書中，認為候選人(言者)為了特定目的，對選民(受眾)採取各種策略訊息，都是屬於「語藝行動」(rhetorical act)(Campbell & Huxman, 2003，溫偉群，2007，頁 38)。這種為了目的而出現的語藝行動，另一方面也在回應當下的語藝情境。把電視辯論看作一種語藝情境，研究者用語藝的類型批評理論看總統的電視辯論，在電視辯論的情境下，言者的語藝行動也受到限制。研究引述了 Cicero(1986)提出的語藝五要項，當中包括構思(invention)、組織(arrangement)、風格(即用字遣詞，style)、記憶(memory)與表達(delivey)。此語藝五要項和前所述 Campbell 與 Jamieson(1978)提出的語藝融合概念類似，均有助於檢視言者在受限語藝情境下的言說策略。

溫偉群的《總統電視辯論：語藝策略與類型批評》中從 1996 年台灣首次進行總統直選開始分析，當時包括現任總統李登輝和連戰的組合外，還有三組候選人出馬角逐，當時舉辦華人世界第一場總統電視辯論會，時任總統的李登輝陣營

卻婉拒參加。到 2000 年總統大選，共有三組候選人相互競爭，不過總統電視辯論的提議仍付諸東流，由電視政見會取而代之，我國正式的電視辯論會一直到 2004 年才成功舉辦。研究者收錄了從 1996 年至 2004 年的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其中包含 2000 年的電視政見會，以語藝的類型批評分析，分成十四項辯論策略的類型應用與批評。研究最後發表三點結論，發現「語藝情境的類別是有限的」，使用 Aristotle 的三種論述情境分析已經不夠用。由於時代的進展與言者所處社會文化環境的不同，先前的語藝類型往往必須增加、或修正其類型描述，才能適應特定情境需求。(溫偉群，2007，頁 304)。不僅語藝情境受限，第二個研究發現連言者的回應也同樣有限，最後研究結論則是呼應類型批評的概念，即是「研究反覆出現的語藝情境類別，將有助我們了解相似情境下的回應策略」(溫偉群，2007，頁 304)。不過研究者強調，語藝的情境與言者的回應策略都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面對不同的社會文化必須時時做出調整。

法國學者 Van Noije & Hijmans(2005，p29；轉引自游梓翔，頁 12)指出：

(總統)擁有的符號職位使他的語言具有影響法國命運的能力，而他的想法也將可迴避災厄與促進繁榮。

領袖語藝的形成是人類在組織乃至國家的一種必然，領袖被賦予的高度與權力，讓領袖的語藝充滿力量，從我國對於領袖語藝的研究看出，元首的公開言論左右著群體意識的轉變，不過隨著時代的推移，領袖的語藝形式出現多元發展，卻因此遭受限制而亟需突破。

二、儀典演講

Aristotle 對於不同的論述情境將其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政治型論述」(deliberative discourse)、第二種是「法律性論述」(forensic discourse)與「儀式性論述」(epideictic discourse)。(林靜伶，2000，頁 34)。其中的儀式性論述概念則成為現今儀典演說的基礎。在一個成熟的組織中，人類發展出許多規章制度、儀式典禮，在組織舉辦的典禮中，形式為正式性且目的為慶賀或是紀念，在這類正式性的典禮上發表的演說，屬於儀典演講的範疇。

本研究所挑選的文本「總統的國慶演說」，亦屬於儀典演說的一部分，國慶是我國最大型的正式慶典活動，元首會在國慶日當天發表演說，除了對全國民眾表達歡慶之意，演說中通常還帶有強烈的宣示性質，以及對國家政策和未來的展望；由於本研究焦點置於我國元首於國慶演說上的語藝，因此在儀典演說的部分，以關注元首在慶典儀式上發表的演說為主，我國元首發表儀典演說的場合除了國慶日外，在元旦紀念日、總統就職典禮都會發表儀典演講。

慶典對一個組織和國家來說，具有相當重要意義，更是代表前進的象徵。如前所述對法國總統在元旦演說的研究，法國元首利用元旦演說對全民凝聚國家認同與團結，在我國的國慶和元旦也是如此，元首的慶典演說於此時訴諸全民，不分階級與黨派共同歡慶。不過這類的儀典演說論述，表現出的內容往往也是一體兩面，游梓翔(2006，頁 15)指出，儀典情境中發表的演講，處理的是透過符合或違反價值的某些人或事。儀典演講針對的是正在進行的事，演說者在此時提出某些人或事的價值進行頌揚，卻也對違反價值的人進行譴責。

組織發言人在典禮中的言行經常扮演著「表述」(expressive)功能，向聽眾傳遞組織文化的重要內涵(Beyer & Trice, 1987; Trice 1985 轉引自游梓翔，1999，頁 501)。在典禮中言者表述的內涵，若能成功傳達使聽者得以轉化，若無法則典禮演說就不具實質意義。「轉化」(transformation)是認同是否成功的關鍵，人類學者 van Gennep(1960，轉引自游梓翔，頁 502)指出，典禮的進行分成三個階段，分別為「分離階段」(separating)、「轉化階段」(liminal stage)、「整合階段」(integration stage)，典禮透過轉化功能的三階段而得以完成，但卻也限制了言者在典禮中演說的彈性。言者常以說明典禮作為開始，並在轉化完成後結束，即使演講者與聽眾的組成不同，只要典禮性質類似，演講內容及非常相近(Perlman, 1998; Rybacki & Rybacki, 1991)。

紀慧君《我國元首論述中價值觀之呈現與轉變—民國三十九年到八十三年元旦文告之語藝分析》中，以我國元首在元旦慶典中發表的元旦演說為文本，研究範圍從蔣介石到李登輝共四位元首，時間橫跨四十五年的時間。藉由威佛的論辯

分析理論，找出在長達四十五年的歲月中，我國元首價值觀的實際轉變，以及對於社會情境的回應。

研究結果發現，四位元首從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和李登輝，前三位元首在價值觀的呈現上呈現高度一致性，三人在元旦演說中，使用高達 70% 的定義論辯，不過這樣的情況到李登輝開始卻有所轉變，李登輝使用情境論辯較多，研究者分析語藝情境後認為，到李登輝就任後，因應內外政治和現實因素的轉變，也影響到元首在元旦演說中的語藝策略。紀慧君(1994)指出，四位元首論述過程，從漢賊不兩立到漢立賊也立的務實外交，從反共復國到兩岸共創雙贏，從復興基地到台灣經驗。研究結果說明，在慶典演講中元首處於相似性一樣的語藝情境下演說，其相似性也相當一致，然而受到社會文化變遷的影響，言者必須回應這樣的變遷，才讓後期元首的語藝策略出現調整。

紀慧君針對元首的元旦演說進行縱向長時間的統整研究，但四十五年的時間內，三分之二的時間我國都還屬於威權統治底下。因此研究者使用中國的傳統的社會價值觀「五倫」，來形容領袖於此佔有的權威性，然而，當時研究者面對的是不易變動的語藝情境，一黨專政、強人統治和面臨中共的威脅下，領導所關注的是統治的合法性。自民國三十八年遷台以來，在中共這個「存在危機」之下，政府不斷的將中國認同意識、領袖崇拜、恐共心理及同舟共濟等信念塑造成民眾的意識形態(紀慧君，1994)。與本研究相比，所挑選的文本時間範圍從 2000 年開始，當時的台灣已經實行民主化，且首度政黨輪替實踐兩黨政治，我國政治走出威權歷經重大改變，但不變的卻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挑戰，縱使兩岸已逐步由對抗走向合作，「中國因素」的影響力仍存在，生存危機仍未因兩岸緊張局勢緩和而消失，兩岸的局勢仍然波濤洶湧，走錯一步都將影響國家的未來。當語藝情境因素從單極走向多元，我國對兩岸政策的制定也不再是單一政黨說了算。而是需要朝野的合作與民間凝聚的社會共識，此時總統在儀典演說凝聚大眾，如何說服各方不同的聲音，是本研究要找出的答案。

第二節 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研究

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元首所提出的國慶演說文本，為本研究的主要範疇。兩人來自立場對立的兩個政黨，更是實現我國兩次政黨輪替的元首，兩位元首所處的歷史位置，是單極世界走向多極衝突的時刻，面對中國在這樣的時代崛起，台灣的生存危機從「被消滅」轉變成「被邊緣化」，因此兩岸政策的議題，在元首的國慶演說中的影響力更加巨大。再者，兩位元首的所屬政黨，對於兩岸政策也抱持著極大的差異。政黨以及元首對兩岸政策的立場，是否影響元首在國慶演說中的語藝策略，成為本研究關注的焦點。由於兩岸議題廣闊多元，在閱讀過相關文獻、書目後，在此分別初探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元首在兩岸政策上的發展過程，了解兩位元首在兩岸政策上的轉變，也將有助於探究兩位元首在國慶演說中，提及兩岸關係及政策上提供背景脈絡。

一、 陳水扁兩岸政策研究

陳水扁是我國首次政黨輪替後第一位總統，在我國民主進程上有極大的意義，對於對岸中國大陸來說，北京得和一個全新的、不熟悉的新政府打交道，加上是帶有強烈台獨色彩的民進黨，更讓中共當局感到不安。在陳水扁上任前，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就已經做出轉變，民進黨對於中國的政策，基礎建立於「住民自決」的觀念上。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放棄對台灣的擁有的主權，根據當時的，根據當時的中日合約卻未載明台灣主權歸屬，因此依據聯合國爭議領土處置原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國際規約」中，「對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藉著這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追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原則，採取台灣全體住民自決的方式。(徐銘謙，2001，頁 64)。

以「住民自決」為基礎，民進黨經過黨內路線的激辯後，在一九九九年於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並列出七大要項：

一、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二、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

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

三、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

四、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藉口

五、台灣應盡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民意志

六、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整合有限資源，以面對中國打壓及野心。

七、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了解與經貿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提出，成為陳水扁在競選 2000 年總統大選期間拋出「新中間路線」的基礎，外界認為當時民進黨就已經在為未來的執政做準備，2000 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順利贏得大選，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四不一沒有」的主張，內容為：

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總統府公報 6341 號，2000）。

陳水扁執政初期，北京當局對陳水扁政府有太多的不確定與不信任，發表對台灣領導人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聲明，陳水扁在上任後首度國慶演說中，向中國遞出橄欖枝，放緩過去強烈的台獨論調，強調兩岸必須和解、開啟對話。在陳水扁八年的執政歲月中，其兩岸政策卻有重大轉變。

陳思豪的《陳水扁政府大陸政策變遷之研究》以決策分析法，探討陳水扁政府執政期間，受到國際、國內以及個人因素影響，導致對大陸政策的轉變。研究結過發現，陳水扁政府執政八年期間，其大陸政策總共歷經三次重要轉變，從提出四不一沒有的為兩岸政策定調，在 2002 年拋出「一邊一國論」，推翻原先四不

一沒有的基礎，2004 年總統大選，陳水扁再度連任成功，對於選前曾經拋出制憲議題選後卻轉趨低調，甚至再度重申「不獨立、不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現狀公投及沒有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問題」，陳水扁政府的第二次改變，又回到了一開始四不一沒有的基礎上。

第三次轉變則是在北京當局頒布「反分裂國家法」後，此舉帶來重大的政治影響力，更刺激陳水扁政府再一次改變過去對兩岸政策緩和基調，在 2005 年 8 月 2 日接見「美國福爾摩沙基金會」上提出「中華民國四階段論」，強調「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陳思豪，2009)。

2005 年 8 月 6 日，陳水扁再度表達立場，提出「和解不退縮，堅持不對立」的兩岸關係準則(自由電子報，2005)。對於兩岸關係的下一步，陳水扁拋出「一個原則、三個堅持，五個反對」的立場。「一個原則」是保護台灣的主權，在民主、對等、和平的原則下與中共進行談話，「三個堅持」分別為「堅持民主改革的理想不會改變」、「堅持台灣主體意識的主流路線也不會改變」、「堅持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完整、進步、美麗而偉大的國家使命也不會改變」。「五個反對」則為「第一、堅決反對企圖併吞台灣，將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第二、堅決反對將台灣香港化、澳門化，將台灣變成香港與澳門第二的『一國兩制』；第三、堅決反對以『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為內涵的九二共識；第四、堅決反對任何分割國民主權、剝奪台灣人民自由選擇權利，而以統一為前提或唯一選項的『兩岸一中』或『一中憲法』主張；第五、堅決反對大陸要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反分裂國家法』」。

陳水扁政府針對中國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重新定調兩岸關係新準則，做出強烈的反擊，在 2007 年陳水扁卸任前最後一次的國慶演說上，仍不忘再度表達立場：

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國家的主權屬於 2,300 萬台灣人民，國家未來的前途也只有 2,300 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1971 年 10 月 25 日由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第 2758 號決議文，不但不曾確立

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也未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各自獨立的國家，這不但是歷史的事實，更是台海的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無權也無法代表 2,300 萬台灣人民，台灣人民有權要求在聯合國要有適當的代表，並以台灣的名義、以新會員國的身分申請加入聯合國。(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頁 2)。

陳水扁政府執政末期，已經一改過去遞出橄欖枝的姿態，轉而出現許多衝撞、措辭強烈的言論，然而中共始終堅持以「一中原則」處理兩岸關係，而陳水扁的論調並不符合北京期望，讓兩岸的政府在陳水扁執政八年期間，無法達成任何共識。

徐維憲《民進黨政府的大陸政策困境(2000-2008)》指出，陳水扁政府八年執政期間，關於兩岸政策相當多元，但推動上卻遭逢許多阻礙，在陳水扁 2000 年上任之初依新中間路線提出的「陳七項」，在陳水扁卸任後再度檢視發現，研究指出，幾乎所有的政見都未被徹底落實，執行進展有限，八年來兩岸關係仍在原地打轉，交流上僅止於經貿來往跟學術交流等民間交流，陳水扁顯然未達成當初其競選時的承諾(徐維憲，2010，頁 159)。

政策推動失敗，研究結果歸結出幾項因素，陳水扁政府執政初期對兩岸政策採取戰略性模糊作為，儘管走的是柔性路線，卻仍無法獲得北京方面回應，甚至加以打壓，壓力導致戰略性模糊無以為繼，其後轉向入聯公投運動，卻也無法得到執政黨內普遍支持，使得陳水扁政府的兩岸政策施行起來搖搖擺擺。其次，外部因素還包括了美中關係的改善、全球化經濟下經濟水平傾向大陸以及中共對台灣的排擠打壓，都成為兩岸關係停滯的重大阻礙；對外困難重重，對內卻受限於朝大野小的困境，與國民黨的政黨鬥爭、對兩岸關係路線的對抗，拖垮了陳水扁政府對兩岸政策施政的腳步。

邵宗海《兩岸關係—陳水扁的大陸政策》一書中，挑選陳水扁 2000 年的就

職演說、元旦賀詞和 2001 年出訪中南美洲友邦的敦睦之旅談話做解析，面對陳水扁政府兩岸政策上推行的困境，他認為陳水扁政府在制定兩岸相關政策時，初期所採取的模糊策略，遣詞用字保留不少解釋的空間。台北的大陸政策既模糊又捉摸不定，戰略性模糊的下一步，卻端看北京方面是否釋出善意（邵宗海，2001 頁 19-29）。這種單向性的兩岸政策，卻無法獲得北京方面的認同和共鳴，兩岸難有更進一步進展。

邵宗海在《兩岸關係—陳水扁的大陸政策》一書中，所檢閱的資料只到 2001 年，他在 2011 年出版的著作《新形勢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則有更多統合性的論述。他認為 90 年代後到陳水扁執政時期，兩岸已經從過去的對抗走向實質的協商，北京方面和陳水扁政府雖然在一中原則和台灣主體意識上，雙方關係降到谷底，但協商機制仍未完全停擺，例如兩岸包機仍是持續運作（邵宗海，2011，頁 10-11）。陳水扁政府的兩岸政策，從一開始的四不一沒有，到一邊一國論，雙方卻越鬧越僵化，邵宗海認為這是兩岸間磨合的過程，這樣的進程一直到下一任元首馬英九政府執政後，仍在繼續進行。若以磨合的論點來看，陳水扁提出的四不一沒有政策是一種追求磨合的手段，甚至到後續拋出一邊一國論，執政末期關上協商大門，在國慶演說上宣示對兩岸經貿要採取緊縮政策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看似衝撞北京在談判上的紅線，卻也只是磨合階段的一種籌碼。（邵宗海，2011，頁 15-19）。

陳水扁在 2002 年 8 月 3 號用視訊的方式，向東京台灣同鄉會致詞時，突然拋出表示：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不能被欺負、被矮化、被邊緣化及地方化，台灣不是別人的一部分；不是別人的地方政府、別人的一省，台灣也不能成為第二個香港、澳門，因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簡言之，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總統府新聞稿，2002 年 8 月 3 日）

此舉立刻引發北京方面不滿，一改先前對陳水扁政府「聽其言，觀其行」的

態度，將他貼上和李登輝一樣的「台獨」標籤。

徐文興在《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語藝分析—認同與論辯》中，從語藝的觀點，剖析陳水扁在拋出高度敏感性的一邊一國論議題後，分析背後語藝情境的脈絡，以及陳水扁如何合理化一邊一國論的正當性。研究以語藝分析方法，並以個案取向為研究途徑，以陳水扁在八月三號拋出一邊一國論的言說、八月六號的澄清記者會以及八月三十號的媒體餐敘茶會，藉由三場言說分析陳水扁個人的言論以及各方反應。

研究由語藝視野及論辯分析兩理論切入，研究發現陳水扁選擇在面對東京台灣同鄉會的場合上發表一邊一國言論，主要是因為內部成員同質性高，有助於建構相當的語藝視野，並為後續引發連鎖反應，加上此並非正式場合，即使引發重大效應，言論也充滿彈性空間能夠在日後修正。陳水扁在談話中創造的新詞彙「一邊一國」，在陳水扁的「召喚」，及其他人的「複誦」下，逐漸產生認同，而進到陳水扁的語藝視野中(徐文興，2003)。與本研究相比，一樣是透過語藝取徑檢視元首的言論，相同的是探究元首在該語藝情境下，運用適當的語藝策略爭取聽者認同，然而該研究屬於個案研究，並採用論辯形式分析，無法說明在有限的語藝情境下，言者的語藝策略是否也受到限制。

從陳水扁執政前，民進黨對兩岸政策的形成，陳水扁從競選到執政後兩岸政策轉變以及遭逢的困境，慢慢梳理出在陳水扁政府執政八年期間，當時兩岸關係的相關脈絡，同時也對陳水扁政府的下一任執政者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上，有著連帶的影響。

二、馬英九兩岸政策研究

馬英九在 2008 年贏得總統大選，促成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身兼總統與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對於上任後兩岸政策的擬定，也早有一套藍圖。2005 年連戰與胡錦濤促成「連胡會」，達成五點願景共識：1、一中各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恢復協商；2、雙方協商出和平協議，包括軍事互信機制；3、雙方協商共同市場，經貿正常化；4、雙方探討國際空間問題；5、要建立兩黨交流平台。(馬

總統執政後的兩岸新局：論兩岸關係新路向，2009，頁 46-47)。這五點共識，成為馬英九在未來兩岸政策的基礎。

張榮恭《構築兩岸雙贏新局：國民黨政府大陸政策的理念與實踐》中表示，馬英九認為連胡公報是兩岸政策重建的起點，原本國共兩黨間的交流，瞬間升級成海峽兩岸間的互信機制，其中兩黨人士更達成三項共識：1、海基會改組後，中國海協會及發函致賀，自此恢復兩岸會函電往來；2、兩會復談後，本著「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原則循序漸進協商；3、促成馬英九承諾 7 月 4 日起，實施大陸居民來台旅遊及周末包機。(張榮恭，2009，頁 39)。

陳自創與紀碩鳴(2007)《走出崎嶇路—馬英九、台灣及兩岸新格局》一書中，對於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梳理出一套思想架構。馬英九在 2006 年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和當時執政的陳水扁總統舉行「扁馬會」，當時他對陳水扁總統提出兩岸政策建言，稱為「五不五要」。馬英九 2008 年贏得大選後，仍以此為基礎，「五不」就是陳水扁提出的「四不一沒有」論述，不宣布台獨、不改國號、不推兩國論入憲、不推統獨公投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問題。「五要」則為 2005 年連胡會簽訂的五個願景目標。2010 年馬英九接受中國時報的專訪中提到，兩岸政策的主軸，即為「不統、不獨、不武」(中國時報，2010 年 9 月 1 日，版 A2)。

邵宗海在《新形勢下的兩岸政治關係》書中認為，馬英九在選前就做出「不統、不獨、不武」的明確主軸，是希望藉由與北京維持良好關係下，讓大陸政策得以順利推動(邵宗海，2011)。這項核心思想，成為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中爭取空間的籌碼，一方面用不獨安撫北京也降低其他各國的憂慮，不統則是對內安撫民心，強調統一絕對沒有時間表，致力維持兩岸間的現狀發展。馬英九主政下的兩岸關係穩穩的站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對於兩岸經濟以及交流的重要政策，還有成立兩岸共同市場、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以及承認大陸學歷。此外，海峽兩會的復談以及簽訂的多項協議，也為馬英九政府在兩岸政策上累積不少能量。

在先經後政的兩岸政策施政原則下，馬英九一上任後即積極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推動上卻遭逢不少阻力。李允傑《ECFA 後的兩岸關係中》

中提到，簽署 ECFA 問題不大，困難不少。光是在兩岸於產業間利益問題，現階段中共已不再像過去為了服從「以經促統」的對臺戰略，可以完全配合台灣的需求，兩岸的經貿談判早已進入「寸土必爭」的階段(李允傑，2013 頁 87)。ECFA 的協商需要時間，同時還得面對在野黨對 ECFA 的簽定在國家主權議題上的質疑，直到 2012 年馬英九再度連任，象徵 ECFA 最後一哩路的「服務貿易協定」至 2013 年 11 月止，都仍在國會中卡關。以 ECFA 為中介平台，連結中國大陸和區域經濟的網絡一旦建構起來，將對外資與台商產生「磁吸效應」(李允傑，2013)。ECFA 既為兩岸共同市場的具體實踐，更是台灣加入世界區域經濟的重要一環，但推行過程複雜且爭議不斷，想要完成簽訂果真如作者所形容「問題不大，困難不少」。

2012 年馬英九連任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對於兩岸經濟政策的推動仍在如火如荼推進，曾在連胡公報中的其中一項願景「簽訂兩岸和平協議」，也被視為馬英九政府在先經後政政策中第二任的施政焦點，在馬英九政府甫上台之際，兩岸間的交流之所以能順利的恢復，除了站在九二共識上的基礎，其次便是在「擱置爭議」上取得共識。若兩岸從單純的經濟交流，想要跨進政治談判領域的「深水區」，實踐簽署和平協議的願景，就不能再將爭議視而不見。兩岸自 1949 年分治，國民黨認為這是因國共內戰所導致的歷史事實，絕對不能刻意忽視。但若想要處理「內戰」遺留下的問題，是屬於國家內部事務，並非國與國之間的條約簽訂。(齊康玲，2010)。兩岸只要簽署「終止敵對狀態協議」，是被規範在一個國家兩個交戰團體所簽署的正式文件，既有其公權力的效力，又不會被國際誤解是兩個主權國家所簽訂的「協定」或「條約」，實則北京當局最關注的焦點。(邵宗海，2000，頁 292)。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表示，兩岸政治分歧終歸要逐步解決，不能一代傳一代。馬總統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表示，習近平可的意思可能是希望盡快討論這些政治分歧問題，我方並沒有刻意不去碰政治問題，原則是「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等時機成熟了，有迫切性了，也可以提前討論。

(聯合報，2013 年 10 月 28 號，A4 版)

在 2013 年 10 月 27 號召開的兩岸經貿論壇中，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會中提到，兩岸目前已經從先經後政，進行到「經中有政」，面對北京當局對於政治性議題談判的聲聲期盼，兩岸是否踏入政治談判的深水區，無論是和平協議或終止敵對協議該怎麼簽署？絕對是馬英九政府第二任期最大的挑戰。在陳忠賢《馬英九政府大陸政策制定因素及具體實踐》中，對馬英九政府第一任期大陸政策的面向與內涵做出六點結論：1、依照「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原則；2、認同九二共識，內涵解讀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3、排除兩國論與一邊一台，明確兩岸非「國與國的關係」；4、主張協商制度化及擴大兩岸交流；5、先經後政的兩岸交流思維；6、提出活路外交策略，呼籲外交休兵。(陳忠賢，2010)。

齊康玲《馬英九政府大陸政策之研究(2008.5~2010.5)》中結論認為，雖然馬英九上台執政後，被視為兩岸開啟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契機，但兩岸之間對於政治方面歧異性仍然巨大，馬英九政府以擱置爭議的方式創造出自己一套的「模糊空間」，但面對大陸仍不放棄武力犯台、上千顆飛彈瞄準台灣的局勢，兩岸想要達成和平協議，在武力對抗的陰影下顯得虛幻而不真實(齊康玲，2010)。

三、小結

從陳水扁政府到馬英九政府上台執政，藉由以上文獻梳理出我國在這兩任元首中兩岸政策的演變以及大致的脈絡，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元首在制定兩岸政策時，不單單只是因其政黨理念或立場而出現差異，兩岸關係也不僅僅只是台北與北京的較量，而是受到美國、台灣和中國三方互相牽動下的結果。夏志芳《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對美、中、台關係之影響》研究發現，陳水扁政府在任內走向獨立之路，引起美中雙方各自不滿甚至是亞太地區的區域緊張，使的扁政府在八年任期內兩岸關係逐步遞減緊縮。對於馬英九政府上台後，由於研究只到 2010 年為止，其結論仍相當保留。強調兩岸關係即使要改善，美國因素仍然相當重要，兩岸要改善，還是必須要透過美國，所以沒有美國這個中間腳色，兩岸是不允許自己改善，因為「美國與台灣也是有關聯的」。(夏志方，2010)。

王美華(2009)在《馬英九政府與陳水扁政府的大陸政策比較研究》中，將兩

位元首的大陸政策進行比較，但由於研究時間僅餘馬英九政府第一任期甫上任一年多，在比較的資料尚有諸多不足與限制。研究發現，從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到馬英九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轉變，同時在兩岸經貿政策上，從緊縮走向開放，已經是不可逆的事實。未來不管是否再次經歷政黨輪替，兩岸間的開放是共同的結果，不過面對可能的政治談判，卻依舊充滿變數。



第三節 類型批評與其在地應用

一、類型批評

本小節將重點放在 Edwin Black 所提出的類型批評與主張，本研究認為類型批評在面對語藝情境與言者的回應策略上，將有助於了解總統在國慶演說中，所採取的言說策略，在了解類型批評的相關應用和理論之後，將在下一章節討論類型批評在本研究的適用性。

類型批評概念最早來自 Aristotle 的語藝情境分類「法律性」、「儀式性」、「政治性」三類。學者 Black(1965)則是最早提出類型批評概念(*generic criticism*)，類型批評透過當下言者所處的「語藝情境」與所做出的「回應策略」構成整個語藝行動。Black 提出類型批評具有三要點，第一、言者所涉入的語藝情境是有限的；第二、言者處於某一語藝情境下，其回應策略是有限的；第三、重複出現的語藝類型，有助於語藝批評者對類似語藝情境下的語藝回應的了解(Black, 1965；轉引自林靜伶，2000，頁 34)。

林靜伶指出，特定的語藝情境會引起人們某些共同的預期心理，以致影響言者的語藝實踐，產生共同的語藝特性(2000，頁 34)。語藝情境給言者帶來極大的限制，因此當言者都處在特定的語藝情境下，受到相同情境的限制下，所能做出的回應也極為相似，甚至是擁有共同的特性。Hart & Daughton(2005, p 116)對類型下定義，「一類擁有重要結構與內容相似性的訊息；而這一類別產生了聽眾的特定期望」(Hart & Daughton 2005, p 116，溫偉群，2007，頁 115)。Hart 因此以美國總統小布希的就職典禮為例，認為總統的就職演說就具有類型文本的共同特質，因就職演說每四年就舉辦一次，同樣的情境一再的發生，因而構成一種類型。(溫偉群，2007，頁 115)。

Harold Zyskind 早在類型批評一詞但生前，於 1950 年使用 Aristotle 的三分類法研究美國總統林肯的蓋茲堡演說，探究林肯的演說究竟屬於儀式或政治性的演講。在 Black 的類型批評概念提出後，後續的語藝學者認為，類型的概念不單單只是情境與言者的單純連結，學者 Campbell & Jamieson(1978)在著作《形式與類

型：形塑語藝行動》(Form and Generic : Shaping Rhetorical Action)提出融合與內在動力的概念，認為類型之所以會形成包含三種因素：實質形式(substantive form)、風格形式(stylistic form)和情境因素(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三種因素的融合後的結果(林靜伶，2000，頁 36；溫偉群 2007，頁 114)。說明由於言者在情境因素的影響下，聽眾產生需求以及擁有預期心理，言者為了滿足聽者以及當下情境需求，對於演說中的實質形式以及風格則有所修正。實質形式和風格型對分別代表言者「說什麼」以及「怎麼說」，並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融合概念的提出，提示出了類型並不是因素間相互組合而已，而是在各因素間互動下產生的類型結果。

Foss(2004)對於類型批評的假設有更進一步的詮釋，從初始的類型批評假設看來，類型批評中言者所做出的語藝行動，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相當大。Foss 對於類型批評的假定為「一些特定的情境」，引發「受眾類似的需求與預期」進而召喚出「特定的語藝」，並不是「單一情境影響單一的語藝行動」，而是在「重複的語藝情境中發現語藝行動的共同性」(Foss，2004, p193；溫偉群，2007，頁 115)。Foss 進一步詮釋他認為類型批評中的三項要件：「情境要件」、「語藝的實質與風格特質」及「組合原則」。情境要件代表的是召喚特定語藝回應的情況；語藝的實質與風格特質則是指言者回應情境的語藝中，所呈現出的內容與形式；組合原則是闡釋 Campbell & Jamieson 的類型三因素，即是類型的實質、風格與情境如何組成「互相依存的特質」(Foss,2004, p193-194；溫偉群，2007 頁 115)。

二、類型批評的實踐

由各學者對類型批評方法的論點可以看出其理論大致的演進過程，林靜伶(2000，頁 37)指出，類型批評方法的具體應用，可以分為歸納法和演繹法兩種：

由歸納法出發的類型批評，通常是在文本類型尚未被建立前，研究者假設此種類型存在，林靜伶(2000)整理出以下研究步驟：

首先是從文本中觀察類似的語藝情境下相關論述，是否出現重複的語藝策略。在蔡鴻賓《衝突與回應：聯合報在三次退報運動衝突中論述之語藝類型》中，採

用類型批評的歸納法，試圖從聯合報中的社論、聲明、評論、特稿、讀者投書和調查報告，加以歸納出聯合報在退報衝突中的回應類型，分成直接回應、半直接回應以及第三者間接回應，再輔以 Cupach 提出的衝突策略進行敘事分析。

掌握語藝情境下的相關重複類型後，將出現的類似情境加以界定，並且蒐集並深入分析類似語藝情境下的論述，整理出重複出現的語藝策略，其中包括了實質形式、修辭形式和組織方式(林靜伶，2000)。找出以上重複的形式，極有可能歸納出文本中的語藝類型。

最後一步，則是將重複出現的語藝形式正式建立成為類型，包括前述的實質形式、修辭形式和組織方式，探究這三種要素中語藝情境與語藝策略間的互動關係(林靜伶，2000)。然而歸納只是一種類型批評的過程，林靜伶(2000)強調，更重要的是成功找出重複出現的語藝元素後，探討這些元素如何影響彼此甚至融合在一塊，再度呼應了 Canpbell & Jamieson 對類型批評的融合論述。

類型批評的第二種方法為演繹法，與歸納法不同的是演繹法是在某一類的類型已經被建立之後，研究者透過這類的類型來檢視自身文本出現的類似情境論述。例如從類型批評研究中衍生獨立出的形象修護策略，蕭羽潔(2009)在《政治人物之道歉類型與形象修護研究：以 2009 年八八水災馬英九政府表現為例》中，即是使用道歉語藝的類型與形象修護策略，對馬英九政府對救災不力質疑的回應做分析。

林靜伶(2000)指出演繹法的步驟，首先是描述某一個已經被建立的語藝類型中的語藝策略與語藝情境。有了已經建立的語藝類型供依歸後，第二步即是蒐集類似類似語藝情境下的語藝論述。在此研究者可能是為了以已經建立的類型來評估或了解某一類似的個案，也可能是以某些類似情境下的個案重新檢視某一既存類型的合理性或變遷(林靜伶，2000，頁 39)。演繹法的最後一個步驟，即是將分析結果與既存的類型特性做比較，檢視是否與原來已建立的類型相符合，並且解釋其相符或相異的原因。

對於類型批評方法的執执行程序，溫偉群(2007)將當代兩位語藝學者 Benoit 與

Foss 執行類型批評的程序進行討論，由於上述的歸納和演繹法已經是類型批評應用上最主要的程序，Benoit 和 Foss 則有不同的描述方式。

Benoit(2005)對於類型批評的程序有兩項，包括「類型描述」和「類型應用」，其中 Benoit 將類型描述又分為三步驟，分別是辨識界定特質、辨認類似性和解釋類似性。Benoit 認為想找出類型，得先設定類型當中的特質再從中尋找，例如一場演講中的主題或是形式，都有可能成為類型當中的特質之一。下一步即是觀察界定出的特質中，是否反覆不斷的在語藝策略中出現或是具有共同性。最後一步則是解釋這些特質在文本中產生類似性的原因。類型描述的方法即是「歸納法」的詮釋，而 Benoit 的另一個「類型應用」即是類似演繹法的程序，使用已經存在的類型解釋文本。不過在類型應用的三步驟中則包括了類型描述、檢測新文本是否符合已建立的類型、以及對新文本符合的類型進行評估。Benoit 認為實施類型應用前，還是需要透過類型描述的程序來產生類型，第二步驟即是對新文本進行驗證，與類型描述一樣，最後一步研究者必須解釋新文本與已建立類型的特質是否相符，若不符合已建立類型，則需要另外提出解釋。

Foss(2004)對於類型批評的研究程序，他將類型參與(generic participation)概念獨立論述，因此研究者將擁有「類型參與」、「類型描述」和「類型應用」三種分析方式。Foss 對於「類型描述」的執行步驟與 Benoit 有所不同，他認為其中擁有四步驟：1. 觀察對特定情境語藝回應的類似性；2. 蒐集發生在類似情境的文本；3. 分析文本來觀察他們是否擁有共同特質；4. 形成類似的組織原則(Foss，2005；溫偉群，2007，頁 123)。

Foss 強調語藝類型的要素當中，包括情境要件、語藝的實質、風格特質及組合原則。在 Foss(2004)獨立出的「類型參與」，他認為分析上分為三個步驟：1. 描述類型中情境的、實質的、風格的要素、以及組織原則；2. 描述特定文本中情境的、實質的、風格的要素、以及組織原則；3. 比較文本與類似的特質(Foss，2004；溫偉群，2007，頁 124)。Foss 對類型應用的程序與 Benoit 相比則多了一項步驟，在 Foss 類型應用四步驟程序中，前三項都與他所獨立出的類型參與相

同，第四項步驟是分析文本是否與類型的特質相符合，並且進行評量。

比較 Benoit 與 Foss 對類型批評程序的看法，儘管兩人在程序和步驟上各有異同，但相同的是，兩人都同意類型批評在建立時，必須透過歸納的方式建立文本類型，也就是透過類型描述的概念作為基礎；其二在已經建立的文本類型上，透過演繹的方法，應用至新的文本上；在對於研究者建立類型的過程中，兩人都認為，研究者須要能在文本中找到共同的特質，同時必須提出解釋這些類似性特質的說法。儘管在 Foss 的觀點上，他將類型參與獨立出來，但兩人對於在實際進行類型應用前，將新文本進行檢視是否符合描述中的語藝類型，是作為類型應用的基礎。

對於類型批評理論的緣起與發展進行探討，同時綜合近代語藝學者的觀點，類型批評從提出到發展至今，已經有將近四十年的時間。過去類型批評在美國的應用上，也多用於總統的就職演說和其他政治性的演說上，類型批評在本研究會如何應用以及其適用性問題，將在第三章研究方法進行分析，接下來將針對類型批評在國內研究實際應用上進行整理。

三、類型批評的在地研究

類型批評在國內研究的實際應用上，經常被應用於危機傳播領域中，當公眾人物或組織出現危機，則需要在危機的情境下做出適當的回應或是向外界致歉，希望能夠平息危機帶來的傷害。類型批評的概念也獨立衍生出「辯解類型」和「形象修護」理論。學者 Roseenfield(1968)提出道歉類型概念，並應用於對當時尼克森總統為自身競選經費辯解的「恰克演說」文本上，他提出所謂的「辯解方程式」(apologetic equation)，而後由學者 Ware 和 Linkugel 衍生出辯解策略理論，並實際應用於政治辯解案例中。這類道歉類型的語藝建構出一套完整的類型理論，在檢閱相關文獻後，針對國內類型批評研究在道歉類型相關的應用，主要分為「企業」、「政治」和「娛樂」領域。其次還有衝突類型、政治性的電視辯論類型，以下將挑選採用類型批評以及形象修護理論文獻依序統整梳理。

(一) 道歉語藝類型研究

(1) 政治面向

在國內道歉語藝類型的研究中，在政治面向上大多是針對單一政治人物引發的相關事件進行研究。如高菁黛(2001)以 2000 年總統大選總統參選人宋楚瑜爆發的「興票案」為例。以類型批評取徑切入，使用 Beonit 和 Brinson(1994)提出的形象修護策略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政治人物在事件爆發初期，通常是使用否認與閃躲兩項策略。

Beonit 的形象修護策略，歸納出在發生危機時，個人或組織該如何針對危機事件做出回應策略，因此在研究上被應用廣泛。應用於政治人物上的研究除了宋楚瑜興票案外，朱慧君(2002)則是從男性政治人物遭遇性醜聞事件為例，歸納出男性政治人物在遭遇性醜聞事件時，採取的主要策略與子策略，並得出相對應的結果。

其他使用形象修護策略並針對個別政治人物案例進行的研究，還有林幼維(2002)研究馬英九於台北市長時期，發生納莉風災中所採用的形象修復策略，或是吳錫河(2003)年則以謝長廷於高雄市長任內所發生的各項危機事件為例，研究謝長廷在危機中所採用的相關策略。

再者，不僅侷限於個人，還有在危機策略使用上的比較。如彭曉珍(2007)是以台北市政府為研究案例，但是以台北市政府前後兩任市長陳水扁與馬英九任內所發生的危機案例做比較，研究兩人帶領的市府團隊在面對危機時所採用的策略。

粘淑菁(2006)以 2005 年台北縣候選人周錫瑋與台中市候選人胡志強兩位競選人，於選舉期間發生的危機事件為例，探討情境、形象修護策略與效果的三者關係。同樣探討情境、形象修護策略與效果三者關係的，還有陳芳儀(2008)以陳水扁在總統任內的國務機要費危機為例，探討陳水扁總統於當時使用的各項因應策略。張正杰(2005)的研究同樣也是探討形象修護策略、情境與效果間的關係，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政府，挑出十年間其中兩項危機個案「捷運掀頭皮事件」與「邱小妹醫療人球」案，同樣使用 Benoit 的形象修護策略為架構。

在道歉語藝類型研究中，除了以形象修護策略作為主要架構外，另外還有加

人以辯解類型為架構研究。如唐青(2007)以辯解類型研究台灣政治人物如何道歉，並挑出個別政治人物進行分析。陳春富(2007)則是以陳水扁總統與當時在野黨領袖馬英九的電視演說為例，探討公共演說的傳播效果，主要以 Ware 與 Linkugel 提出的辯解類型為主要架構，對於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人在辯解類型的策略應用上進行探討。

最後，則是對於組織面對危機時的相關研究。歐振文(2003)以個案分析法的方式，針對政府公部門進行多項個案分析，以國軍單位為分析對象，分別評估在危機發生時，成功與失敗的因素所採用的策略。蕭羽潔(2010)則是針對馬英九政府在面對八八風災時的危機處理為案例，是用形象修護策略與道歉類型作為研究架構，探討馬英九政府在面對風災危機時各個時期所採用的形象修護策略。韓婷羽(2012)研究對象也是針對馬英九政府，個案則是馬政府在國光石化爭議上的傳播策略，研究以類型批評、內容分析與批判論述分析法為架構，分析馬政府在爭議事件中各個階段所使用的傳播策略，並探套其失敗的原因。

在政治面向中，國內研究分別針對政治人物個人、多人比較以及政府組織、單位在面對不同危機情境下，各自所採取的語藝策略，並不單單只探討其中的形象修護、道歉策略，也與當時情境做連結，探討其中的關連性。

(2) 企業面向

在企業面向上，國內研究也分別以個人、組織作為研究個案。游梓翔與溫偉群(2002)以璩美鳳偷拍光碟案為研究個案，研究結果發現當時刊登璩美鳳偷拍光碟和報導的《獨家報導》雜誌，在事件爆發後採用的是「否認」、「卸責」和「修正行動」為策略，另外曾經使用過「療傷」害「認錯策略」，卻出現矛盾的情況，導致在說服群眾上無法提供恰當的理由而出現瑕疵。

企業面向的研究中，大多都以企業組織為主，其中有三項研究個案都是以華航為研究個案，陳靜華(2004)以華航發生的三大空難，分別為名古屋空難、大園空難與澎湖空難為例，分別探討華航在這三大空難危機當中，分析華航個別採用的形象修護策略，發現華航在危機處理上已有長足進步。

胡珣苓(2004)以華航澎湖空難、新加坡航空空難兩項個案為例，比較兩家航空公司在面對空難危機下，針對補償與說明性資訊兩方面採用的策略為重點，探討兩家航空公司在危機溝通策略上的差異。

林柏婷(2007)同樣也是以華航三大空難為個案，同樣也是使用形象修護策略作分析，但採用的卻是媒體評價、聽眾評價與指控者作為評價指標，結果卻是認為在社會大眾的不諒解下，華航的形象修護策略是失敗的。

其中，也以媒體報導、評價作為切入角度的，是莊敬怡(2006)以杜邦鐵氟龍事件為例，研究中使用的是兩岸媒體所作的報導為文本，比較媒體在報導上對於風險認知、杜邦的危機溝通策略與媒體形象報導上的差異，探討危機溝通策略與風險認知交互影響下，對於組織形象的影響。

(3) 演藝面向

在演藝面向上，研究多是以個人為研究對象。莊智凱(2005)分析男女藝人在遭遇負面感情事件時，如何應用形象修護策略面對形象危機。使用的同樣是Beonit的形象修護策略為理論架構。最後將演藝人員與前述的政治人物進行比較，面對危機事件時，不會因為性別而產生差異，不過在對於形象修護策略的應用上，男女性間使用的策略仍有不同。

蘇靜芬(2007)則是以澎恰恰光碟事件作為研究例子，使用文獻分析法、敘事分析與深入訪談法，探討澎恰恰在光碟事件記者會中對於危機形象修復策略的使用，以及記者會後的溝通成效。

由類型批評方法衍生出的「形象修護策略」、「辯解策略」等類型研究，在國內大量被應用於政治、演藝以及企業所遭遇的危機事件上，演變出一套具有多面向的研究系統。在形象修戶和辯解策略的架構之外，國內仍有其他類型批評研究的實際應用。

陳香玫(1999)以類型批評方法為研究取徑，探討在衝突情境下的公開信類型。陳香玫關於衝突情境的研究，由於過去國內外少有公開信的類型研究，因此本研究是採用歸納法，整理出公開信於衝突情境下的相關類型論述。另一個關於衝突

情境的研究，則是蔡鴻濱(2000)探討聯合報自民國 49 年到民國 87 年間發生的三次退報事件為例，以類型批評和敘事批評理論為研究架構，再加上 Fisher(1987)的敘事批評觀點和 Cupach(1982)等人提出的衝突管理策略為立論架構，分析聯合報在這三次的退報運動中，所面對的情境共通性以及情境對聯合報回應的限制。

類型批評的研究，也應用於演講和寫作上。如溫偉群(2007)使用類型批評作為研究取徑，探討總統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中所使用的語藝策略。而對於元首在公開場合的語藝，其切入點與本研究較前述研究更為接近。

戴育真(2009)同樣也將類型批評研究應用於演說領域，以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的閩南語演講比賽為例，探討演講者在閩南語演說的情境下，演講者所使用的語藝類型。另在類型批評也被應用於寫作方面，陳聖雅(2009)以古典語藝理論作為分析架構，探討台灣坊間各時期出版的作文教材，以類型批評作為研究法，對作文教材以類型描述法進行歸類，再比較本土作文與西方在寫作上的語藝類型差異。

除了演講與寫作外，類型批評的研究也擴展到電視連線和表演等情境。王秋婷(2010)以電視模仿節目「全民最大黨」為例，採 Karyn Rybacki 和 Donald Rybacki 提出的幽默語藝觀點為分析架構，並以類型批評為研究方法，分析在節目中所使用的幽默技巧與語藝類型。

奚安鴻(2011)則是探討電視台記者在連線報導時的語藝類型，研究對象以 TVBS 新聞台為例，探討自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止的 107 篇報導中，從中歸納出記者在連線報導上所使用的語藝類型。

上述探討國內在類型批評上的各方面應用，包括普遍應用於危機發生時的道歉語藝、形象修護策略，衝突情境研究以及在演說、寫作和電視表演等方面，應用相當廣闊，其中又以演講、寫作等相關研究應用，與本研究所探討的總統國慶演說最為接近。

表 1：國內類型批評相關研究與應用表(依年代整理)

研究者	年代	論文名稱
陳香玫	1996	衝突情境下公開信之類型分析
蔡鴻濱	2000	衝突與回應：聯合報在三次退報運動衝突中論述之語藝類型
高菁黛	2001	政治人物的辯解類型—以宋楚瑜在興票案的辯解策略為例
溫偉群 游梓翔	2002	從語藝取徑評析《獨家報導》在璩美鳳光碟事件中的形象修護策略
朱慧君	2002	情境、形象修護策略與策略效果之關聯性研究：以男性政治人物之性醜聞為例
林幼唯	2002	危機事件中政府首長的形象修復策略與媒體呈現的評價：以台北市長馬英九處理「納莉風災」危機為例
歐振文	2003	形象修護策略之應用：國軍危機處理案例研究
林雅齡	2004	影響醫院面臨危機時所採取形象修復策略的相關因素探討
陳靜華	2004	企業危機之形象修復策略與學習效果研究—以華航空難為例
胡淑苓	2004	空難新聞報導之內容分析：一個危機處理的觀點
張正杰	2005	危機情境、危機反應策略及策略效果—以台北市政府「捷運掀頭皮事件」及「邱小妹醫療人球事件」為例
莊智凱	2005	演藝人員之形象修護策略分析：以負面感情事件為例

劉美玲	2005	NIKE 喬丹快閃事件之危機傳播與管理
莊靜怡	2006	風險認知、危機溝通策略與形象報導之關聯—以兩岸媒體對「杜邦鐵氟龍事件」的報導為例
郭俊男	2006	職棒簽賭在危機情境中的策略採用與效果分析
朱沛淳	2006	候選人競選期間危機傳播策略之研究—以 2005 年彰化縣長選舉為例
粘淑菁	2006	候選人競選期間危機傳播策略之研究—以 2005 年台北縣周錫瑋與台中市胡志強為例
彭曉珍	2007	政府危機溝通策略之研究：比較扁、馬兩市府團隊
林柏婷	2007	中華航空公司形象修護策略研究：以民國八十三年至九十五年空難事件為例
蘇靜芬	2007	演藝人員危機傳播研究—以彭恰恰光碟事件為例
溫偉群	2007	總統電視辯論：語藝策略與類型批評
唐青	2007	台灣政治人物公開道歉語藝研究
陳春富	2007	政治領袖公共演說之傳播策略與效果—陳水扁與馬英九「總統罷免案」電視演說個案分析
練書瑋	2008	危機情境、形象修護策略與模糊策略之運用研究：以馬英九台北市長任內之特別費危機為例

陳芳儀	2008	政治人物的辯解類型—以陳水扁的形象修護策略為例
梁惠娟	2008	政府危機處理之研究：一個辯解策略的運用
陳聖雅	2009	台灣做文教學探究—以類型批評為研究取徑
戴育真	2009	閩南語演講比賽之語藝策略類型：以全國語文競賽為例
李儼峰	2009	危機情境與危機溝通策略之研究—以陳水扁在扁案的辯解策略為例
蕭羽潔	2010	政治人物之道歉類型與形象修護策略研究：以 2009 年台灣八八水災馬英九政府之表現為例
王秋婷	2010	政治模仿秀之幽默語藝分析：以全民最大黨為例
奚安鴻	2011	電視新聞 SNG 連線報導語藝類型研究
韓婷羽	2012	危機情境、形象修護策略與效果之研究—以馬政府國光石化危機傳播為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小結

上述把文獻梳理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從領袖的語藝形成的過程，再連結領袖與儀典演講的關係，為後續的研究分析提供觀點。

領袖的位置為其語藝提供一定的高度，學者對領袖的定義為組織和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一種必然，領袖的高度與獨特性，使的領袖的語藝能具備巨大的影響力。領袖作為一個組織最高、最正式的領導者，再連結上述儀典演講的定義，儀典演講作為一個組織中最正式的演說之一，對整個組織乃至於國家，具有前進和團結的意義，透過組織中位置最高的領袖在儀典中發聲，使其成為一種絕對的高度和意義。以領袖和儀典演說結合的觀點來觀看總統的國慶演說，便能理解總統在國慶演說上發表的政策或宣示性的言論，是正式的且無法輕易取代。

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元首是本研究中設定的研究範圍，透過梳理兩位元首所提出的兩岸政策，為後續的分析提供一定的歷史脈絡與觀點。兩岸關係的演變，一直是牽動我國總統國慶演說主軸的重要因素，從兩位元首的兩岸政策可以看出，我國兩岸政策走向是一個從開放，緊縮再走向開放的過程。

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的語藝，本研究採用類型批評的取徑進行切入，其適用性將在第三章中進行分析，然而透過類型批評的在地應用發現，其中類型批評衍生出的形象修護策略概念，被廣泛應用到危機傳播領域，並實際應用於政府、企業甚至是娛樂界所遭逢的危機事件中。形象修護策略的多元應用，使的道歉類型的語藝分類提供完整的架構。除了像形象修護理論已經有完整發展，建立起一定的類型類目規模可供應用，在國內其他類型批評研究中，也有輔以其他理論新歸納出類型，例如蔡鴻濱研究聯合報在面對退報運動的衝突情境時，同樣也應用了陳香玫所歸納出的衝突情境類型概念，並自行歸納出聯合報自身運用報導、社論和讀者投書等文本，自行歸納出一套類型供應用。

溫偉群更透過專書、統整性的研究方式，綜合國內外的研究文本，將電視辯論的類型梳理出來，並實際應用到國內總統電視辯論的文本上。然而總統的電視辯論演說，在本研究中亦將其納入領袖語藝的範疇之一。在梳理國內眾多關於類

型批評實際應用的研究文獻後，溫偉群對總統電視辯論的類型概念，最接近本研究於領袖語藝的範疇。但關於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的類型，目前在國內類型批評的研究中仍是缺乏的，因此在類型分類的概念上，仍能依靠 Benoit 與 Foss 兩位語藝學者對於新類型建立的步驟與程序，獨立歸納出屬於總統國慶演說中的類型項目。

Benoit 和 Foss 也實際將其提出的「類型描述」、「類型應用」和「類型參與」等步驟，應用於政治人物的演講與其語藝上。例如 Benoit 就曾以類型批評方法，研究美國總統就職演說，他反覆閱讀的是 1961 年與 1997 年總統就職演說的文稿與錄影帶，在不同文本中梳理出共同特質，利用類型描述的步驟整理出「認知改變」、「訴求團結」、「辨認敵人」等六項共同點，並進入「類型應用」階段，後續更將建立的這六點類型，應用於 2001 年小布希總統的就職演說中(Benoit, 2005；溫偉群，2007)。

相較於國內對於總統在儀典演說類型上的缺席，Benoit 和 Foss 在總統演說的研究與分類則為本研究帶來基礎，但後續仍需透過類型描述等步驟，一一建立我國總統在國慶演說上的類型。正因為目前國內對於總統在儀典演說上的缺乏，本研究在類型批評的範疇中，如能成功建立關於總統國慶演說的類型類目，也將有助於補足這一塊缺乏的拼圖。

綜合以上文獻檢閱，本研究歸納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 一、來自不同政黨的元首在國慶儀式情境下，所表現的語藝類型有何異同？具體而言，元首在其展現的語藝類型上，如何在實質、風格與組織上展現異同？
- 二、在不同的兩岸政策主張下，馬英九與陳水扁兩位元首如何在國慶儀式情境下，各自展現其語藝策略？
- 三、國慶儀式情境與政黨立場如何對元首語藝造成影響？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類型批評的適用性

Hart(1997)對類型的定義，指出類型指的是一群訊息在重要結構和內容上有極大相似性，這類的相似性讓大眾產生某種期待，例如：總統就職演說、元旦文告、公開信和道歉。類型批評的研究者，對於這類重複出現的情境和語藝類型，在實際應用上 Foss(1996，轉引自蔡鴻濱，2000，頁 37)則提出以下理由：

1. 類型揭露社會真實

類型批評研究使研究者得以了解社會真實和語藝間的關係，因為類型呈現出的是社會群體具有特定思想模式，或是結構中的特徵，而這些特定的模式與特徵，正是社會發展中真實的指標。語藝類型反映出的不僅只是社會真實，同時也是社會中大眾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

2. 語藝行為的交互影響

類型批評研究者透過研究類型中的語藝行為(rhetorical acts)，了解各個語藝行為間如何交互影響，研究者藉由先前的語藝行為，也可得知對後來的語藝行為產生的影響為何，長期研究下即可探究在類似情境下，類型形成的原因和改變，語藝行為的出現與演變過程，也往往象徵一個文化實際變遷的最佳例證。

3. 增加類型分類認知

類型批評研究者透過實際操作，對於往後不同的類型批評取向以及實際分類上，得以有更多的認識，藉由不同的分類方法來分析文本，研究者所探詢的是不同的研究結果。藉由不同的類型歸類方式，也可以得知研究者對於語藝情境不同的認知角度

Hart(1997，轉引自蔡鴻濱，2000，頁 31)對於類型批評研究也提出五點預設

1. 類型模式(generic patterns)的發展

言者對於語藝情境數目的建立及回應方法是有限的，若是能建立許多不同的類型模式，將使的言者在溝通上更具效果。

2. 類型模式揭露社會真實

類型批評得以檢視在特殊語藝情境中訊息透露的普遍性(universal)，類型批評透過隱而不顯的訊息，尋找在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真實。但引起類型批評研究者關注的，卻是違反既定規範的「奇特個案」(odd case)。這些奇特個案因為打破既定規則，揭露類型形成過程中的理性(rationale)成分，類型批評不僅能揭示社會中普遍的真實以及另一中差異層面。

3. 類型力量(generic forces)的認知不明顯

大眾對於類型的存在並沒有特別的察覺，甚至認為類型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類型批評研究者將類型典範歸類、整理出來，將有助於閱聽眾透過這些類型典範上溝通。類型的存在雖然並不顯著，但當有奇特個案打破類型的限制時，才會特別引起閱聽眾注目。

4. 類型模式有助社會穩固(stabilize social life)

類型被認為是保守的(conservative)，類型將事物定於固定的一點上，加上閱聽大眾對於類型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在語藝行為上也遵守既定準則，如此都讓類型有助於社會的穩固，類型之所以形成和社會共識有關。

5. 類型模式影響後續認知

Hart 預設所有的批評者都是類型批評者，當研究者在接觸相關文本時，便已經帶入對類型批評的概念，並且會與自己先前研究過的文本進行比較。研究者對於接觸到的任何語藝文本，都會受到先前的語藝類型影響。

從 Foss 和 Hart 兩位學者對於類型批評功能性的觀點上，有許多認知是一致的，其中對於類型批評在社會真實的揭露，以及類型批評間相互影響的結論上，兩位學者的觀點有許多共通之處。然而在類型批評的概念中，語藝情境對於言者有許多的限制，其實是基於言者在情境中產生的語藝行為是帶有目的性的，言者的目的無非就是說服。Burke(1969)表示：「有說服的地方就有語藝，有意義的地方就有說服。」(林靜伶譯，1996，頁 190)。

在類型批評的功能和實際影響上，Foss 與 Hart 分別提出各自的看法，而再

回到前述 Black 對類型批評的基本三個假設：

1. 言者涉入的語藝情境有限
2. 處於有限情境下，言者的回應策略也有限
3. 重複出現的語藝情境，讓語藝研究者對類似語藝情境和回應也有所了解

本研究探討總統在國慶演說中類型，依據類型批評方法中，各學者對於類型批評的觀點、功能和應用，歸納類型批評方法在總統國慶演說文本上的適用性：

1. 國慶演說情境

國慶大典是我國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的慶典，總統也沒有例外，必須在國慶大典上對外發表國慶演說。作為言者的總統所處的語藝情境都是固定、重複且不易變動的。本研究以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元首作為探討對象，兩位總統在相同的國慶典禮情境中，其演說類型與實質、風格和組織方式是本研究探究的目標

2. 國慶演說與社會變遷

在過去的研究中，紀慧君曾以威佛論辯分析方法，探討我國元首在元旦演說中價值觀的轉變與社會變遷，在本研究中則是以類型批評方法的角度做切入。

Foss 和 Hart 均認為類型批評的典範能夠有效揭露社會真實，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的各項政策宣示，無論是兩岸關係、內政、外交和經濟政策，都必須對當前局勢和未來發展做出交代，透過對總統國慶演說文本的分析亦能回應和探究我國在這兩位總統執政歲月中，國家社會所經歷的變化。

3. 語藝情境的限制與行為

總統發表國慶演說的最大目的，在於宣示其政策，說服國民接受並希望藉由認同總統傳遞出的價值觀而凝聚在一塊。國慶演說中總統的語藝帶有強烈的說服目的，使用類型批評方法探究國慶演說中的語藝行為和情境限制，則有助於了解兩者間如何交互影響。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文本選擇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我國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的語藝類型為研究主軸，其中選擇研究對象為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總統。在我國歷任總統中，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在我國民主發展歷程上具有代表性意義。

陳水扁是我國在 1996 年開放總統民選後，首次政黨輪替上任的總統，他出身民進黨籍，結束長期以來由國民黨執政的局面，為我國寫下新的民主歷程。陳水扁代表的民進黨，一直以來具有強烈的台獨色彩，也讓陳水扁政府上任後主持的兩岸政策格外受到矚目，外界認為陳水扁政府的執政，對我國都將帶來不同的局面以及影響。歷經陳水扁政府八年執政後，接續的馬英九政府，則是實現了我國第二度政黨輪替。兩位不同政黨的總統前後上任，因為政黨立場的不同，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兩岸政策的論述與變化。由於兩岸關係對我國的各項發展影響極大，兩位總統的兩岸政策路線變化，也在國慶演說的類型研究中成為另一項關鍵因素。

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先後完成兩次政黨輪替，在我國民主發展史上具有其代表和獨特性。本研究以探討國慶演說的類型為目的，而類型批評預設為有限的語藝情境使言者的回應也遭受限制，但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因為政黨和立場相異，其在國慶演說中各自展現的語藝類型，是否會出現類型批評中所謂的「奇特個案」，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之一，選擇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作為研究對象，對於類型的比較和探究提供顯著的差異性。

二、文本選擇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以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總統，所挑選的是兩位總統在任內發表的國慶演講文稿，關於陳水扁任內發表的國慶演說從 2000 年起至 2007 年止共七篇；馬英九任內從 2008 年至 2013 年止共六篇，兩位總統合計共十四篇國慶演說文本。而文本取得方式是經由中華民國總統府官方網站上，所提供總統府公報的國慶特載專刊文字檔下載。

本研究以總統在國慶大會上發表的演說為研究主軸，然而在總統公開發表的儀典演說中，除了國慶典禮外，還有如總統元旦演說、總統就職演說…等元首的公開性儀典演講。本研究挑選文本已國慶演說，在文本研究的考量上，國慶演說雖然與元旦、就職演說同屬儀典演說，但國慶大會為我國每年固定舉辦的盛大慶典之一，元旦演說雖然也是每年固定發表，不過國慶大會舉辦規模較元旦演說盛大，加上總統於國慶大會當天發表的全國演說，聽眾不僅僅是全國大眾，當天與我國擁有邦誼的各國使節也會一同參與，即使國慶與元旦總統所發表的演說中，都有相當重要的宣示意義，然而國慶演說不論是對內亦或是對外，與元旦演說相近之下，國慶演說的規模和對內外宣示意義更為強烈。

若將國慶演說與總統就職演說相比，如同上述，國慶演說年年都會舉辦，而總統就職演說同屬公開、正式的儀典演說，不過卻是總統每一任期舉辦一次，兩者相較之下，國慶演說的文本量較為豐富，更能歸納出其中類型的變化，因此在總統公開性的儀典演說當中，選擇以國慶演說作為本研究的主要文本。

表 2 總統國慶演說文本與總統府公報字號

陳水扁		馬英九	
2000	總統府公報六三六二號	2008	總統府公報六八二六號
2001	總統府公報六四二三號	2009	總統府公報六八八六號
2002	總統府公報六四八五號	2010	總統府公報六九四四號
2003	總統府公報六五四六號	2011	總統府公報六九九六號
2004	總統府公報六五九九號	2012	總統府公報七零五四號
2005	總統府公報六六五四號	2013	總統府公報七一零九號
2006	總統府公報六七一零號		
2007	總統府公報六七六六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分析步驟

類型批評的分析架構包含「內在分析」與「外在分析」兩部分。內在分析是指對語藝文本的分析；外在分析則是針對文本的背景進行分析。語藝批評的過程以內在分析為主，但文本的背景即外在分析，卻提供瞭解文本與詮釋文本脈絡，因此也不能忽略(Foss,2004；轉引自林靜伶，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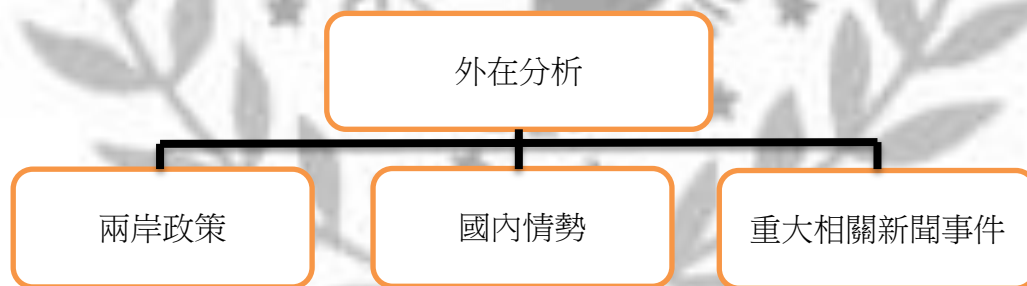
本研究以內在分析與外在分析為分析架構分別進行說明：

一、外在分析(external analysis)：界定國慶演說情境

Foss(2004)針對類型批評提出假設，即是特地語藝情境引發受眾類似的需求和預期，進而召喚出特定的語藝，並不是單一情境影響單一語藝行動，而是在重複的語藝情境中發現語藝的共同性(Foss，2004, p193；溫偉群，2007，頁 115)。

在總統的國慶演說文本上，對於國慶演說外在分析，本研究將影響國慶演說情境構成因素為分析基礎，分析架構如圖 1。

圖 1 外在分析架構



總統在國慶演說中，演講內容包含對兩岸政策、國內政策以及過去一年國內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都是影響總統於國慶演說內容的因素之一，國慶演說必須對過去一年回顧並對未來有所展望。

因此，影響我國軍事、外交、經貿政策甚大的兩岸關係，自然成為在國慶演說中的重要因素；其次，在國內情勢上，關於我國內政的發展如政黨互動或社會秩序的情況，或是近期即過去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如颱風、天災等等事件，都有可能影響國慶演說內容，也成為外在分析所考量的重要因素。

二、內在分析(internal analysis)

在 Foss 對於類型批評的實踐中，提出對類型批評的相關假設外，Foss(2004) 在類型批評的取徑上，主張研究者可以從「類型描述」、「類型應用」和「類型參與」擇其一為研究焦點。

本研究選用 Foss(2004)的「類型描述」作為內在分析研究的主軸，而 Foss 對於類型描述則有四步驟：

1. 觀察對特定情境語藝的類似性
2. 蒐集發生類似情境的文本
3. 分析文本是否擁有共同特質
4. 形成類型的組織原則

Foss 對類型批評的語藝組成要素，強調其中包含了情境、實質、風格以及組織原則，當研究者在解析文本的過程中，透過類型描述的步驟逐步歸納出文本中的類型時，便可進一步分析文本的實質、風格與組織方式上是否也具有共同特質。

分析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具體的語藝策略以及風格形式，並探究在國慶演說情境以及政黨立場對總統的語藝策略影響，本研究以 Foss 類型描述的為基礎，然而在 Foss 強調的實質、風格和組織方式中，於內在分析的執行步驟上，則以新亞里斯多德的語藝批評為立論基礎。

林靜伶(2000，頁 20)指出，新亞里斯多德理論主要有三點預設：

1. 演說情境是影響演說者的語藝策略的重要因素
2. 語藝批評應評估演說的效果
3. 語藝批評的累積有助於語藝理論的建立

新亞里斯多德批評的觀點，影響後世語藝批評甚大，預設中也同意語藝情境是影響演說者的重要因子。對總統於國慶演說中的內在分析上，新亞里斯多德批評則提出內在分析分成「論證方式」、「組織方式」和「文字風格」，與後續衍生出的類型批評「實質」、「風格」和「組織方式」觀點大致相同。

類型批評中，實質所代表的是言者在演說中實際的表達形式，也就是觀看言

者「說什麼」；風格則是言者在演說中的修辭呈現方式，可看作為言者「怎麼說」；組織方式則是言者在演說中如何鋪陳論述的形式和順序。

以新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論證、文字風格和組織方式等內在分析分類，與類型批評中的實質、風格和組織方式相對應，羅列出三者的分析方式。

(一)實質內容

根據新亞里斯多德批評提出的論證方式，本研究希望分析演講者在演說中的主要議題為何，在議題背後又提出那些論點與主張。新亞里斯多德對於言者針對自身論點的舉證上，提出藝術證明的三點概念，分別為人格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和理性訴求(Logos)。

藝術證明的三點訴求，在總統的國慶演說中也可看見相關舉證。在陳水扁總統在首度上任的第一次國慶演說中，就使用感性訴求的方式向全民演說。

從先民渡海而來的數百年前到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從最早的原住民族到無國界之分的網路世代，兩千三百萬同胞的血液之中，自有一股感同相容的「台灣精神」。(總統府公報 6362 號，2000)

陳水扁在演說中提出台灣精神，強調全國人民共有的連結，數百年來血濃於水的情感，試圖凝聚全國人民的認同與團結。在另一位研究對象馬英九總統上，馬英九則慣用理性訴求，演說中強調數字的篇幅居多，例如：

政府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成效良好，扭轉了過去八年的頹勢：一年來全國民眾節省電量 45 億度，相當於臺南縣市 187 萬居民的全年用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減少了 288 萬公噸，相當於 7,784 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馬英九在 2009 年國慶演說中提及環保議題時，為了彰顯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的成效，舉證出了用電度數、居民人數、減少公噸，甚至還把幾座大安森林公園當作比喻，其使用了理性訴求，希望讓民眾認同政府政策的成效。

感性訴求主要希望打動人心，拉近言者和聽眾間的距離。理性訴求則是用邏

輯推論方式，讓聽眾有所連結，使聽眾相信言者所提出的論點。在人格特質上，則是以公眾人物的特質為訴求，例如強調過去言者自身的經歷或經驗，讓聽眾得以信服。

透過論證方式的三點藝術證明，將解析陳水扁與馬英九在國慶演說中實質的論述方式，將有效歸納出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在實質內容上策略的異同之處。

(二)風格形式

風格形式或是文字風格，在演說中相對於實質內容，實質指的是演說中實際的論點，風格則是實質的表現方式，也就是將實質的論述修飾過後表現出來的結果。Aristotle 認為文字風格中最重要的是必須表達「清楚」與「適當」兩項要素，在本研究中，採取的風格形式以「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兩項為主。消極修辭在運用上有三大原則為：「準確性」、「明白性」與「適用性」。(轉引自游梓翔，1999，頁 188)總統對全國發表國慶演說，在修辭的應用上，必須讓組成素質多元的聽眾明白陳述內容，消極修辭的原則，符合本研究分析之文本的特性。

積極修辭相對於消極修辭，其原則為「有力」和「生動」。有力的原則包括語氣肯定、澎湃和情緒強烈等方式。例如陳水扁作為我國首度政黨輪替後第一位元首，在首度的國慶演說中，展現出其語言強度：

多年來，在臺灣歷經了戒嚴與威權統治之後，我們終於可以用民主的選票，驕傲地向全世界宣布：臺灣人民站起來了！臺灣真正融入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之中了！(總統府公報 6362 號，2000)。

在我國民主進程首度實現政黨輪替的歷史性一刻，用激昂的語氣宣告國家的民主進入另一項歷史階段，並驕傲的宣示人民和國家已然站起。因此在風格形式上，本研究將使用消極與積極兩種修辭形式，針對總統國慶演說文本進行分析。

(三)組織方式

Aristotle 認為演講者在演說中的組織方式，其架構應該包括四個部分：「開場」(open)、「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s)、「論證」(proofs)和「結論」(epilogue)(轉引自林靜伶，2000，頁 24)。

在實際應用上，並非全都依據 Aristotle 提出的四項部分。組織方式希望探究的，是演講中演講者對於所提出論點的鋪陳方式，以及在各個論點上如何連結。例如在國慶演說中，由於國慶的情境是固定的，不論是陳水扁或是馬英九在國慶演說上，開頭幾乎都為強調今年是民國第幾年國慶，並先對在場所有政要貴賓問好，結尾則固定以「最後，敬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各位嘉賓闔家安康！謝謝大家。」等祝賀語作結。

組織方式關鍵的是兩位總統在演說過程中，在演說中段對於其政策、經濟、外交、兩岸關係等政策論點鋪陳順序是否出現差異，本研究將針對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文本中，中段的各項實質、風格形式進行分析，並針對內容上的消極與積極修辭進行討論其語藝策略，歸納出這兩位元首在國慶演說中的組織方式。以下提出內在分析的架構圖。

內在分析架構 圖 2



在前述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的分析已足以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針對第二與第三個研究問題，本研究在外在分析部分，將會納入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在兩岸政策的比較，同時，於文本分析中解析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中陳述的兩岸政策，從實質、風格和組織方式等內在分析，和外在分析兩岸政策的主張配合，比較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情境中各自採取的語藝策略。

歸納出國慶情境中兩位總統的語藝類型後，比較兩位總統在語藝策略和類型上的不同之處。不同政黨立場在兩岸政策的主張迥異，因此外在分析中包含兩岸政策和當時的國內情勢與新聞事件，透過外在分析能歸納出對總統的語藝策略影響，究竟偏向國慶情境的影響還是其各自政黨立場的影響

第四章 研究分析

總統在國慶演說的語藝類型中，以一國領袖的角色在國慶大會中作為一位言者，與國慶儀典演說情境相對應。從文獻梳理以及前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依據類型批評取徑中「歸納取向」為研究程序進行分析。總統在國慶大會中必須對國家過去與當前的局勢回首與展望，在外在分析部分，將針對總統於國慶演說中提及的兩岸政策、國家情勢以及相關重大新聞事件等，影響國慶演說的相關情境要素進行描述討論。

內在分析則以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任內國慶演說講稿內容做分析，於講稿內容中的實質、風格和組織方式進行探討。其中，將總統的國慶演說文本，依照講述議題分為國家主體意識、外交、經濟、兩岸關係和內政等五個議題區塊。「國家主體意識」以總統在國慶演說中講述國家歷史、台灣精神…等主題為分類；經濟、外交和兩岸關係議題分別獨立，其中兩岸關係議題中和多面向議題結合，兩岸經貿議題獨立於經濟議題外，融入兩岸關係議題中。而內政則包含如國防、民生、生態保育…等議題。在這五個議題部分個別做實質內容、風格形式分析，最後再個別針對陳水扁與馬英九在國慶演說文本上進行組織方式分析。

第一節 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國慶演說與內外分析

陳水扁是中華民國第十及十一任總統，在兩千年總統大選中從三組候選人脫穎而出，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當選總統象徵重大意義，是我國在 1996 年總統直接民選後，第一位非國民黨籍的民選總統，實現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政權的和平轉移更讓中華民國的民主進程往前邁進一大步。

陳水扁當選總統的意義不僅僅是民主的躍進，更讓外界關注的是陳水扁來自獨立色彩鮮明的民進黨籍，民進黨第一次取得執政黨地位，對對岸中國大陸來說也是第一次得學著和這位新的領導人打交道。

一、外在分析：陳水扁的國慶演說與兩岸政策

以下的外在分析中，將依據陳水扁所提出的兩岸政策，以及陳水扁在國

慶演說中提及的兩岸政策作為對照，將分為六項要點討論。

(一)四不一沒有與統合論

陳水扁政府執政，對兩岸關係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和局面，面對中國大陸始終抱持著統一的立場與基調，屬於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來說，兩者無疑是相對立的立場。

陳水扁在上任後主持的第一個國慶大會演說中，面對兩岸關係帶來的挑戰，他發表以下談話。

面對首次政黨輪替之後的政治新局，猶如手術之後必須生出新的骨骼血肉，同時要面對內外的艱難挑戰。五月二十日之後，我們以積極戒慎的作為，用最短的時間穩住兩岸情勢、維護國家安全、開拓國際空間，並且積極進行內政改革、除弊興利，為人民謀求最大的福祉。(總統府公報 6326 號，2000)

陳水扁政府上台同時也是民進黨首次執政，陳水扁政府意識到國家第一次出現政黨輪替和政權移轉，新政府上手需要時間，對岸的中國大陸面對民進黨政府也需要時間，維持國家的穩定才是當務之急。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的這段宣示，同時也呼應其在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的兩岸政策「四不一沒有」。

四不一沒有政策在維持兩岸穩定的原則下產生，其中內容包含不改國號、不宣布獨立、兩國論不入憲、公投不入憲和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的必要。陳水扁強調在既有基礎上處理一個中國問題，其中的既有基礎被認為即是兩岸共識，在不踩踏兩岸紅線的情況下，維持相對穩定。

追求兩岸關係穩定是陳水扁政府的第一步，為了穩定民意和追求兩岸政策制定的共識，其後還成立跨黨派小組，並在 2000 年 11 月 26 日跨黨派小組達成「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共識，三個認知包括：1. 兩岸現狀是歷史推展演變的結果。；2.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中華民國已經建立民主體制，改變現狀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同意。；3. 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的目的在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兩岸地緣近便，語文近同，兩岸人們應可享有長遠共同的利益。四個建議則為：1.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

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2. 建立新機制或調整現有體制，以持續整合國內政黨及社會各方對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之意見。；3. 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尊重中華民國國際尊嚴與生存空間，放棄武力威脅，共商和平協議，以爭取台灣人民信心，從而創造兩岸雙贏。；4. 昭告世界，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堅持和平、民主、繁榮的信念，貢獻國際社會並基於同一信念，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

跨黨派小組提出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為陳水扁政府在後續的兩岸政策制定中提供基礎與方向，擁有跨黨派小組達成的共識後，陳水扁在上任後第一個元旦文告中，站在「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基礎上，提出「統合論」觀點，再度向對岸釋出善意。

在改善兩岸關係方面，海峽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這也是兩岸民間交流始終不絕的原因。臺灣內部容或對如何建構未來兩岸關係的策略缺乏共識，但是對於呼籲中共揚棄對臺文攻武嚇，以及以和平方式進行建設性對話的立場並無二致。（總統府公報 6374 期，2001）。

陳水扁在 2001 年的元旦文告中提出「統合論」，適逢我國正進行加入 WTO 貿易組織談判，在此時拋出統合論向對岸釋出善意，正是希望兩岸能繼續穩定發展，在穩定的情況下使經濟發展不致受到政治以及中國大陸因素的干擾。

在元旦文告中釋出善意的同時，陳水扁也在元旦文告中揭示政府下一步，即為推動兩岸三通政策，擴大兩岸間進一步的交流預作準備。

(二)「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與三通政策

2001 年 5 月 18 日陳水扁宣布召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其中一項重大的決定，是為兩岸經貿交流政策做出決議，一改過去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時期提出的「戒急用忍」政策，改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

陳水扁提出的兩岸經貿政策，具體而言以鬆綁現有的法規，如對大陸投資金額鬆綁、放寬投資上限，並對兩岸資金流動建立新機制。陳水扁政府在 2001 年 1 月 1 日即開始試辦金馬地區「小三通」，從人員、郵政、金融和貨物等方式通行

交流，政府管理以國家安全為原則。

同年 12 月 19 日，行政院通過「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開放大陸人士來台灣觀光，從一開始放寬大陸海外留學生和取得國外永久居留權的大陸人士。第二階段則進一步放寬港澳人士來台規定。

陳水扁政府上任前兩年，在推動兩岸政策上不僅主動釋出善意緩和兩岸局勢，同時從經貿政策著手，放寬法令限制擴大兩岸在經貿上的交流，不過在政治議題上則幾乎沒有任何碰觸和進展。

(三)一邊一國論

兩岸局勢的發展，在陳水扁政府各項經貿政策下走向開放，平穩的局勢在 2002 年出現變化，陳水扁於 2002 年 8 月 3 日在對東京舉辦的「世台會」29 屆年會發表視訊談話，藉由這次談話陳水扁卻發表「一邊一國」論的相關主張。

陳水扁在對世台會的視訊中明確表示，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與中國的關係也並非現行的香港與澳門模式，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與中國是一邊一國。同時強調台灣的命運只有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才可以決定，要改變台灣的現狀得透過公民投票才能解決。

陳總統在幕僚預撰的文稿之外，又提出自己準備的三點呼籲。並指出台灣面對中共武力的威脅和在國際上的打壓，我們絕對不能夠逃避也不能夠存在任何幻想。(聯合報，2002.8.4:A1)

陳水扁在這一段視訊談話中的脫稿演出，激起相當大的政治效應，引發美國與中國雙邊高度關切，美方事先並不知情陳水扁會有如此談話，中國大陸方面則認為，這是繼禮登輝前總統提出兩國論後，另一個具有台獨色彩的議題。一邊一國論談話為陳水扁政府自上任以來和緩的兩岸關係掀起波瀾。儘管陸委會事後提出補救聲明，黨院府研擬四階段滅火平息爭端，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也出面重申，陳水扁的談話是「捍衛現狀、保護現狀而不是改變現狀，陳總統是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護衛者。」(聯合報，2002.8.5:A2)。仍招來大陸國台辦嚴厲批評陳水扁，聲明指出此舉是暴露出台獨立場的真正意圖，將對台灣帶來災難。

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述後，同年國慶大會上對於兩岸關係談話，則聚焦在中國大陸的飛彈威脅上。

阿扁要再度呼籲中共領導人，傾聽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反飛彈、要和平」的真實心聲，否則只會繼續傷害兩岸人民的感情，讓兩岸關係愈走愈遠。唯有撤除台海沿岸的飛彈，公開放棄武力的威脅，進行理性溝通，尋求和平對話，才能締造台海的穩定與亞太的繁榮。(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國慶大會上強調對岸的飛彈武力威脅，對中國大陸領導人公開呼籲，要求大陸方面放棄武力犯台念頭，就得先從撤除飛彈開始，然而這樣的呼籲，在 2004 年陳水扁政府將其化為實際行動。

(四)防禦性公投

陳水扁在第一任任期的最後一年，以「強化國防能力，鞏固國人心防，並表達台灣 2300 萬人對於兩岸對等談判的熱切期望。」等呼籲，在 2004 年 3 月 20 日當天舉行防禦性公投，公投內容兩道命題如下：

1. 台灣人民堅持台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國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您是否贊成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以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
2. 您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國展開協商，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以謀求兩岸的共識與人民的福祉？

為了推動防禦性公投，陳水扁也上電視發聲，強調中國飛彈威脅及公投推動的正當性。由於公投的時間點與總統大選一併進行，也讓外界質疑陳水扁是為了將公投綁大選，國內泛藍陣營認為，公投法賦予總統「緊急公投」權力，公投法第十七條授權總統在國家已經或即將遭受外力威脅，導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危險的緊急狀態時，可以發動公投。(聯合報，2004.1.27:A1)。在野黨質疑當下國家並未遭遇緊急狀況，舉辦公投正當性不夠，加上將公投與總統大選硬是綁在一塊，選舉操作大過公投的實質意義。

2004 年總統大選是我國選舉史上最複雜和最具爭議的選舉，在這一年不僅

舉行我國的第一次公民投票，同時在總統投票前夕，還發生極具爭議的 319 總統槍擊案。儘管投票和選舉都如常舉行，不過 320 防禦性公投最後的結果，提案一「強化國防」和提案二「對等談判」，兩項公投提案的投票率為 45.17%與 45.12%，因為都低於百分之五十，兩項公投均遭到否決，320 防禦性公投最後以失敗告終。雖然公投失敗，外界認為人民並不支持執政黨這次的公投提案，但陳水扁卻是在 2004 年總統大選中勝出順利連任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

陳水扁雖然贏得 2004 年總統大選，不過 320 防禦公投與拋出一邊一國論，刺激中國大陸敏感神經，已經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投下變數。面對陳水扁政府動作頻頻，中國大陸早已認為這些作為就是台獨，北京當局在 320 公投前夕即不斷重申「台獨即是戰爭」，表示這極為大陸方面最後的紅線。在 320 公投過後，中國大陸方面更憂心的，是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制憲公投讓台獨成為事實。

有鑑於此，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國大陸於第十屆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言明中國大陸可透過非和平的手段打擊任何獨立以及分裂勢力，並訂立出三項前提。大陸積極的將對台政策法制化再度引發兩岸關係緊張，我國陸委會主委吳釗燮立刻出面嚴厲譴責，指中共不顧台灣民意堅決反對與國際社會批判，蓄意進行「非和平手段」立法，中共應對其錯誤決策向台灣人民懺悔。強烈聲明後，甚至不惜將兩岸貨運與客運包機暫緩推動作為反制。

面對中國大陸以反分裂法為後盾，挾著以非和平方式統一為手段，陳水扁在 2005 年國慶大會演說中，以相當篇幅強調台灣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必須加強防衛的決心。

在中國迄今不放棄以「非和平」的武力手段處理台灣問題，以及在中國政治民主改革未能啟動與決策尚未透明化以前，台灣的安全是確保台灣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屏障，台海的和平則是維繫亞太政經秩序的重要防線。台灣的自我防衛無法假手於人，只能靠自己建構足夠的國防、心防與民防。(總統府公報 6654 號，2005)。

(五)「積極管理，有效開放」與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

2006 年元旦，陳水扁在總統元旦文告中針對兩岸經貿議題做出表態，將原先擬定的經貿政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轉變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令外界不僅擔憂，兩岸關係是否在過去的緊張情勢下，我國政府的政策也漸漸趨於緊縮。總統府對於陳水扁的元旦祝詞，則解釋兩岸經貿政策並沒有緊縮，原則在於執行，只要有效管理，政策開放是無上限的。(聯合報，2006.1.2:A3)。不過在同一篇報導中也稱，陳水扁政府在第二任就職以來，在多次公開場合對中國大陸釋出善意，均得不到正面善意回應，兩岸關係在一連串的衝突與歧見下，互動相敬如冰。

2006 年春節期間，陳水扁在 1 月 29 日大年初一的春節談話中，突然拋出重大的政治議題。陳總統明確點名國統會、國統綱領是否廢除，現在已經到了好好認真、嚴肅考慮的時刻，且時間上已經很成熟。他也希望今年能完成「台灣憲法」民間版草案，明年能公投新憲法。(聯合報，2006.1.30:A1)。陳水扁在談話中強調思考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是不再為中國統一存有幻想，同時是為了彰顯台灣的主體意識。陳水扁的春節談話，無疑是直接挑戰其在第一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的「四不一沒有」承諾。然而，陳水扁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當中，才表示以個人意願重申 2000 年所揭櫫的四不一沒有承諾並未改變，不過在兩岸局勢持續不穩緊繃之際，加上中國大陸才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未滿一年，陳水扁於此時拋出廢除國統會等議題，再度挑動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

廢除國統會的震撼彈，同時也打中了在兩岸關係扮演重要腳色的美國，在陳水扁的春節談話後，美方主動發出聲明，反對兩岸雙方片面改變現狀，更反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直接給提出相關主張的陳水扁政府一記沉重打擊。

儘管遭遇阻力，陳水扁政府仍於 2006 年 2 月 27 號拍板定案，宣布「終止」國統會運作。陳水扁在國安會議中，仍重申國統會和國統綱領已是舊時代產物，也久未運作，因此他將宣布「終止運作」，不使用先前強調的「廢除」(abolish)。(聯合報，2006.2.27:A1)。

選擇終止或廢除國統會的用詞，是陳水扁政府與美方間溝通折衝後的結果，

縱使與美方關係經過緩衝，危機看似暫時解除，卻已經實質傷害台美間的互信關係。自陳水扁於春節的廢國統會議談以來，兩岸緊張局勢不斷升溫，中國大陸方面則選擇提高批判的強度。

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賈慶林選擇在 3 月 5 日，「胡四點」提出滿一周年時，針對台灣拋出的廢除國統會議題拉高批判強度。賈慶林指出台灣當局領導人企圖通過憲改進行台灣法理獨立活動的冒險性和危險性持續上升，堅決反對和制止台灣法理獨立活動，是中共當前最重要緊迫任務(聯合報，2006.3.5:A3)。

大陸除了拉高批判強度，同時也對台海間預警程度提出升級，時時緊盯陳水扁政府的下一步動作。

(六)入聯運動與入聯公投

廢除國統會風暴暫歇，2007 年 1 月 26 日，陳水扁在參與「全球新興民主論壇」上發表演說時，表示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並不違背就職時提出的四不一沒有承諾，也未涉及更改國號問題。陳水扁指出他一再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這不但是七十%到八十%台灣民意，也超越統獨跟意識形態。(自由時報，2007.1.27:A2)。這並非陳水扁第一次提出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雖然此次談話並非如以往充滿突襲與意外，卻是美中雙方掛心的下一步，陳水扁選擇再度重申台灣加入聯合國，宣示付諸實際行動的決心。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TAIUNA)於舉行會員大會上，正式致函陳水扁總統要求政府於 2007 年以「台灣」名義，正式申請加入聯合國，希望藉著民間的力量推動入聯運動。眼看入聯運動蓄勢待發，陳水扁在 2007 年 3 月 5 日，於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上拋出「四要一沒有」重大宣示。陳水扁表示，台灣要獨立、要正名、要新憲、要發展，台灣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問題。(聯合報，2007.3.5:A1)。

陳水扁新拋出的「四要一沒有」，完全推翻過去重申的四不一沒有政策，同時陳水扁再度強調，必須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必要性。此話一出，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李肇星痛批陳水扁，試圖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是歷史罪人，美方維

持一貫態度，重申不支持海峽兩岸任何改變現狀的行為。陳水扁則在五月為入聯運動加溫，要將加入聯合國付諸公投並將提案送交中選會，表態希望能將入聯公投與 2008 年的總統大選合併舉行。

公投合併大選又再度捲土重來，逼的在野黨國民黨也跟著喊出「返聯公投」抗衡，宣稱要以務實的方式重返聯合國，並不一定要以台灣名義加入。眼看公投議題已經發酵，美國國務院發出聲明，明確表示反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和這次公投，敦促陳水扁總統撤回公投提案，避免改變現狀和升高兩岸緊張情勢(聯合報，2007.6.20:A1)。即便美方強烈反對，陳水扁於九月六日的視訊談話中，不但重申海峽兩岸是一邊一國，並表示台灣將要以新會員國的身分加入聯合國。(聯合報，2007.9.7:A2)。

2007 年國慶演說中，陳水扁也為加入聯合國運動再度發聲。

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國家的主權屬於 2,300 萬台灣人民，國家未來的前途也只有 2,300 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1971 年 10 月 25 日由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第 2758 號決議文，不但不曾確立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也未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各自獨立的國家，這不但是歷史的事實，更是台海的現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無權也無法代表 2,300 萬台灣人民，台灣人民有權要求在聯合國要有適當的代表，並以台灣的名義、以新會員國的身分申請加入聯合國。(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2008 年 3 月 22 日，民進黨提出的「入聯公投」與國民黨提出的「務實返聯公投」，兩件公投案隨著 2008 總統大選一併舉行。選舉結果揭曉，入聯公投與返聯公投兩案，雖然同意票佔大多數，卻因為投票率均未達 50%，兩件公投案都遭到否決。而 2008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則實現我國第二次政黨輪替，由國民黨籍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第十二屆中華民國總統。

兩岸關係向來牽動美中台三方關係，成為一小國對兩大國的博弈，陳水扁政

府執政期間從四不一沒有、一邊一國、防禦性公投、廢除國統會到入聯公投，周旋擺盪在美中兩大國間。不過突襲式的做法與搖擺不定的政策，讓美國對陳水扁政府逐漸失去信心與耐性，更讓中國大陸從陳水扁上台之初的觀其行、聽其言，在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後，中國大陸反應激烈，兩岸關係緊張情勢升級。但隨著陳水扁政府在兩岸政策採取的模糊策略，大陸方面漸漸轉變成不與隨之起舞的冷處理，導致兩岸關係走向限縮與緊繃，讓陳水扁政府在執政末期難有太多突破與實質進展。

二、外在分析：陳水扁任內的國內情勢與相關新聞事件

以下針對陳水扁任內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與國內情勢，並在陳水扁國慶演說中有提及等相關事件，分為七項主題討論。

(一)九一一事件與政黨首次輪替

2000 年，中華民國的民主進程在出現首次政黨輪替後，往前邁進一大步。在歡度這個民主成就時，台灣卻仍籠罩在 1999 年發生的 921 大地震創傷之中，國內政治情勢洗牌的同時，世界的局勢也有重大的改變。美國在 2001 年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導致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倒塌死傷慘重，恐怖攻擊震撼全世界。打擊恐怖分子成了美國的第一要務，展開「反恐行動」迫使東西方國家必須緊密合作。美國得仰賴俄羅斯與中國的協助，讓反恐戰爭順利推行。東西方的合作態勢，間接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

對於新上任的陳水扁政府來說，除了得和彼此都不熟悉的中共打交道，小心翼翼地維持脆弱的兩岸關係，還得維繫歷經 921 創傷與總統大選後政治分裂的台灣。在陳水扁上任的第一個國慶演說中，強調的就是國內的族群融合與團結。

「台灣精神」源自於漢文化與南島文化的交匯包容，歷經苦難與夢想的淬鍊超越。從太平洋之濱到玉山山頂，立足於這一塊土地的所有子民，用汗水和智慧、用信心和希望為「台灣精神」寫下最好的註解。儘管來自不同的地方，也曾經有過閩南、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的分別，但是在禍福與共、相融一體的「台灣精神」中，不管稱之為「台灣人」、「中國人」、或者「世界

公民」，我們都不至於侷限未來的視野，更不可能忘卻立足的根本。(總統府公報 6326 號，2000)。

國慶演說從台灣精神出發，面對台灣內部多個族群的多元現況，陳水扁在演說中強調台灣精神的重要，進而訴諸國家的團結。兩千年總統大選中，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因內部分裂一分为二，更在敗選後發生支持群眾包圍國民黨部抗議事件。雖然發生低度的暴力事件，台灣卻沒有像其他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發生更大的流血衝突事件，讓民主轉型的過程寧靜而和平的進行。陳水扁政府為了團結，還任用國民黨籍的唐飛做為第一任行政院長。但不久後即因為國民黨籍的唐飛支持核四續建案，違背民進黨長期以來反核四政策遭到撤換，唐飛行政院長的大位僅僅只坐了 140 天。陳水扁在撤換唐飛後卻對外表示「已搬去路上的大石頭」，發言被外界認為是暗喻唐飛的去職。唐飛下台結束了國內短暫的兩黨共治局面，陳水扁事後的發言與態度，更種下與在野黨間互不信任的因子。

(二)金融風暴與加入 WTO

陳水扁為民進黨政府首次執政，同時也誓言要改革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代累積的黑金政治積弊。政治與制度需要改革，經濟問題也同樣面臨挑戰，2000 年 4 月 30 日，美國道瓊工業指數一夕爆跌 628 點，也跌掉全球投資人的信心，罪魁禍首是自一九九一年以降欣欣向榮的網路經濟，快速成長十年後在兩千年瞬間泡沫化，網路股暴跌、網路公司倒閉，加上後續發生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重創美國經濟也將全球經濟一併拖下水。

受到全球性經濟風暴影響，2001 年我國首度出現經濟負成長，失業率攀高至 5.17 的新高峰，陳水扁政府於此時籌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經發會)，希望透過朝野合作，達到穩定經濟以及金融秩序的目的。在陳水扁執政一年多後，台灣在經過十二年漫長談判，終於獲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門票，於 2002 年正式成為 WTO 正式會員國，希望為受到全球拖累的低迷經濟注入活力。

(三)桃芝與納莉風災

2001 年台灣遭逢兩次重大風災侵襲，中度颱風桃芝在 7 月 29 日來襲，豐沛

的雨量重創花蓮與南投地區，台灣十多縣市淪為災區，死亡人數破百、農損高達 14 億元。(中國時報，2001.7.31:要聞 1)。兩個月後，中度颱風納莉接續報到，納莉帶來的強大雨勢，這次卻重創北台灣。基隆、雙北市在當時都被洪水淹沒。大雨重創雙北市當時的交通系統，捷運系統淹沒、鐵公路遭到重創，陸空交通接近停擺，造成至少 31 死 15 失蹤的重大傷亡。(中國時報，2001.9.18:要聞 1)。

台灣時常遭受颱風等天然災害侵襲，在 921 百年震災之後，國土地質更為脆弱，受到颱風侵襲更引發土石流災情奪走上百人性命，陳水扁在 2001 年的國慶演說中，也必須正視國土安全問題。

最近國內連續受到風災的侵襲，許多的家園和民眾蒙受損失，又讓我們的心情十分沈重。政府除了全力協助受災的民眾渡過難關，儘速重建家園之外，面對大自然一再的反撲，我們更應該記取教訓，深思反省。個人已經委請中央研究院李院長負責召集相關研究機構與學者專家，針對生態維護和國土管理的嚴肅課題，建立一個長期的研究檢討機制，重新評估過去國土開發的政策得失，在未來的都市開發與國土保育之間，尋找一條與自然和平相處、長治久安的「新中間路線」。(總統府公報 6423 號，2001)

天然災害帶來的經濟和傷亡損失，讓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對國土安全議題也提出如兩岸政策上的「新中間路線」，天災與國際變局讓新政府不得不加快各項改革方案，以因應我國五十年來所遭遇的經濟、國際等快速的變化局勢。

(四)內閣改組與政策改革

2001 年縣市長選舉，國、民兩黨各取得九縣市首長執政地位，可說是打成平盤。2002 年是陳水扁政府提出眾多改革政策的一年，一月底陳水扁政府內閣進行改組，對外稱其為財經內閣團隊，並為即將提出的稅制和金融改革預作準備，在教育與司法改革也箭在弦上。在國防政策上，具有重大變革的國防二法也於 3 月上路，包括確認文人領軍、軍隊國家化、軍政軍令一元化等重大舉措。(中國時報，2002.3.1:焦點新聞 2)。在國家歷經政黨輪替後，確立軍隊國家化，是揮別過去威權體制下黨政軍一體的時代後，跨出的另一大步。

外交方面，陳水扁夫人吳淑珍以總統夫人的身分訪問美國，這是自蔣宋美齡訪美後，首度有我國總統夫人再度出訪美國，被外界稱為「柔性外交」。不僅總統夫人於外交出現突破，經過十二年的努力叩關，我國於 2002 年成為 WTO 會員國之一，不僅在世界貿易中佔有一席之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可避免我國經濟遭到邊緣化的危機。

2003 年 3 月 20 日，英美聯軍攻入伊拉克，被視為 911 恐怖攻擊後的報復行動，聯軍攻打伊拉克讓全世界為之關注，深怕戰事若拖延費時，將影響國際油價表現，讓仍受創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然而，當中亞陷入戰火之際，另一場戰爭也在中港台上演。

(五)SARS 風暴

2003 年 3 月 14 日，台灣出現第一例 SARS 感染確診病例，引發民眾高度恐慌。SARS 被稱為非典型肺炎，疫情最初於 2002 年從中國大陸廣東地區爆發，由於中國政府隱瞞疫情，直到 2003 年疫情大規模爆發，並擴及香港及台灣地區。消息遭到揭露，世界衛生組織才緊急介入防疫。SARS 疫情在台灣蔓延，防疫上讓兩岸政府多有齟齬，因為中國政府對疫情資訊的隱匿與資訊不透明，讓兩岸政府在防疫工作上互不信任。SARS 疫情爆發高峰期，其高傳染力與致死率，引發全民恐慌。甚至導致台北市和平醫院因爆發大規模院內感染而封院爭議，並導致多名醫護人員因此殉職。整體來說，SARS 疫情在台灣共造成 307 人感染，其中 47 人不幸死亡。

過去三年多，台灣面臨新舊世紀與新舊政權的更替，同時遭逢全球景氣衰退、恐怖主義攻擊、反恐及美伊戰爭、SARS 疫情爆發……等內外情勢的衝擊，可以說是順流與逆流洶湧激盪。在驚濤駭浪的過程中，舊有與新生並存、脆弱與堅強共生、危機與轉機同在，然而，我們從來沒有失去信心，更沒有迷失方向。（總統府公報 6546 號，2003）。

SARS 疫情爆發後四個月，世界衛生組織才將台灣從疫區內除名。陳水扁政府於此時透露將進行憲政改革，引發中國大陸對於陳水扁政府將公投入憲的高度

疑慮與緊張。歷經動盪的 2003 年，2004 年則是台灣焦點議題全圍繞在總統大選上。在兩岸關係上，陳水扁政府與中國大陸關係持續緊張，公投入憲議題讓兩岸關係降至冰點。

(六)三一九槍擊案

2004 年的總統大選，陳水扁尋求連任，對上國民黨與親民黨團結之下推出的候選人連戰與宋楚瑜，根據 TVBS 民調中心在總統大選前十天作出的民調顯示，連宋配與陳呂配民調為 40% 比 36%，國民黨籍候選人連戰僅僅以四個百分點微幅領先。(TVBS 民調中心，2004)。

3 月 19 日，就在總統大選前一天，總統陳水扁與副總統呂秀蓮在掃街時，同時遭到槍擊受傷送醫，這起槍擊案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副元首同時遭到槍擊。由於槍擊案發生在總統大選前一天，時機敏感震驚各界，隔天總統大選投票結果，陳水扁在一舉逆轉選前落後的頹勢，以些微差距擊敗國親陣營候選人連戰。選舉結果讓在野黨非常不能接受，認為是槍擊案影響整個選舉結果，指控槍擊案是陳水扁陣營自導自演，不僅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並提出當選無效訴訟、號召群眾上街遊行，國內政治陷入動盪與不安，朝野間惡鬥情況越演越烈。

儘管歷經訴訟與驗票爭議，陳水扁仍順利連任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連任後陳水扁儘管深陷朝野惡鬥的爭端中，但多項改革仍未停止腳步。

今年八月，在朝野政黨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立法院終於通過了立委席次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廢除國民大會、及公投入憲等四項重大的國會改革憲改案。九月行政院也完成了「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將目前行政院所屬的三十六個部會，大幅減併為十三個部、四個委員會及五個獨立機關，使歷經十七年、八任行政院長的政府組織再造工程跨出歷史性的一大步。(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在經濟方面，陳水扁致力推動二次金融改革，希望促進國內金控行業整併。同時也針對廣電法進行修法，提出反壟斷條款並要求黨政軍全面退出媒體經營，然而這方面則牽涉追討國民黨黨產爭議，議題從總統大選前延燒到選後，讓朝野

間的惡鬥更加嚴重。

雖然陳水扁贏得 2004 年總統大選，但他所屬的民進黨卻始終在國會處於弱勢，朝小野大的情況下，政策推動總是窒礙難行，甚至在任內提出的六千億軍購案也淪為朝野惡鬥的犧牲品，民進黨指出軍購案為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既定政策，卻遭到國民黨阻攔，而國民黨則指控此次軍購為凱子軍購，拒絕讓軍購案過關，爭議喋喋不休下，也影響到台美間的互動關係。

5 年來，從民意對立法效率不彰的反映不難看出，人民早已厭倦政黨的惡鬥與非理性的杯葛。本人自今年《元旦談話》揭櫫「開啟和解對話的政治新局」以來，即秉持「和解不退縮、堅定不對立」的立場，訴求朝野政黨理性對話與良性競爭。

縱使部分在野黨出現領導階層更迭後仍然未見對政府善意的回應，本人仍不改初衷，誠摯呼籲「朝野大和解、人民好福氣」。(總統府公報 6654 號，2005)。

2005 年，陳水扁於國慶大會上宣示眾多既定政策改革，包括將立委席次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宣示已經完成第一階段修憲。同時，呼籲要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無非是希望能擺脫朝野惡鬥的深淵，因為朝野間互相制肘，讓陳水扁政府施政宛如坐困愁城，令出不行。

(七)貪汙弊案與紅衫軍倒扁運動

2005 年 8 月 21 日高雄爆發捷運外勞暴動事件，背後卻爆出總統府國策顧問陳哲男也牽扯其中，事後媒體更爆料陳哲男出現在韓國濟州島賭場情事、違法收受政治獻金案，一連串的爆料讓民進黨與陳水扁政府形象大傷，更衝擊 2006 年民進黨直轄市長的選情。

然而，陳哲男案卻只是陳水扁政府弊案開端，2006 年 4 月，媒體爆料總統夫人吳淑珍捲入百貨公司經營權之爭，並收受禮券第一家庭牽涉爭端，讓外界驚訝。5 月立委加碼爆料陳水扁女婿趙建銘捲入內線交易案，趙建銘被判有罪遭到收押，陳水扁為此公開道歉。面對心腹、女婿和家人接連涉及弊端，弊案爭議這把火最終卻延燒到陳水扁身上，陳水扁先後遭指控涉入國務機要費案、家族洗錢案，就

連兒子陳致中也遭受洗錢指控，幾乎整個第一家庭都捲入風暴中。

陳水扁政府弊案連環爆，在野黨與媒體窮追猛打，讓弊案效應不斷擴大，陳水扁政府和民進黨的聲望非但無法止血還跌到谷底。2006 年 6 月國民黨在國會發起總統罷免案，將總統及家人涉及弊案作為罷免主因，不過最終罷免案在國、民兩黨角力下並沒有通過。

罷免案失敗，陳水扁雖然暫時度過難關，不過民間反對力量絲毫沒有減少，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在員群眾捐款發起「百萬人民反貪倒扁運動」，由於活動單位要求參與群眾身穿紅衣，這次的抗議又被稱為紅衫軍運動。面對紅衫軍運動風起雲湧，陳水扁仍決定於 8 月 15 日親自出訪帛琉，參加南太平洋友邦元首高峰會議，希望展現他絕不下台的意志。(中國時報，2006.8.15:A2)。

紅衫軍聲勢越來越浩大，9 月 15 日紅衫軍在台北市發起螢光圍城活動，上萬抗議群眾將台北街頭塞的水洩不通，過程中大致平和，示威抗議並未失控演變成暴力衝突事件。

2006 年 10 月 10 日，紅衫軍選在國慶日當天發起「天下圍攻」抗議活動，就連總統陳水扁於國慶大會上發表國慶演說時，在野黨立委選擇在台上高舉布條手勢抗議，甚至闖進三軍儀隊的隊伍中抗議，讓國慶會場也淪為抗議陳水扁政府的場合。罷免總統案加上紅衫軍運動，讓國內的政治動盪嚴重激化，社會也因為政治因素嚴重對立。面對嚴重的對立衝突，陳水扁在 2006 年國慶大會上的演說中，特別以「團結和諧四海同心、國家至上民意優先」作為演說主題。

意見可以不同，但不能破壞團結。國家認同可以有分歧，但國家不能分裂、政府也不能空轉。台灣只有這麼大，我們不能讓彼此的裂痕愈拉愈大，內心的藩籬愈築愈高。讓我們張開雙手，積極擁抱懷著不同理想的同胞；讓我們打開心扉，傾聽並尊重不同的意見。我們要让民主成為團結台灣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讓台灣因為有民主而變得更正常、更完整、更偉大。(總統府公報 6710 號，2006)。

儘管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高呼團結，仍舊難以挽回社會分裂以及政治動盪的混亂局面，同時還得面對司法對他種種調查行動。陳水扁第二任期

接近尾聲之際，縱然挺過罷免總統、紅衫軍運動免去下台危機，不過在國內仍得面對司法調查、政局持續動盪和社會意識形態撕裂的混亂，對外面對中國大陸，雖然在兩岸政策上採取模糊策略，卻先後在廢除國統會、入聯公投…等爭議搖擺的政策下，兩岸關係最終遲滯不前。

這樣的混亂一直持續到陳水扁第二任期結束下台都未曾終止，卸任後陳水扁失去總統身分的禮遇，馬上就遭遇司法審判，在 2008 年 11 月 11 日，陳水扁遭特偵組傳喚審理後，遭到法院羈押獲准，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位卸任元首遭到判刑有罪的而入監服刑。

三、內在分析：陳水扁國慶演說實質內容

內在分析主要以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的議題作為區分，其議題本研究依內容分為國家主體意識、外交、經濟、兩岸關係和內政等五大區塊。陳水扁執政八年任期中，總共八篇國慶大會演說文本。實質內容中包括五大議題，本研究以論證方式進行分析，論證方式又分為可信度(Ethos)、感性訴求(Pathos)和理性訴求(Logos)。在區分出陳水扁國慶演說的五大議題後，再經由論證方式歸類，以下進行陳水扁累計八篇國慶演說文本進行統合性分析。

(一)國家主體意識：感性訴求—台灣精神

在國慶演說中陳水扁對台灣主體意識的強調占有多數的篇幅，其中幾乎都使用感性訴求，唯有在 2007 年陳水扁政府推動入聯運動時改用理性訴求，運用聯合國相關決議案等事例，解釋台灣歷史定位以及為何要加入聯合國的原因。

陳水扁在 2000 年首度為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來自主張獨立意識強烈的民進黨，加上實現我國民主歷史上首度政黨輪替，在陳水扁八年的執政任期中，對於台灣主體意識的貢獻卓著，陳水扁在總統任期第一次國慶演說中，強調以中華民國的民主歷史進程開頭。

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華民國歷史，從國家的建立到現代化、民主化的過程，無一不是歷經險阻逆境、克服艱難挫折之後，才能獲致甘美果實。每一個階段的超越，憑藉的絕不只是個人、或者少數人的力量，而是靠社會的覺醒和廣大人民的意志。(總統府公報 6362 號，2000)。

陳水扁用感性口吻，表示國家之所以能民主化，能夠再度跨出民主進程的一大步，勝利並非來自總統、個人而是全體國民。在陳水扁執政第一任期中，完成首次政黨輪替的成就即不斷被提起。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台灣人民以民主的過程，完成了歷史上首次的政黨輪替，去年的五月二十日，同樣在這個地方，全世界和我們一起見證民主政權的和平轉移，台灣人民充滿了驕傲和自信，因為我們不僅為華人的歷史、更為民主的價值寫下嶄新的一頁。(總統府公報 6423 號，2001)

過去兩年多，隨著政黨輪替的腳步前進，民主的蛻變呈顯在許多不同的層面。就像在我背後的總統府，過去是威權神秘的象徵，如今不僅改變了風貌，更縮短了與人民的距離。不久之前的中秋夜，阿扁跟許多民眾在這裡一同賞月，看著藝術創作者爬上總統府，心裡有著特別的感受，因為台灣人民生活在真正民主的時代，沒有「高不可攀」的威權，每一個人都是國家最有尊嚴的主人。(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對國家民主的成就，除了一再與社會與所有人民做連結，同時還拿過去象徵威權的總統府建築與自身所見做比喻，在演說中自稱「阿扁」，除了拉近與人民的距離，要展現的即是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並非高不可攀。

在陳水扁歷年的國慶演說中，更重要的是對「台灣主體意識」的強化，被廣泛的運用在國慶講稿中。

從先民渡海而來的數百年前到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從最早的原住民族到無國界之分的網路世代，兩千三百萬同胞的血液之中，自有一股感同相容的「台灣精神」。(總統府公報 6362 號，2000)。

回顧過去，我們也曾遭遇無數的艱難，走過最黑暗的時代，但是兩千三百萬人民所展現的「台灣精神」是我們最堅強的依靠，在面對逆境與挑戰的時候，國人同胞更應該凝聚共識、沈著團結、堅定意志、奮勇向前。(總統府公報 6423 號，2001)

彷彿又看到三十幾年前的紅葉少棒隊，一群光著腳丫子、用木棒打石頭

的小朋友，全心全力要揮出一支安打的畫面。在這些「台灣之子」的身上，我們看到一股無比堅韌的力量，蘊含在這一片土地之中，深藏在我們下一代的身上。這就是「台灣精神」，也是台灣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競爭力。(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陳水扁所指出的台灣精神，從一開始訴諸的族群融合、團結，乃至於應用在台灣人是堅強、不輕易認輸的特質。用台灣運動員在場上奮戰的故事比喻台灣精神，如拿下亞洲盃少棒冠軍的講美國小少棒隊，2004 年雅典奧運中奮戰不懈的台灣選手，也被比喻成發揮台灣精神最好的故事。講述台灣精神的感性訴求，幾乎都安排在國慶演說中的開頭或結尾，陳水扁以總統的高度，呼喚台灣精神、台灣經驗，無非是希望在大選後面臨政治分裂、二元對立的台灣社會氛圍下，能以領袖之姿再凝聚整個社會、國家的團結，使用感性口吻拉近人民與新政府間的距離，從國家歷史民主進程到台灣精神、經驗，都是使用感性訴求呈現。

在陳水扁第二任執政末期，執政面臨諸多困境，不僅得面對國內朝野嚴重惡鬥，同時遭指控家族涉及貪汙洗錢案，民眾對陳水扁政府執政信心降低，政治與社會陷入嚴重分裂，也讓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訴諸的國家主體意識議題出現轉變。

意見可以不同，但不能破壞團結。國家認同可以有分歧，但國家不能分裂、政府也不能空轉。台灣只有這麼大，我們不能讓彼此的裂痕愈拉愈大，內心的藩籬愈築愈高。讓我們張開雙手，積極擁抱懷著不同理想的同胞；讓我們打開心扉，傾聽並尊重不同的意見。(總統府公報 6710，2006)。

2006 年是陳水扁政府執政最為艱困的一年，面對百萬紅衫軍發起的倒扁運動，還在國慶大會當天發起包圍行動，在野黨立法委員甚至闖入國慶大會中鬧場，讓場面尷尬不已，面對國內意見嚴重分裂，陳水扁改而強調國家的民主體制本質，希望能夠接納不一樣的聲音，面對反對力量使用較低姿態，希望消除社會分歧。

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國家的主權屬於 2,300 萬台灣人民，國家未來的前途也只有 2,300 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1971 年 10 月

25 日由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第 2758 號決議文，不但不曾確立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也未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各自獨立的國家，這不但是歷史的事實，更是台海的現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無權也無法代表 2,300 萬台灣人民，台灣人民有權要求在聯合國要有適當的代表，並以台灣的名義、以新會員國的身分申請加入聯合國。（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針對國家主體意識議題上，在陳水扁執政最後一年出現不一樣的呈現方式，2007 年由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陳水扁在講述國家主權議題上，利用聯合過簽訂決議文和歷史淵源解釋，一改過去使用的感性訴求，而是使用理性訴求，向外界表達政府推動入聯運動的正當性。

(二)外交：理性和可信度訴求並陳—突破外交困局

在陳水扁政府執政時期的烽火外交策略上，採取與中國大陸競逐爭取我國在國際的生存空間，國際大環境加上外交策略影響下，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的外交議題上，大多採用以總統身分公開呼籲，加上理性訴求表達政府對我國外交處境和國際事務的關心，但也有出現以感性訴求為號召。

陳水扁政府執政期間，面對的世界局勢極為動盪，2001 年美國本土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讓國際間局勢產生巨大變化。

身為國際社會與民主國家的一份子，我們除了嚴厲譴責恐怖攻擊的暴行，也對於美國聯合各主要盟邦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行動，表達全力的支持。對於國際社會所需的人道援助，我國也願意盡一己之力，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總統府公報 6423 號，2001）。

以公開譴責恐怖攻擊表達我國政府立場，並明白表示對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支持，陳水扁並在其後又以總統身分呼籲，民眾應該冷靜審慎以對，因為政府在恐怖攻擊事件上已經做好準備。使用個人可信度配合理性訴求的呼籲與宣示，占陳水扁在外交議題上多數的使用方式。

今天出席國慶大會的還有友邦的總統、使節、代表團及貴賓，各位長期對於中華民國及台灣人民的支持，阿扁要再一次代表政府及人民表達由衷的感謝。身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我們願意積極扮演亞太地區及全球發展的參與者和奉獻者的角色。不管是在民主同盟、經貿合作、文化交流、人道援助、或者國際反恐的行動中，台灣都不會缺席。今年一月一日，台澎金馬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第一百四十四個會員國，這是我們歷經十二年奮鬥所獲得的重大里程碑，未來我們仍將本此初衷，積極爭取參與區域及全球的國際組織。(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在外交議題上，不單單只有嚴肅制式的外交辭令，面對我國國際空間的限縮與挑戰，也會使用感性訴求呼籲國際社會正視台灣外交上的困境。

今天，在世界的許多個角落，來自台灣的農技團、醫療團持續默默的耕耘奉獻。對於國際的參與、經貿的援助、人道的關懷，台灣從來沒有停止過，因為台灣人民相信國際社會終將存在「德不孤，必有鄰」的公平道理。(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台灣要不卑不亢的站在國際的舞台上，擁有平等的地位和基本的尊嚴，這是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的願望。如同在奧運的頒獎典禮上，每一位國人都希望看到自己的國旗，唱自己的國歌一樣。如此單純的心願，任何一個文明社會的成員都不能漠視，更不應該以「誰理你們」這樣粗暴的態度來對待！(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在外交議題上使用感性訴求也會偏向使用個人可信度，在雅典奧運過後，陳水扁即在國慶演說中，將我國奧運得牌選手與受打壓的外交國際現實狀況做結合，向外界訴求國家在國際地位、空間上遭遇的不平等對待。總體而言，在陳水扁的國慶演說當中，外交議題上仍以理性訴求加上可信度式的應用為主。

(三)經濟：理性訴求—宣示經濟政策

陳水扁政府一上任，在經濟方面隨即遭遇難關，恐怖攻擊陰影加上網路經濟泡沫化，讓國內經濟也遭受衝擊。政府面對困局，必須對社會提出解決方案，因此在陳水扁國慶演說中的經濟議題上，多數呈現方式是以解釋當前經濟挑戰，再加上政府提出的振興經濟方案作為訴求，其中也多以經濟數字加以呈現，使用的

方法多為理性訴求，在 2003 年時，陳水扁則在其中一段經濟議題談話中，希望社會大眾對國內經濟未來能抱有信心，因此使用感性訴求進行喊話。

儘管全球經濟的景氣仍處於衰退的低潮，台灣無法自外於全球普遍的衝擊，然而我們不能因為一時的困頓而氣餒，更不能在不景氣中失去了志氣。在下次景氣回春之前，我們必須讓台灣做好準備，所以政府一定會持續貫徹「台灣優先、經濟優先、投資優先」，並且在政府效率、金融市場、相關法令、基礎環境等層面具體提升，落實「投資台灣優先」的政策目標。(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本人要懇切的呼籲全體國人同胞，只要心中有台灣，就一定能看見台灣。

以行政院主計處與韓國中央銀行所發表的數據為例，預估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台灣與韓國同為 4.6%；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台灣為 1.5%、韓國為 2.5%；失業率台灣為 3.8%、韓國為 3.3%；貧富差距五分位比台灣是 6 倍、韓國是 8 倍；平均國民所得台灣為 1 萬 6,563 美元，比韓國的 1 萬 9,921 美元要少一些，但如果排除匯率波動的因素，以「購買力平價」(PPP)來反映實際的國民所得，台灣為 3 萬 1,041 美元、韓國只有 2 萬 3,331 美元；外匯存底至去年底，台灣為 2,662 億美元、韓國為 2,390 億美元；政府債務餘額占 GDP 的比例，台灣為 31%，韓國為 33.4%。(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在經濟議題上，首先提出經濟惡化的原因，是受到國際經濟環境惡化的影響，並實際指出政府接下來在經濟上施政的目標以及順序。然而在經濟議題中，為提供社會大眾具體的經濟數據，也會使用經濟成長數據、失業率、GDP 等等作為佐證，或是提供我國的經濟競爭力排名，作為在經濟議題上理性訴求的有力支持。

其次，面對經濟惡化的壓力，政府對於社會大眾對於經濟前景信心低迷，除了對社會大眾提出振興經濟的政策、數據外，也必須對社會大眾對經濟前景低迷的信心做出喊話。

親愛的國人同胞，景氣復甦的跡象愈來愈明顯，力道也愈來愈強勁，最苦的日子我們已經度過。我們相信，再過一段時間，民眾就能夠直接感受到經濟復甦的成果。因為客觀的數據、國際的評比逐漸看好台灣，我們自己更應該相信台灣，沒有理由再聽信少數的人唱衰台灣。(總統府公報 6546 號，2003)。

利用感性訴求，希望社會、民眾對國家經濟重拾信心，同時以總統、國家領袖之姿做出喊話，增強對國家經濟未來的信心，綜觀陳水扁八年執政歷程中，對於經濟政策理性訴求多於感性訴求，理性訴求部分在政策宣示應用多於數據。

(四)兩岸關係：理性與可信度訴求—兩岸和解與威脅

在兩岸關係議題方面，與部分議題結合，如經濟、國防等議題。在陳水扁執政八年當中，兩岸關係從和解走向實質政策推動，陳水扁政府使用理性訴求推動政策，再加上以個人呼籲的可信度訴求希望兩岸和解。即便當中提出一邊一國論導致兩岸關係波動，陳水扁在兩岸關係的訴求上，仍是採用理性訴求與可信度互相運用的方式，呈現在兩岸關係訴求上。

因為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過去半個世紀寫下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台灣經驗」已經成為舉世皆知的成功典範，沒有理由讓台灣人民持續生活在武力的威脅之下。我們願意跟對岸進行民主的競爭、經濟的競爭，也樂見兩岸進行正常化的經貿與文化交流，然而中共不斷增加對台的飛彈部署、進行針對性的軍事演練，這是對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的最大威脅，也是對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的漠視和倒退。

阿扁要再度呼籲中共領導人，傾聽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反飛彈、要和平」的真實心聲，否則只會繼續傷害兩岸人民的感情，讓兩岸關係愈走愈遠。唯有撤除台海沿岸的飛彈，公開放棄武力的威脅，進行理性溝通，尋求和平對話，才能締造台海的穩定與亞太的繁榮。(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首先，從台灣的民主自由成就出發，要求對岸中國大陸撤除武力對台灣的威脅，否則就是威脅世界對自由普世價值的認同，再以總統的高度提出呼籲，向對

岸遞出橄欖枝，是交叉使用理性訴求與可信度的呈現方式。兩岸關係議題中，陳水扁也大量使用個人可信度進行訴求。

身為國家的領導人，個人必須捍衛國家的主權、安全與尊嚴，確保台灣的永續發展。台灣人民應該對自己有信心，對台灣這一塊土地有信心。只有對自己沒信心、對台灣沒信心的人，才會趨附霸權、委屈求和，甚至將對岸的武力威脅和蠻橫要脅，視為台灣人民必須接受所謂「一個中國」的先決條件。

阿扁相信，歷史一定會站在自由民主這一邊，和平也一定會站在台灣人民這一邊。(總統府公報 6546 號，2003)。

在兩岸議題上，跟國防相關的議題陳水扁多使用理性訴求和可信度交叉應用，其次，在兩岸經貿議題上則完全使用理性訴求呈現。

自 2000 年至 2006 年，國人同胞每年前往中國的人次，由 311 萬增加到 441 萬。也就是說，平均每天有超過 1 萬 2,000 人次的國人前往中國。在通航方面，2003 年實施單向「春節包機」，2005 年實現「雙向、不中停」包機，並自 2006 年 6 月起，實施「四項專案包機」。現在一年之中，長達 10 週以上有「節日包機」，載運的旅客超過 10 萬人次。此外，目前每年透過「小三通」往返兩岸的民眾也有 60 萬人次，應能有效提供國人同胞往返中國的需求。(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陳水扁在兩岸經貿上，處於開放大小三通的交接階段，因此使用兩岸間包機往來人次的數量狀況，來說明目前兩岸間交流的情形和需求，使用數據的方式呈現政府在小三通、包機等政策的運作情形。最後，再回到可信度訴求上，陳水扁不單單只是使用個人可信度訴求，同時也使用在兩岸關係中著力甚深的美國，進行可信度訴求。

美國布希總統前年 11 月在日本京都發表演說時指出：「自由的國家是和平的國家，自由的國家不威脅鄰國，自由的國家為國民提供充滿希望的未來與前景，…並帶來只有自由才能保障的和平與穩

定。」同時，公開讚揚台灣的自由民主是值得其他國家及中國借鏡的典範。因此，一個愈民主的台灣愈能對中國的民主化發揮「燈塔效應」，也更有助於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完全符合美國、日本及鄰近國家的共同利益。（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兩岸關係議題上，往往是中美台三方競逐角力的場域，因此在國慶演說中援引美國元首對台灣民主的肯定與支持，相當程度能使社會大眾對政府兩岸政策的方向帶來信心，尤其在陳水扁執政末期，兩岸關係處於低潮時期，穩定社會大眾的信心更為重要，因此使用他國元首作為可信度訴求，和過去使用個人可信度訴求相較下是更為有力的呈現方式。

(五)內政：理性與可信度訴求—宣示政策

在內政議題方面，議題較為多元，包含朝野內鬥、政策改革、風災和反貪腐，也因為內容多元，所用的訴求策略也比先前的五個議題更加靈活。經過統整分析之後，陳水扁八年執政期間，內政議題上的訴求呈現，仍以理性訴求和可信度訴求佔多數。當國家面對颱風、地震等天災狀況時，陳水扁則在此使用感性訴求於重建和國土保育議題上。

首先，陳水扁政府在上台執政後，不論是第一或第二任期，都面臨政治和社會上對立的危機，朝野間的惡鬥成了陳水扁八年執政中始終甩不掉的問題。因此陳水扁站在總統的高度，面對朝野間的歧見，則以個人可信度訴求，希望解決國內的政治問題。

今年年初，新國會上任，新內閣隨之改組，國內的政局及政黨的版圖呈現新的氣象，國人同胞也有新的期待。如今，新國會進入第二個會期，內閣團隊也都穩定就緒，我們期許朝野政黨及行政立法部門能夠理性溝通、協調合作，不論少數、多數，不分執政、在野，都能以國家整體利益及民心關切的議題為先，為各項興革及政務的推動共商大計，開創和諧安定的政治新局。（總統府公報 6485，2002）。

5 年來，從民意對立法效率不彰的反映不難看出，人民早已厭倦政黨的

惡鬥與非理性的杯葛。本人自今年《元旦談話》揭櫫「開啟和解對話的政治新局」以來，即秉持「和解不退縮、堅定不對立」的立場，訴求朝野政黨理性對話與良性競爭。

縱使部分在野黨出現領導階層更迭後仍然未見對政府善意的回應，本人仍不改初衷，誠摯呼籲「朝野大和解、人民好福氣」。(總統府公報 6654，2005)。

在 2006 年是陳水扁政府執政最為艱困的一年，因為陳水扁政府不僅身邊親信爆發弊案，就連親人和陳水扁本人都捲進貪汙案中，使的朝野惡鬥更加激烈，還得面對紅衫軍運動包圍壓力，陳水扁在當年國慶大會中以總統身分直接宣布要將國慶大會暫停舉辦，是為較特殊的個人可信度訴求。

今年的國慶慶祝大會，在主席立法院王院長的擘劃籌備，大家盡心盡力希望把工作做到最好，以表示我們對國家生日的祝賀，在此本人要向全體的工作同仁，特別是警憲人員的犧牲奉獻，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與敬意。各位的努力與表現不應被抹煞，但這種形式的國慶慶祝大會，大家意見這麼多，參加的又這麼的勉強，應該立即檢討，明年以後不再舉辦。(總統府公報 6710 號，2006)。

其次，在面對國內諸多政策改革議題上，總統則多使用理性訴求和可信度訴求交叉運用。

因此，「建構政治秩序」、「改善人民生計」、「擴展國際參與」、「捍衛安全和平」是本人在未來不到 3 年任期施政的「四大核心目標」。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本人深切了解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建構一個「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因此，推動階段性憲政改造工程，創建符合「台灣民主」的政治體制與自由社會，是為後代子孫安身立命奠定百年根基的神聖任務。(總統府公報 6654 號，2005)。

親自在國慶演說中揭示政府未來的施政核心，使用個人可信度訴求，同時也是為以總統之姿對政府的施政負起責任。而在宣示政策內容上，則改以理性訴求為基礎。

對於弱勢族群的扶助，行政院完成了「周延弱勢學生助學措施」的規劃，除分三階段逐步補助 5 歲以下幼兒的就學費用外，也將擴大照顧各學齡的弱勢家庭，包括：國中、小弱勢學童課後扶助，以及強化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等等，總計受惠人數約 65 萬 8,000 人，對弱勢學生提供更多的關懷與協助，讓所有的小朋友都能享有相同的受教機會與教育品質。(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最後，在我國內政議題中，最常遭遇也無可避免的，即為發生次數頻仍的天災問題，如颱風和地震。陳水扁 2000 年當選總統，距離 1999 年發生的 921 大地震相去不遠，國家仍走在重建的道路上。在撫慰災民傷痛和宣示國土安全計畫，在此則使用感性與理性訴求。

親愛的國人同胞，最近有一部關於九二一重建故事的紀錄片，片名叫做《生命》。許多的朋友和阿扁一樣，看了以後會不由自主的落淚。那並不是面對悲劇的傷慟，而是對於堅強生命力的無限感動。《生命》這一部影片所拍的不只是九二一的故事，而是台灣這一塊土地的故事，勇敢堅強的台灣人民的故事。(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面臨 921 大地震與桃芝、納莉颱風的侵襲後，對於國土保育計畫刻不容緩，陳水扁在國土政策議題上，即不使用感性訴求，回歸到宣示政策的理性訴求上。

(六)小結

以陳水扁國慶演說的實質內容分析中，某些議題中會出現感性、理性和可信度三種訴求一起出現的情形。在本研究中除了列出占比為多數的訴求方式，同時也會列出特殊的訴求呈現方式，在小結部分仍以占比為多數的訴求作探討依據。國家主體意識上，幾乎完全以感性訴求呈現，陳水扁在用詞上多以台灣作為代表，強調台灣精神、台灣經驗，凸顯台灣主體性。在外交、經濟和內政三項議題中，內容偏向政策面宣示，因此以理性訴求為首要呈現方式。最後兩岸關係議題部分，過半使用理性訴求，但在個人可信度比例也相當高，陳水扁多次對中國大陸以總

統身分公開做出呼籲，如要求撤飛彈、要求除去武力威脅等呼籲，讓可信度訴求比例佔兩岸關係議題幾乎一半篇幅。

四、內在分析：陳水扁國慶演說風格形式

在風格形式中分析中，依照陳水扁國慶演說中五種議題進行分析，在風格形式分析中分為「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兩類，其中消極修辭目的在於使人明白演說內容，積極修辭目的則是在於使聽眾能感受內容的生動與活潑特性。由於國慶演說中屬於儀式性演講，因此在消極修辭的運用上變化有限。在風格形式的探究中，對於總統如何在國慶演說對積極修辭的運用將是關注焦點，並從中歸納總統國慶演說中的風格形式特性。

根據游梓翔(2000)在積極修辭中所提出的，積極修辭在標準上分為「用語有力」與「用語生動」。其中用語有力包括語氣肯定、語勢澎湃與情緒強烈；用語生動則包括運用比喻、比擬、借代和示現等。消極修辭則是探究演講內容用語是否得體、明白與親近。本研究將依據以上分類對國慶演說五個主要議題進行分析。

(一)國家主體意識：反覆、排比—語勢澎湃

在國家主體意識議題中，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多訴諸台灣主體意識和對台灣本土的情感，在消極修辭的運用上較為親近。積極修辭方面，則發揮語勢澎湃與情緒強烈為主，例如用詞上多運用反覆、排比增加韻律感和加強的語氣，同時採用呼告的方式加強情緒。

台灣，是我們永恆堅固的搖籃，是祖先交給我們的美麗之島，不管風浪多高、環境多惡劣，只要我們腳步整齊、齊心努力，一定可以克服所有的艱難挑戰，在二十一世紀福爾摩沙的搖籃裡，孕育光明的希望、實現美好的夢想。(總統府公報 6423 號，2001)。

阿扁深信，民主、自由、人權、和平不僅是台灣人民信仰的普世價值，更是我們立足於世界的穩固根基。台灣要堅定走自己的路，包括民主之路、自由之路、人權之路、和平之路，這些都是崎嶇的單行道，儘管不好走，但

是我們必須克服萬難、大步前進，絕對不能放棄，更不能走回頭路。(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是以總統的身分對外演說，不過卻大量使用「阿扁」取代「本人」來自稱，在用語上並非站在總統的高度，使用相當親近一般社會大眾的用詞。其中描述到台灣本身，用詞多反覆且有韻律感。在 2002 年的演說中，採用民主之路、自由之路等反覆用語，強調台灣的自由與民主等國家基本價值，反覆和排比的使用，增強演說中的力道。

(二)外交：呼告、比喻—用語生動

外交議題的用語中，牽涉到國家對外事務，因此在演說用語上，並不存在模擬兩可的空間，取而代之的是肯定的語氣、準確用詞。但在涉及外交相關議題時，仍多使用「阿扁」作為自稱。在談到台灣對外處境上，使用的修辭包括呼告以及比喻。

今天出席國慶大會的還有友邦的總統、使節、代表團及貴賓，各位長期對於中華民國及台灣人民的支持，阿扁要再一次代表政府及人民表達由衷的感謝。(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台灣的國際處境就像身處無垠的沙漠，路途雖艱辛，水源儘管少，但是如果因此放棄求生的勇氣，或者自己人互不信任，相互猜忌，分散力量和資源，結果就是乾涸而亡。唯有團結一致、整合資源、相互扶持才能夠找到沙漠中的綠洲與生命的活水。(總統府公報 6654 號，2005)。

就如同外國的朋友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灣終於拿下奧運的金牌，卻無法升我們的國旗、唱我們的國歌，以致於我們的選手必須大聲的向國際媒體說出：「我來自台灣！」(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面對外交使節，陳水扁仍多使用阿扁自稱，向外國使節團表達感謝之意，然而，在陳水扁八年執政當中，國家所面對的外交處境伴隨對岸中國大陸的打壓日益艱難，陳水扁在外交議題上，雖用奧運選手或其他名揚海外的知名人士比喻台灣的成就，也使用呼告的方式加強語氣。面對國際現實的困境，則用沙漠加以比

喻，讓艱澀的外交議題生動許多。

(三)經濟：反覆、排比—肯定語氣

在經濟議題中，陳水扁在消極修辭的使用上，多以肯定語氣為主。然而一上任即遭遇全球網路經濟泡沫化，面對經濟危機，陳水扁在政策宣示上多過於數字的鋪陳，同時在政策的宣示上多使用排比方式加強語氣，表示政府在推行政策上的決心。

在下次景氣回春之前，我們必須讓台灣做好準備，所以政府一定會持續貫徹「台灣優先、經濟優先、投資優先」，並且在政府效率、金融市場、相關法令、基礎環境等層面具體提升，落實「投資台灣優先」的政策目標。(總統府公報 6483 號，2002)。

讓台灣變得更好、讓人民過得更好，這是政府施政明確的目標，也是國人同胞共同的願望。個人在今年年初，提出「拚經濟」、「大改革」的兩大主軸。(總統府公報 6546 號，2003)。

由此可見，台灣不但沒有在「亞洲四小龍」中消失，更在許多高科技領域穩居世界龍頭地位，台灣不但已經跨出亞洲，更有實力立足於世界。有如此亮麗的成績，相信只要心中有台灣、看好台灣，就一定能看見台灣。(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陳水扁在八年任期的國慶演說中，對於經濟議題的談話，多著重於政策上的宣示，除了在 2007 年改以大篇幅的數字取代外，其在政策宣示中，喊出的經濟政策口號，多以排比方式呈現，固定字數的排列增加演說內容的韻律感，在 2007 年的演說中，仍不忘強調台灣一詞，還藉此反擊外界及反對黨對其經濟政策表現上看衰的態度。

(四)兩岸關係：映襯、比喻—用語生動

在兩岸關係議題的積極修辭中，陳水扁使用大量比喻、映襯的方式，卻強化了兩岸之間根本上的落差和對立的本質，在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的使用上存在相當落差。

中國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以及對台部署飛彈恫嚇台灣國家安全，不只構成對「民主台灣」與「自由台灣」的威脅，也是對全球「民主社群」的嚴重挑戰。(總統府公報 6654 號，2005)。

武力的威脅是台海之間最大的「恐怖陰影」和「黑暗勢力」。(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事實證明，今天台海的問題不在於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而在於中國的極權、專制與獨裁，這是國際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的事實與真相。(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在兩岸關係的論述上，陳水扁在演說上經常使用映襯法，將對岸中國大陸比喻成專制、獨裁和黑暗勢力，與台灣的自由、民主和光明的一面形成強烈的對比，借映襯的方式加強演說中澎湃的語勢，用語生動同時也讓聽眾直接區分出兩岸間的差異之處。

兩岸關係在陳水扁的國慶演說中，一向佔有不少篇幅，面對兩岸關係需要和解，同時在任內發生諸多爭議和緊張情勢，陳水扁在兩岸關係的用詞上，仍常以「阿扁」自稱，並向對岸傳遞和平訊息，使用阿扁一詞，不僅僅是用語親近同時是放低、放軟姿態。

阿扁要再度呼籲中共領導人，傾聽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反飛彈、要和平」的真實心聲，否則只會繼續傷害兩岸人民的感情，讓兩岸關係愈走愈遠。(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阿扁願意再次重申，五二〇就職演說所宣示的內容在阿扁任期之內不會有所改變。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對岸政權與人事的更迭，並且希望雙方都能夠運用更高的智慧，為兩岸關係的新發展創造更好的機會。(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站在總統的高度上，陳水扁不論是向對岸領導人提出呼籲，或是在宣示兩岸政策上，大多仍使用「阿扁」的用語。

面對中國愈來愈嚴重的文攻武嚇，本人就任總統以來，仍試著釋出無數象徵和平與和解的橄欖枝，卻換來中國對我的「矮化」、「邊緣化」、「地方化」、「去政府化」及「去國家主權化」的「五化打壓」。(總統府公報 6766 號，2007)。

在兩岸關係方面：政府將繼續秉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理念，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總統府公報 6485 號，2002)。

台灣同時必須加速經濟的轉型，深耕台灣、佈局全球，厚植實力、分散風險，才能積極有效的掌握兩岸經貿發展的契機。(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不過，在兩岸關係的政策面或中國大陸對兩岸關係的作為上，仍和其他政策宣示相去不遠，使用字數的排比，營造出語勢上的韻律感，加強用語的力道。

(五)內政：排比—語勢澎湃

內政議題上，著重的是國家政策方面的宣示，在內政方面國家政策包山包海又複雜，因此，使用簡單口號運用在國慶演說中，既達到政策宣示的效果，同時也不難使人理解政府施政的方向與內容。

所以在陳水扁國慶演說的內政議題中，仍多是以加強語勢的修辭為主，以固定字數、排比的方式呈現。不過仍有例外之處，如講到九二一大地震等天災帶來的影響，則是運用比喻、示現的修辭方式，生動的呈現國家在災難中復甦的腳步。

最近，個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之後，提出「要穩定、大改革、拚經濟、掃黑金」，做為現階段努力的目標，相信這也是許多民眾心中共同的願望和期待。(總統府公報 6423 號，2001)。

阿扁更期盼各政黨能夠透過和平理性的競爭，讓選後的國內政局展露新的氣象，給台灣一個團結、穩定、安定、繁榮的機會。(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另一方面，政府致力推動包含憲政改造在內「六大改革」的決心和行動絕不打折扣，包括：推動「第 2 階段金融改革」、厚植台灣國際經貿競爭力的

決心不變；改革符合社會公義的稅改計畫以及18%優惠存款利率的決心不變；追討政黨不當取得黨產、實現「還財於民」的行動不變；改造媒體文化、提升社會品質的行動不變。(總統府公報 6654 號，2005)。

政府部門更應該要用堅定的意志、果決的行動，持續提升國際競爭力、強化政策透明度、推動金融改革、嚴懲貪污腐敗、改善選舉制度、維護社會正義、健全立法效率，同時追求國家的安全與兩岸的和平。

因此，「建構政治秩序」、「改善人民生計」、「擴展國際參與」、「捍衛安全和平」是本人在未來不到 3 年任期施政的「四大核心目標」。(總統府公報 6654 號，2005)。

不論是在國慶演說中揭示未來政府施政方向，或是宣示改革決心，很大比例使用排比的方式加強語勢，如在揭示政府六大改革的政策中，連續使用六個不變，強調政府推行政策的決心。這樣的政策宣示在外交和經濟議題中也經常見到，不過在內政議題上，更是大幅度的被使用。

生命總會經過曲折黑暗的隧道，承受命運的打擊，遭遇無數的挫折，有時彷彿已經走到了絕境。但是，一種永不放棄、無比強韌的生命力量，讓我們勇敢的繼續走下去，找到了生命的出口，看到了隧道盡頭的光亮。(總統府公報 6599 號，2004)。

在 2004 年的國慶演說中，陳水扁提到一部名為「生命」的紀錄片，以感性的口吻說出自己看完也流下眼淚，並以「生命歷程」比喻台灣在災後重建的歷程。以此在內政議題中，是較為不一樣的風格呈現方式。

(六)小結

總結陳水扁在八篇國慶演說中的風格形式呈現，在五大議題中只要涉及政策方面的宣示，修辭上大多都會採用排比或是比喻方式呈現，一方面加強自身的語勢，一方面利用比喻等方式讓政策宣示的內容不再死板而是生動呈現。而在所有議題中，陳水扁在兩岸關係議題的呈現上，則大量使用映襯的方式，將對岸中國大陸比喻成黑暗勢力、窮兵黷武，並且時時用武力威脅我國的國家，一方面不忘

強調我國立國的基本價值，也就是民主、自由與和平，與中國大陸兩相比較下，頗有對抗的態勢。

最後，陳水扁在國慶演說中，不論哪一方面的議題上，大量的使用「阿扁」一詞，取代過去在儀典演說中使用的「本人」或是以自己的名字作稱呼。在用詞上降低原本總統的高度，更加的親切、拉近距離，同時也令人感受到其本土化的一面。

五、內在分析：陳水扁國情演說組織方式

在陳水扁八篇的國慶演說講稿中，其組織方式幾乎是相當固定，從文章的鋪排中，大致可區分為「開場」、「本文」與「結尾」。其中，在開場部分，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式。

今天是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慶，感謝遠道而來的各國嘉賓和歸國僑胞，與我們一起來分享此一莊嚴、歡欣的時刻。(總統府公報 6362 號，2000)。

第一種為揭示國家年分，並向在場與會的來賓和僑胞問候作為開場。其二，則是已經揭示政府施政目標和願景的方式開場。

「台灣團結、民主進步、親民愛民、國民安康」，今天我們齊聚一堂，在中華民國 94 歲生日的這一天，共同許下這份真誠的願望，因為這 16 個字，不僅代表台灣主流、多元與蓬勃的社會力量，更是現階段 2300 萬台灣人民最根本的企望，也是本人所領導的政府致力實現的願景。

在陳水扁八篇的國慶演說講稿中，其開場形式仍是以第一種為主。在國慶演說中結尾部分，形式也相當固定。

最後，敬祝我們的國家生日快樂，國運昌隆！各位貴賓及全體國人同胞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同時讓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加油！再加油！謝謝大家！(總統府公報 6654 號，2005)。

最後，敬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全國同胞和各位嘉賓健康愉快。

現在，讓我們一起舉手高呼：自由民主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台灣人民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總統府公報 6546 號，2003)。

國慶演說結尾部分，總統說出祝福話語，其次則是帶領現場所有與會嘉賓、

民眾高喊口號中結束。而在內文部分，則是以前述所分出的五大議題為主。然而在經過實質分析後發現，在開場結束後，內文幾乎都是以感性訴求帶入，在內文結尾則再以感性訴求帶出。在內文鋪排上較為不同的，則是於 2001 年的國慶演說中，以詩人陳秀喜的「台灣」詩句作結。

形如搖籃的華麗島
是母親的另一個
永恆的懷抱
傲骨的祖先們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

海峽的波浪衝來多高
颱風旋來多強烈
切勿忘記誠懇的叮嚀
只要我們的腳步整齊
搖籃是堅固的
搖籃是永恆的
誰不愛戀母親留給我們的搖籃(總統府公報 6323 號，2001)。

2001 年國慶演說中，陳水扁特別在國慶演說的末段，朗讀這首「台灣」作為結束。在陳水扁八篇國慶演說講稿中較為特別的安排。最後，在 2006 年國慶大會上，面對在野黨杯葛和紅衫軍包圍下，其在 2006 年國慶演說中即宣示

但這種形式的國慶慶祝大會，大家意見這麼多，參加的又這麼的勉強，應該立即檢討，明年以後不再舉辦。(總統府公報 6710 號，2006)。

導致 2007 年陳水扁任內最後一次國慶演說改為室內舉辦，以總統講話取代總統蒞臨國慶大會演說，但在文章鋪陳上與國慶大會演說無異。

第二節 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國慶演說與內外在分析

馬英九在 2008 年總統大選中替國民黨重新贏回執政權，結束八年綠色執政，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實現我國第二次政黨輪替。儘管在陳水扁政府執政末期，兩岸關係仍處於冰點難有實質進展。不過在兩岸民間交流上卻沒有因此停滯，顯示兩岸的開放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而國共兩黨在陳水扁政府執政期間，則已恢復談話，多次會談的結果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立下基礎

馬英九在 2008 年總統大選前即表示，若他能帶領國民黨重回執政，對於兩岸政策的走向，絕對是走在開放的道路上。

一、 外在分析：馬英九的國慶演說與兩岸政策

以下針對馬英九任內的兩岸政策與國慶演說中提及部分，分為四部分進行探討。

(一) 一中各表與活路外交

馬英九一上任即宣布其兩岸政策為「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原則，並遵守在一九九二年兩岸達成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下運行兩岸關係。

在兩岸方面，海基會與海協會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重啟中斷十年的協商，化解兩岸對立情勢，開創和平新局，穩定東亞局勢，贏得國際社會肯定。我們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在開放鬆綁的政策指導下，逐步推動包機直航、陸客來台觀光、小三通擴大及台商回台上市等，為海峽兩岸開創一個開放而穩定的新局。（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馬英九政府執政後，原本處於低點的兩岸關係有重獲回升的機會，有別於陳水扁總統提出的「九二精神」，馬英九重新回到九二共識的框架上，也是中國大陸能夠接受的基礎上，讓兩岸關係能夠迅速解凍。另一個契機也讓兩岸多了一次對話機會，2008 年舉辦的博鰲論壇中，我國派出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參加，與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論壇中碰面，雖然是非官方場合上碰面，但「蕭胡會」仍讓外界高度重視。蕭萬長副總統於會中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

求雙贏」，為兩岸之後的發展定調。

兩岸關係在馬政府上台能快速解凍，另一個因素則是來自國共兩黨復談後立下基礎。國共兩黨復談從 2000 年開始，由當時擔任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出訪大陸開始，隨後江丙坤的經貿之旅、連戰的和平之旅，兩黨交流熱絡並常態化。連戰在和平之旅中與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連胡會後成立黨對黨的溝通平台「國共論壇」，成為國共兩黨固定舉辦的會談，至 2013 年為止已經舉辦九屆國共論壇，會談議題從兩岸經貿、農業、直航等議題都有所觸及，讓馬英九政府在國共論壇建立的共識上，使兩岸關係迅速發展。

因應兩岸和解的前提下，馬英九政府的外交政策也跟著改變。馬英九上任後隨即在 2008 年 8 月出訪邦交國巴拉圭與多明尼加時，宣布一改過去陳水扁政府提出的「烽火外交」政策，馬英九宣示將改以「活路外交」取代，其在選前又稱為「外交休兵」，其精神為不與中國大陸在外交領域上競逐，鞏固既有的邦交國，兩岸之間不互相挖牆腳成彼此默契。

活路外交的精神，實則來自馬英九在選前提出的「五不五要」政策中，五要中的要擴大台灣國際參與。希望兩岸在發展上能給予台灣更多國際空間。活路外交政策的實施，向中國大陸釋出善意，也大幅降低在國際場合中與中國大陸引發緊張關係的可能。同時，活路外交的另一個精神，除了降低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外，另改以經貿外交等經濟整合為目的推行外交策略。讓國家利用經濟實力在國際社會中能佔有一席之地。

(二)兩岸經貿協定 ECFA 簽署

儘管兩岸關係順利解凍，在 2008 年美國雷曼兄弟倒閉，爆發金融風暴再度讓全球經濟陷入一片低迷，台灣在全球化影響下也無法自外其中。面對兩岸交流而日漸龐大的貿易數額，2009 年開始出現呼籲政府與中國大陸簽訂貿易協定的呼聲。馬英九在 2008 年總統大選前就曾提出，選後將與中國大陸簽訂相關貿易協定。

陳水扁政府任內我國加入 WTO 世界貿易組織，與全球貿易鏈結合更加緊密，

面對全球化經濟整合的趨勢，區域性經濟整合也同步進行，亞洲地區出現「東協」等區域性組織整合，至 2010 年將簽署「東協十加三協定」，納入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我國因政治因素被排拒於東協之外，為了避免我國經濟貿易遭邊緣化危機，馬英九政府於 2009 年推行 ECFA 政策，ECFA 又稱為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由於中國大陸是目前我國最主要的出口國之一，透過簽署兩岸經貿協定，能減低東協國家貨品出口大陸對我國造成的衝擊。我國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兩岸正式於中國大陸重慶簽署協議。

我們與大陸簽署十四項協議，每一項協議都做到「對等、尊嚴、互惠」、「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捍衛了國家主權與臺灣尊嚴。

今年 6 月臺灣與大陸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已經在 9 月 12 日生效。這是兩年來兩岸最重要的一項協議，為兩岸經濟合作開創新的里程碑，我們沒有開放大陸勞工與新的農產品進來，反而為臺灣農業、傳統產業與服務業爭取到新的商機，早收清單部分即可創造 6 萬個就業機會與 1,900 億元產值，讓臺灣加入亞太經濟整合行列，免於邊緣化，同時加速國際化。(總統府公報 6944，2010)。

兩岸為協商 ECFA 相關協定，兩岸由海基會與海協會舉辦會談，至 2013 年為止共舉辦九次兩會會談，透過簽訂 ECFA 也讓兩岸的交流更加頻繁緊密，ECFA 的精神同時也是加入 WTO 後續的延伸，我國與中國大陸同屬 WTO 會員國，兩岸間的開放程度卻沒有因加入 WTO 後更加自由，簽署 ECFA 有助兩岸在經貿表現上更加自由，簽署 ECFA 外兩岸在共同打擊犯罪、海空運、郵政方面也均有協定，使兩岸間開放腳步更加迅速。

(三)東海和平倡議

馬英九在 2012 年連任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在馬英九政府第一任期執政期間，兩岸政策在其「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上運行，即便馬英九政府任期進入第二任，兩岸經貿議題仍是馬英九的施政主軸。

我們兩年前與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今年 8 月又簽訂了「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兩岸海關合作協議」，以及「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目前 ECFA 後續談判正緊鑼密鼓地進行中。(總統府公報 7054 號，2012)。

兩岸藉由經貿交流，從過去對立走向和解進而合作，但在對外主權問題上，在馬英九第二任期仍帶來挑戰。2012 年 4 月 18 日，日本東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要將釣魚台國有化，立刻牽動中日台三方敏感神經。我國將釣魚台視為固有領土，同時中國大陸及日本也各自認為擁有釣魚台實質主權。儘管主權問題在中日台三方多有爭議，但已經被擱置許久，日本大動作宣布要將釣魚台國有化，衝突情事立刻升高，不僅釣魚台連帶也升高東海爭端的緊張情勢。我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提出嚴正抗議，不過隨著要釣魚台情勢日漸升溫，美國也介入其中，向日方提出抗議卻不能損及美日邦誼，同時在兩岸和解的氛圍下，面對中國大陸立場也顯得敏感。讓我國在釣魚台爭議中，不僅得堅守主權立場，卻又缺乏主動博弈的籌碼，立場變的左右為難。

中華民國一向愛好和平，也一向珍惜與友好國家的關係。對於釣魚臺列嶼的爭議，我已在今年 8 月 5 日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相關各方同時擱置爭議，展開對話。我們以「捍衛主權漁權，和平處理爭議，共同開發資源」作為努力的目標；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南海。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將扮演和平締造者的角色，為東亞的和平穩定繼續努力。(總統府公報 7054 號，2012)。

東海和平倡議的精神，除了重申我國對於釣魚台的主權，即是以和平為首要前提，呼籲各國在東海爭端中能夠自我克制，並在國際法的規範下解決爭端，同時為顧及東亞局勢和平。在釣魚台爭端以外，中國大陸和日本也引發在東海上的權益競逐，因此呼籲各國應該尋求共識，共同訂立東海行為準則，以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面對東海下蘊藏龐大資源，各國也應該合作共同開發，取代互相爭奪。

在中美日強權環伺下，我國在釣魚台議題上能爭取的籌碼並不多，此時馬英九政府提出「東海和平倡議」，為我國在這場爭端中爭取到一定發言位置，不至

於遭到邊緣化。同時也避免與中國大陸、日本與美國在對外關係上，掀起不必要的波瀾。

(四)兩岸政策未來展望：和平協議與軍事互信機制

馬英九政府在兩岸政策的施政上秉持先經後政原則，在馬英九第一任任期中，兩岸施政重點著重於經貿上的交流與相關協議談判，馬英九政府對於和對岸簽署 ECFA 視為其兩岸政策中重要的一步。馬英九順利連任第二任期，縱使 ECFA 後續協定仍未完全過關，外界仍舊好奇在先經後政的原則下，馬英九最後一任總統任期內，是否會與對岸展開任何政治談判，進而踏入兩岸政治深水區。

馬英九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拋出「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論述，兩區分別指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台灣地區為台澎金馬政府實際統治區域，大陸地區則是台灣地區外視為中華民國領土，論述的概念仍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運行，並作為馬英九第二任期中對中國大陸的行政方針。但對中國大陸來說，一國則認為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對一個中國的認知仍是各自表述。馬英九政府提出一國兩區說，即認為兩岸應該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

在 2007 年馬英九政府上任前夕，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全國代表大會中，宣示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下，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新華社網站，2007)。面對中國大陸主動拋出議題，表示兩岸可望在一中前提下，結束長達六十多年的敵對關係。總統府在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召開記者會，回應表示兩岸推動和平協議簽署並無時間表，推動兩岸和平協議必須秉持國家需要、民意支持與國會監督三原則下並交付人民公投，該政策同時納入馬英九政府黃金十年政策中其中一環。(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稿，2011)。

中國大陸在 2008 年馬英九政府上任後，由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30 週年紀念談話中，提及兩岸在軍事問題上可望進行交流，並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但大陸方面提出的前提是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運行。但站在我國立場，不斷呼籲中國大陸兩岸已是分治事實，即便要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必須

在對等情況下才有可能，然而中國大陸方面則認為台灣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即為中華民國，方能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雖然在馬英九政府上任後，兩岸關係急速解凍，交流也越加頻繁，但就政治互信上仍有很大落差，讓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至 2013 年為止，仍舊沒有交集。

二、馬英九任內的國內情勢與重大新聞事件

2008 年馬英九挾著泛藍共主之姿，以 58.45% 的高得票率，擊敗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實現我國第二次政黨輪替。2008 年也是國內外局勢變化動盪的一年，我國邁向第二次政黨輪替，美國同樣也改朝換代，出現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開啟新局，對岸的中國大陸取得第一次奧運主辦權，得以向世界展示崛起中的大國自信。

馬英九政府一上任，對內得面對國內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對立的分裂局面，對外兩岸關係、台美關係的失衡。2000 年的網路經濟泡沫化，2008 年世界則遭逢美國掀起的金融海嘯襲擊，讓世界經濟為之蕭條，與陳水扁政府初上任時一樣，國家都處在動盪中需要謀求穩定。以下針對馬英九任內至 2013 年止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與國內情勢，分為十一個節次進行探討。

(一)金融海嘯與毒奶事件

2008 年 9 月，美國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宣布破產倒閉，掀起金融海嘯的第一波浪潮，讓原本已經陷入次級信貸危機的美國經濟狀況更加惡化，雷曼兄弟銀行倒閉變成骨牌效應，隨後美國國內多間金融機構、銀行紛紛宣布破產倒閉。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結果下，這波金融海嘯馬上就從美國席捲全世界，各地都有因金融海嘯而破產的受害者，遠在歐洲的冰島也因金融海嘯襲擊，面臨整個國家破產的危機。我國早已身處全球化經濟的重要一環，面對這波全球金融海嘯也難以倖免。

今年五月新政府上任以來，全球遭逢百年罕見的金融風暴，國際經濟動盪不安，新政府積極應變，不敢鬆懈。我們對外促進兩岸和平、爭取國際友誼；對內則力求族群與政黨的和解，希望在穩定的內外政治環境下，因應危

機，並從事深度的改革，包括抑制通膨、節能減碳、擴大基礎建設、增加就業、縮小貧富差距、強化經濟體質、嚴辦弊案、禁止非法監聽。(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美國雷曼兄弟宣告倒閉，在台灣一般民眾和銀行購買雷曼兄弟連動債金額高達 800 億元。金融海嘯的影響下，我國股市也遭受重創，馬英九政府上任至金融海嘯爆發四個月期間，股市市值蒸發九兆台幣，情勢比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時更加險峻。國內就業市場也跟著緊縮，失業率持續往上攀升，特別是青年失業率惡化更加嚴重。金融市場惡化，逼迫我國央行動用大筆資金救市，效果依舊有限。馬英九政府剛上任就遭受金融海嘯衝擊，讓原本剛上任還有六成六滿意度的馬英九政府，聲望因此下挫。

當全球因美國的金融風暴忙的焦頭爛額之際，中國大陸在同一時間爆發「毒奶粉事件」，影響之大也波及台灣。經大陸國台辦表示，由上海恆天然公司出口的二十五萬噸三鹿問題奶粉到台灣，表示問題奶粉在可控制的範圍內(聯合報，2008.9.13:A1)。這些由大陸生產的三鹿奶粉成分添加三聚氰胺，嬰兒食用後會造成腎結石甚至死亡，消息一出震撼國內民眾。

儘管國台辦聲明毒奶粉流向已經獲得控制，但在大陸方面事件遭人為刻意隱瞞，輸入台灣的毒奶粉早已在市面上流竄，奶製品、麵包、咖啡、濃湯都被驗出含有三聚氰胺反映一一淪陷，眼見毒奶粉風暴不斷擴散，從兩岸一舉成為全球風暴，逼的衛生署不得不下令禁止所有大陸奶製品進口至台灣，為不斷延燒的毒奶粉事件設下停損點。

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相互依賴程度加深。任何的疫情、污染或金融危機，短時間內就可波及全球，這次國際金融風暴跟大陸毒奶事件，讓我們深深警惕連結國際與兩岸，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不過，我們不要因噎廢食，反而要化危機為轉機，鬆綁開放的政策不會改變，但是政府必須全面加強安全控管與危機處理，將社會風險降到最低。(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馬英九政府上任未滿半年，隨即遭遇金融海嘯與毒奶事件兩項全球性風暴衝

擊，考驗新政府的應變能力。

(二)陳水扁貪汙案與陳雲林訪台

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新危機，國內也不平靜，陳水扁卸任後，並未從家族貪汙風暴中脫身。失去元首身分後，反而得面對一連串的司法審判訴訟，此時國內尚未擺脫朝野惡鬥的陰影，加上陳水扁為我國卸任元首因捲入貪汙案而遭審判，不僅社會大眾聚焦也具有極大爭議性。

新政府對過去貪腐引起的民怨，深以為戒！我們不僅要奉公守法，還要更高的道德標準來自許，為台灣找回清廉、正直、誠實、互信的核心價值。我們已開始實施「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嚴格規範公務員飲宴應酬、贈受財物的行為。為了維護五權憲法的精神，新政府上任後立即恢復監察院運作，讓憲政體制回復常態，也讓這個獨立機關發揮監察功能。(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馬英九在國慶總統講話致詞中，也特別針對貪腐議題做出回應。2008 年 11 月 11 日，馬英九政府上台將滿半年之際，陳水扁遭控五項罪名，在出庭應訊後當庭遭檢方逮捕，上手銬聲請羈押。也是我國史上第一位遭上銬羈押的卸任元首。成為在一連串貪汙、洗錢案當中遭到羈押的第十人，同時也是身分與層級最高的一位。

在陳水扁案結果揭曉前，國內政治情勢則因兩岸關係而動盪。2008 年 11 月 3 日，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造訪台灣，參加海基會、海協會的台北會談。陳雲林來台在兩岸關係上具有重大意義，是兩岸分裂六十年後，陳雲林為大陸官方正式授權至我國的最高層級代表。

在野黨民進黨面對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表示要發動 10 萬人包圍抗議，讓兩岸歷史性的會談充滿爭議。陳雲林造訪台灣四天期間，抗議群眾如影隨形，抗議群眾過程中包圍陳雲林下榻的台北晶華酒店，導致陳雲林受困在酒店中整整 8 個小時才得以脫身。陳雲林訪台最後一天與馬英九總統會面，民進黨表示要發演「圍城行動」，整起包圍抗議行動在陳雲林訪台結束前一天晚上，演變成警民流

血衝突的暴力事件。

第一次來台就遭受強烈抗議，陳雲林造訪我國仍留下不少的歷史性紀錄。簽訂四項協議，包括兩岸海運、空運、郵政和食品協議。陳雲林來台遭遇極大的抗爭浪潮，也促成新一波學生運動興起，野草莓學運孕育而生，要求政府為陳雲林來台期間爆發的警民衝突道歉。

(三)H1N1 疫情襲台

2009 年，金融海嘯仍讓世界局勢充滿動盪，墨西哥此時卻爆發「H1N1 A 型流感」疫情，這種極高傳染力的疾病在 2009 年三月於墨西哥爆發後，僅僅不過一個月的時間，即轉變為全球大流行。

5 月初，鄰近我國的香港和中國紛紛傳出 H1N1 確診病例，面對疫情在全世界肆虐，我國也開啟防疫措施，開啟邊境監控來自疫區的出入境旅客。疫情防線卻在 5 月 20 日台灣出現第一起 H1N1 確診病例而破功。儘管第一起確診病例並非本國籍，由於 H1N1 具有高度傳染力，能在數百人間迅速傳染，確診消息一傳開仍讓國內民眾高度緊張。5 月 25 日台灣確診病例迅速增加到九人，距離不過五天的時間，病患人數持續往上攀升。

幾個月前，H1N1 新流感在墨西哥流行時，又一次引起全球恐慌，雖然它不像 SARS 那樣致命，我們卻不敢掉以輕心。五個月來，政府與民間的防疫工作，不論是疫苗、藥物的準備與公衛措施的推動，都不輸給先進國家；感染率、致死率目前也控制在較低的水準，而國人在配合上的表現，更令人欣慰。秋冬即將來臨，H1N1 疫情可能再度升高，政府已有充分準備，有信心將疫情減到最低。（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H1N1 疫情肆虐台灣，過去經歷 SARS 疫情侵襲後，國內對於防疫工作有所提升，才不致讓傳染人數、死亡率失控。在 H1N1 疫情控制後，另一波危機卻重創民眾對馬英九政府的信心和形象。

(四)莫拉克颱風襲台：八八風災

2009 年 8 月 7 日，中度颱風莫拉克侵襲台灣，外界原本預期莫拉克可望為台灣紓解旱象，8 月 8 日襲台後卻在台灣南部創下單日破千毫米雨量，瞬間旱災變成水災，雨量一舉超越五十年前的八七水災。大豪雨重創南台灣，幾乎使三分之二的台灣都泡在水中。

南台灣遭受風雨重創，重災區多集中在高雄、屏東地區。8 月 8 日上午南台灣已遭逢水患，第一時間政府單位從地方到中央救災應變卻亂成一團。

從內政部長廖了以與屏東縣長曹啟鴻隔空互嗆，再到馬總統跳上第一線，親自向台北市消防局調度橡皮艇，公開點名批判氣象局預報不準，質疑水利署治水成效，顯見整個指揮體系紊亂(聯合報，2009.8.11:A13)。

災民指責政府救災應變緩慢、混亂，地方與中央政府非但沒有攜手合作，第一時間還交相指責，眼看民怨一發不可收拾，總統馬英九趕緊下令府院首長南下勘災，希望能平息災民的怒火。儘管總統和行政院長在災後通通站上第一線，救災混亂的情形仍沒有改善。

一位剛從台南縣災區回台北的搜救人員表示，「災區內資訊少，災區外訊息滿天飛」是最大問題，中央與地方訊息未能有效統合，中央災難應變中心官員「看電視救災」，常造成重複派遣人力前往同一災區的離譜情形。(聯合報，2009.8.15:A2)。

由於救災指揮調度、災區資訊混亂，從八八水災發生後近一週後，救援隊伍靠徒步方式爬進與外界失聯的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這才發現整個小林村慘遭土石流掩埋完全消失，小林村已經遭到滅村，近五百名小林村民遭到活埋。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應變處置報告統計，至 2009 年 9 月 8 日為止，莫拉克風災共造成全台 769 人死亡，農損超過一百億元。

莫拉克風災帶來龐大的災害損失與死亡人數，加上事前災害防範不利、災變當下救災混亂，外界紛紛將究責的砲口指向馬英九政府。外界指責除了針對馬英九政府救災的顛預表現外，還有政府在災害應變過程中極差的社會觀感。電子媒體則爆料在風災發生當下，行政院長沒有坐鎮指揮防災跑去染頭髮、行政院秘書

長則去慶祝父親節，就連馬英九總統在風災前夕仍繼續跑選舉行程，媒體頻頻爆料讓遭指責救災不力的馬英九政府形象雪上加霜。

在八八水災後，聯合報於 8 月 19 日針對馬英九總統做信心民調，馬英九總統滿意度創下新低，僅僅只有兩成九，閣揆劉兆玄跌到只剩兩成。(聯合報，2009.8.19:A1)。與馬英九上任之初 66%的滿意度相比，八八水災不僅重創台灣，也重創馬英九政府形象。外媒 CNN 在同一時間也進行民調，指出有高達八成的民眾希望馬英九為此下台負責。(聯合報，2009.8.19:A3)。

眼見民怨持續沸騰，馬英九總統除了公開道歉，也即刻在風災後展開究責。國防部長陳肇敏、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率先請辭，隨後宣布九月初內閣將全面改組檢討。2009 年 9 月 8 日，八八水災過後一個月，行政院長劉兆玄無預警宣布請辭，一肩扛下所有責任。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也吹垮民眾對馬英九政府的信心，上任僅一年多的時間，挺過金融海嘯、毒奶事件後，卻因一場風災吹起馬英九政府的信任危機。

(五)美國牛肉進口爭議

2009 年 10 月，行政院宣布美國牛肉將大幅開放進口台灣，但其中包含帶骨牛肉、內臟、絞肉等部位，引發極大爭議。過去美國牛肉曾多次向我國叩關，陳水扁政府執政時期，因美國爆發狂牛症宣布禁止美國牛肉，中途雖一度開放，卻又因狂牛症再度爆發而禁止。

直到馬英九政府執政，美國牛肉再度成為台美間談判重點之一，美牛進口不單單只對畜牧業產生影響，美牛談判被視為台美間經貿合作的敲門磚，後續包括台美貿易框架協定 TIFA、台美免簽證待遇、軍購等都與其有相關聯。

由於過去美國曾是狂牛症疫區，我方在美牛議題的談判上，底線即是不開放內臟、絞肉等爭議部位，但卻在最後關鍵時刻政府底線大幅讓步，引發民眾對於食品安全的極高疑慮。美國牛肉進口問題不僅在立法院引發朝野間激烈的攻防，反彈、質疑、要求重新談判的聲浪四起，更讓台美關係緊張，使的台美間在 TIFA 重啟談判時程延後，被視為美國對台灣拖延美國牛肉放行的懲罰。

美國牛肉進口爭議問題，政府對談判底線大幅讓步，讓民眾對於馬英九政府政策及處理手法的不信任再度升高，美國牛肉進口一案更一度在立法院卡關無法通過。爭議延燒兩個月後，在 2010 年 1 月 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美牛進口案，但結果推翻原先台美談判內容，明定六大爭議部位包括內臟、絞肉、腦部等禁止進口。讓美方批評台灣在貿易談判上誠信盡失。

美國牛肉進口案爭議爆發，不僅影響馬英九政府威信，也連帶打擊在 2009 年的國民黨縣市長選戰，雖然最終國民黨贏得席次較多，但總體得票率卻是大幅下降，外界認為國民黨實際上是輸了這場選戰。

2012 年，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順利連任，上任後推行開放含瘦肉精美國牛肉進口，過去瘦肉精曾引發健康問題疑慮，馬英九政府的這項再度引發美國牛肉進口爭議，雖然順利連任總統，但因為美牛政策失當，根據 TVBS 民調中心調查馬英九在美牛政策影響下，滿意度跌破三成只有 28%。馬英九政府在美國牛肉議題上兩度進退失據，不僅影響縣市長選舉結果，更重創民眾對其執政的信心。

(六)司法官貪瀆與司法改革

2010 年 1 月 20 日，檢察總長陳聰明遭到監察院彈劾，成為馬英九政府第一個遭到彈劾的政務官，同時也是我國第一位遭到彈劾的檢察總長，陳聰明因為與涉入陳水扁貪汙案的關係人見面，監察院認為陳聰明的作為影響司法公正與威信，同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與檢察官守則才提案將他彈劾。

陳聰明遭到彈劾影響司法公正威信，但相關爭議卻不僅於此。7 月 14 日，台灣高等法院四位司法官遭特偵組查出，涉嫌貪汙收賄遭到聲押。消息一出震驚各界，幾乎讓司法威信顏面掃地，司法官貪瀆案造成司法院長賴英照請辭下台，希望為這場司法風暴止血，也促使馬英九政府啟動司法改革的腳步。

啟動全民司改—近來法官收賄、法院裁判品質與效率問題，遭到社會嚴厲批評。我們認為司法當然必須獨立，可是不能孤立於社會、不能背離人民的合理期待。司法一定要能保護善良的人民，這是最起碼的正義。未來的司法改革必須是「全民的司法改革」，應該從民眾的角度，理解人民對司法的期

待與人民經歷訴訟的苦痛。現在司法院新的正副院長已經產生，加上半年前就任的法務部長與檢察總長，形成一個新的司法團隊，深信他們一定會回應社會期待，成為「全民司改」的主要推手。(總統府公報 6944，2010)。

馬英九宣示將成立廉政署，成為專責的肅貪機關，而在司法貪瀆案件爆發前，立法院四月三讀通過「速審法」，作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如今成立廉政署，則是希望能挽救因貪瀆、關說而搖搖欲墜的司法威信。

(七)五都選戰

馬英九在競選期間提出的重要政見之一，即是把台中縣市合併升格，2009年4月3日，三讀通過地制法修正案。為新直轄市合併升格取得法源依據，經過內政部審查後，其中包括台北縣、高雄縣市合併、台中縣市合併、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為新直轄市，包括台北市在內台灣五都正式成形，對台灣行政區和政治版圖的劃分有重大影響。

以「政府再造」為例，我們將行政院組織從37個機關減為29個，這是20年來許多任政府想做，卻無法做到的大工程，我們做到了。

我們實施縣市合併升格，舉行5個直轄市選舉，讓北中南平衡發展，提升城市競爭力，帶動區域經濟，這也是劃時代的變革，我們也做到了。(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

五都成型後，隨之而來的2010年底直轄市長改選選戰，對上一次縣市長選戰失利的國民黨來說，五都選戰選民佔全台六成以上人口，不僅被視為對馬英九政府的執政信心投票，同時也是2012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執政黨有輸不得的壓力。

五都選戰的結果揭曉，國民黨拿下台北市、新北市與台中市，民進黨則為台南市與高雄市。其中國民黨在台中市的選戰差點遭到逆轉，只能算是險勝。在得票率方面兩黨幾乎打成平手。對馬英九政府來說，五都選戰的考驗算是勉強過關，但即使五都贏得三都，得票率仍然大幅流失，顯見對馬英九政府的執政警訊仍未消失。

(八)油電雙漲與政策爭議

2012 年馬英九擊敗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連任總統，順利展開第二任期，除了繼續深化兩岸在經貿間的發展與協議過程，最大的挑戰是來自國內經濟發展的困局。台灣歷經金融海嘯與產業外移的挑戰，國內薪資已長期停滯不前，卻還得面對物價上漲帶來的衝擊，長期下來也衝擊經濟發展。

然而面對經濟困局，馬英九政府在順利連任後，立即宣布油價、電價調漲計畫，立刻引發在野黨與民眾的批評聲浪。在油電雙漲的政策拍板定案後，儘管政府宣示穩定物價的決心，但是根據 TVBS 民調中心調查，有高達 88% 的民眾擔心物價將全面飆漲，更有七成民眾對政府穩定物價沒有信心(TVBS 民調中心，2012)

民眾對馬英九政府信心不足，表現在其推行的政策上，除了油電雙漲爭議外，馬英九政府還宣布將有條件解禁添加萊克多巴胺的美國牛肉，儘管強調有三管五卡等配套措施把關，根據 TVBS 民調，仍有高達 78% 民眾反對進口添加萊克多巴胺的美國牛肉進口。其後馬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改革如證所稅復徵、二代健保改革，在政策上的搖擺與溝通不良，都導致改革政策遭受極大阻礙，其中證所稅與二代健保改革，因其中爭議問題皆導致有內閣閣員因此下台。

馬英九順利連任總統第二任期，還未宣誓就職，即因油電雙漲、物價上漲和證所稅風波爭議，根據 TVBS 民調中心調查，馬英九總統的滿意調滑落至 20%，不滿意度高達 64%。(TVBS 民調中心，2012)。第二任期還未開始，即因為各項爭議政策、推行過程中與在野黨、社會的溝通不良，在在都為馬英九政府造成威信上的傷害，並反映在低落的支持度上。

(九)廣大興案與漁權爭議

2012 年 9 月 10 日，日本政府正式出資購買釣魚台，宣布釣魚台正式為釣魚台國有化，挑起我國、中國大陸與日本在釣魚台上的主權爭議。馬英九政府在爭議中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希望在東海衝突中尋求發言權與解決機制，台日在釣魚台爭議多時的漁權問題，於 2013 年 4 月 10 日簽署台日漁權協議，爭議多年的漁權問題終於平息，隔年 2013 年 5 月 9 日，我國屏東琉球籍漁船廣大興號在作業

過程中，遭到菲律賓公務船開槍攻擊，造成船長當場死亡。

菲律賓開槍殺死我國漁民，讓社會大眾極度憤慨，要求政府強硬處理，由於我國與菲律賓並無邦交關係，再加上廣大興事件發生於兩國重疊的專屬經濟海域，原本即存在漁權糾紛，讓廣大興號事件更加棘手複雜。

馬英九政府即刻要求菲律賓政府為廣大興案正式道歉，但面對菲律賓政府的態度反覆，我國正式對菲律賓實施制裁手段，連續兩波的制裁行動，從旅遊、經貿措施實行，讓台菲之間的外交關係降至冰點。同時，為宣示我國對專屬經濟海域主權，國防部派出艦隊至爭議海域進行護漁操演，政府要求菲律賓政府答應「道歉、賠償、懲凶、漁業協定」等四訴求，才會解除針對菲律賓政府的十一項制裁行動。

台菲外交因廣大興案緊張而降至冰點，但雙方政府仍以外交途徑斡旋，並互相派出調查團進行調查工作，廣大興案經過四個月後，終於獲得菲律賓政府對四項訴求的正式回應，外交部同時宣布於 8 月 8 日解除對菲律賓的四項制裁行動。儘管後續的司法行動仍持續進行，但已宣告廣大興案暫時落幕，馬英九政府在面對和日本與菲律賓的漁權爭議上，透過外交談判與斡旋手段，成功讓爭議平息。

(十)洪仲丘案與公民運動崛起

2013 年 7 月，陸軍義務役士官洪仲丘於軍中死亡，洪仲丘原本將於 7 月 6 日退伍，卻因攜帶具備照相功能手機進入軍營，違反安全規定遭軍方關禁閉處分，卻在禁閉室中死亡。事件經過媒體披露，懷疑洪仲丘疑似是遭受虐待與不當管教才因此死亡。洪仲丘死亡案在媒體報導下越演越烈，社會輿論質疑軍方在處理過程中充滿瑕疵，批評軍檢調查過程草率，引發社會大眾強烈不滿。眼見事態擴大，馬英九總統也做出回應，重話要求國防部對這件管教不當造成的遺憾，要求徹查還要公布真相，與家屬將心比心。(聯合報，2013.7.16:A1)。

馬英九親自前往探視洪仲丘家屬，並當著媒體的面許下承諾，表示洪仲丘案他管定了，要求軍方加快調查腳步，給家屬和社會大眾一個交代。但即使馬英九出面仍沒有澆熄民眾的怒火，公民團體「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發起萬人包圍國

防部行動，要聲援洪仲丘案，迫使國防部副部長出面道歉。

7 月 24 日，馬英九於國民黨中常會中為洪仲丘案鞠躬道歉，並將事件形容為軍中違法濫權的情事，要求國防部在時限內提出具體的軍中人權改革方案。隨著洪仲丘事件調查持續進行，馬英九以總統身分親上火線多次發表談話，國防部長高華柱則因此兩度請辭下台負責。洪仲丘案調查進度緩慢，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決定發起二次抗爭，於 8 月 3 日號召白衫軍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舉行「凱道萬人送仲丘」行動。3 日當晚上萬群眾身穿白色衣服站上凱達格蘭大道靜坐示威，主辦單位宣稱現場高達 25 萬人上街靜坐。

數十萬名白衫軍走上街頭撼動台灣社會，這是繼 2006 年紅衫軍運動後，台灣另一場大規模示威抗議遊行，在依靠網路力量而非由政黨號召動員下，被外界視為台灣公民力量的崛起。在白衫軍遊行過後，促成軍審法修法，將軍法審判在承平時移往民間司法單位。

今年七月陸軍士官洪仲丘不幸事件發生後，我們立即修法將軍事審判移轉普通法院，並進行全面的軍政改革，既要保障軍人人權，也要維護軍中紀律，同時提升國軍戰力。英九承諾，我們不僅要讓我們的子弟安心服役，學習專業技能，更要重振軍人士氣，恢復軍人榮譽感，讓國軍受人民尊敬。（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2013 年是台灣公民運動活躍的一年，早在白衫軍運動前，2010 年發生的大埔圈地事件，在國民黨籍苗栗縣長劉政鴻強勢處理下，強行封鎖徵收農田毀壞農地，大埔居民因而籌組自救會起而抗爭。縣政府的強硬做為引發社會輿論譁然，當時行政院長吳敦義因此介入協調，居民雖接受政府換地政策，但最後仍造成被徵收農地農民仰藥自殺，事件仍以悲劇收場。

2013 年大埔開發案仍在進行卻又爭議再起，苗栗縣政府進行大埔區段徵收，對其中四戶存在爭議拒絕拆遷住戶，發文要求自行拆遷否則強制執行拆除，再度引來大埔自救會以及多個社運團體聯合抗爭。7 月 18 日，在大埔自救會及其他

社運團體北上抗爭之際，苗栗縣長劉政鴻抓住空檔，突然下令拆除大埔四爭議住戶之一張藥房房屋，事後劉政鴻還在媒體上指出這是「天賜良機」，引發社會輿論抨擊，一個月後由台灣農村陣線發起抗爭，再度重回凱達格蘭大道示威抗議，還佔領內政部靜坐表達訴求。

台灣公民運動除了白衫軍、大埔事件外，還有反核運動、反旺中媒體壟斷事件，蓄積能量更趨成熟。這些社會運動除了彰顯公民不服從的精神，其中還有來自對政府執政的不滿，馬英九政府在這些公民運動中，危機處裡進退失據，讓社會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與不信任，在一次次的公民運動中爆發開來。

(十一)九月政爭

2013年9月6日，特偵組召開記者會，檢察總長黃世銘指出，立法院長王金平向法務部長、高檢署檢察長關說，要為民進黨總召柯建銘捲入的背信案解套，認為立法院長王金平等人已經涉及行政不法。

隨後，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召開記者會，認為立法院長王金平的行為已經涉及不法，還指出國會議長涉入司法關說案是民主的恥辱，馬英九在記者會中對立法院長王金平說出重話。國民黨更在之後要撤銷王金平國民黨籍，使的王金平可能因為失去國民黨籍身分，也無法保有立法院長的職位。

關說事件爆發，讓國內政局為之動盪，外界認為這是總統與國會議長的政治鬥爭。負責偵辦的特偵組還出示部分監聽內容指控關說案，卻遭外界質疑監聽過程是違法濫權，遭到指控的民進黨總召柯建銘還形容，特偵組濫權監聽堪稱台灣版的水門案事件。由於關說案爆發當下，立法院長王金平本人並不在國內，面對國民黨要將黨籍撤銷，王金平一回國立刻提出訴訟，經法院裁定保留黨籍的假處份，成功保住立法院長資格。

關說案進入司法調查程序後，馬英九與行政院長江宜樺還同時接受傳喚，整起關說風暴中，由於負責監聽偵辦的特偵組也遭質疑是非法監聽，加上檢察總長黃世銘在案件偵辦中即向馬英九總統報告，也被指控涉嫌洩密。讓馬英九在這次的政治鬥爭中，正當性也遭到外界質疑。

根據年代新聞民調中心的資料，針對馬英九總統在這場九月政爭後的滿意度調查，連任一年多的馬英九總統滿意度只剩 9.2%，不滿意度高達 80.5%。(年代新聞民調中心，2013)。TVBS 民調中心也針對馬英九總統滿意度進行民調，馬英九在國民黨撤銷立法院長王金平黨籍後，滿意度跌落只剩 11%。(TVBS 民調中心，2013。)

在這場九月政爭中，馬英九非但沒有成功拔去王金平立法院長的職務，卻因違法監聽疑雲，加上檢察總長違法洩密，反而在這場政治風暴中重創政府威信，讓民調低迷的馬英九政府滿意度再創下新低。九月政爭後即是國慶典禮，王金平仍是以國會議長的身分主持國慶大典，國慶大會上馬英九與王金平如何互動，也成為當時媒體及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

在馬英九接下來的總統任期中，包括 ECFA 後續的服貿協議、貨貿協議推動以及其他重要政策議案，仍須仰賴立法院長王金平的協助，九月政爭無疑是為馬英九政府接下來的執政歲月，埋下更不穩定的因子。

三、內在分析：馬英九國慶演說實質內容

馬英九國慶演說的實質內容分析，分析文本從馬英九 2008 年上任至 2013 年為止，共計六篇國慶演說文稿。內容依照議題同樣區分為五大議題進行實質內容分析。

(一)國家主體意識：感性訴求—中華民國為主體

在國家主體意識議題中，馬英九在國慶演說中多數使用感性訴求呈現，其次在感性訴求之中，夾帶可信度訴求於其中，讓可信度訴求的比例緊追在感性訴求之後。

今天是中華民國的生日，九十七年前的今天，武昌起義的槍聲震醒了古老的心靈，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結束了五千年的皇權專制，開創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近百年來，中華民國走過內憂外患的坎坷歲月，憑藉著堅毅的立國精神，我們無所畏懼，總能在每一次跌倒的時候，立刻站起來，繼續向前進！（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中華民國發展歷程曲折艱辛，在臺灣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段歷史的參與者與建構者。我們曾經抵擋了中共軍事進犯，確保臺澎金馬安全；我們奮力打拼，安然度過了多次世界經濟危機。在這塊土地上，我們胼手胝足，推動地方自治，普及國民教育，厚植國防實力，更開創了經濟繁榮與政治民主的雙重奇蹟，這是華人世界絕無僅有的成就，我們深以臺灣為傲。（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

在馬英九執政六年歲月中，對於國家主體意識議題的探討，大多著重在中華民國建國的艱辛過程，其中適逢民國九十九年和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其中的數字更是深具意義。因此，馬英九在針對國家主體意識的論述上，多在於中華民國一路走來的歷史，其次才是與台灣主體的連結。

這六十年來，中華民國與臺灣的歷史與文化早已結合為一。所謂「臺灣精神」，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展現在曾為這塊土地打拼奮鬥人民身上的價值與風範。從日據時代記述臺灣先民歷史的連雅堂，推動民權啟蒙的蔣渭水，抵抗日人壓迫的莫那魯道，播種臺灣文學的賴和，到近代推動土地改革的陳誠，開創經濟轉型的李國鼎、孫運璿，以及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數十年來爭取民主人權的志士。百年來，這些人堅持理想，是「臺灣精神」的代表人物。（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今天我們要以莊嚴崇敬的心情，向懷抱理想、不畏犧牲的革命志士致敬。他們包括廣東的陸皓東、湖南的黃興、浙江的秋瑾、福建的林覺民、臺灣的羅福星。這些民國英雄，只是少數中的少數。過去一百年，從開國、北伐、抗戰、戡亂到保臺，不知折損多少仁人志士，他們絕大多數是無名英雄，奉獻了青春、犧牲了生命，卻照亮了中華民國的天空。（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馬英九六篇國慶演說講稿中，使用感性訴求描述建國的艱辛和歷史，其中則有相當篇幅其中交叉使用可信度訴求，如過去創建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先烈到台灣名人，從創建民國到在台生根，呈現出承先啟後的味道，大量列舉歷史與目前台灣人物，加深在國家主體意識上歷史脈絡的深度。

(二)外交：理性訴求—呈現政策成果

馬英九在外交議題論述上，幾乎一面倒使用理性訴求，其中多強調我國其所採取的「活路外交」成果，著重在數字層面上的表現以及和其他國家簽署協定的結果。

活路外交是正派外交、人道外交，更是軟實力外交，不僅拓展了臺灣的國際空間，也為我們贏得國際社會的尊敬。今年七月，我國在高雄市舉辦第八屆世界運動會；九月，在臺北市舉辦第二十一屆夏季聽障奧運會。這兩項大型國際賽會，我國都有極為亮麗的表現。不但中華健兒贏得史上空前數量的獎牌，在參賽 100 多個國家中分居世界第 7 及第 5(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今後我們要繼續推動活路外交，更加鞏固與邦交國的關係，增進與美國、日本、歐盟、東協、紐澳等無邦交國的高層互信，並擴大國際參與。十天前，英國成為第七個與我國簽署青年打工度假協定的國家；五天前，荷蘭也給我們 6 個海外領土的免簽證待遇；後天布吉納法索給我們落地簽證待遇將正式生效，使國人享有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國家（地區）總數達到 124 個，比英九上任時增加了 70 個國家（地區）。(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近年來與第二大貿易夥伴日本的關係持續改善，使得兩國的交流日趨密切，兩年來兩國航空班機增加 45%，航點增加 90%。去年與日本簽署「臺日投資協議」後，今年日商來臺投資案件成長 26%，居外商第一名。我們與新加坡和紐西蘭協商經濟合作協定的進展也相當順利。我們也和若干亞太國家展開經濟合作協定的可行性研究。(總統府公報 7054 號，2012)。

在馬英九的外交議題中，最主要宣揚的即是「活路外交」政策，同時馬政府積極與各國在免簽證、實質經貿交流上努力，取代過去與中國大陸在外交場域上的正面交鋒。因此在外交議題上，仍是以數字增長等理性訴求呈現。

從台灣在國際合作下舉辦國際賽事、各國免簽數目和台日開放天空後的運量、經貿增長，以具體數字呈現政策施政結果。

(三)經濟：理性訴求—數字呈現經濟成果

經濟議題方面，以理性訴求主，馬英九在呈現理性訴求上仍是強調數字上的表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理性為主的經濟議題中，在馬英九第一任期時，由於遭遇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國內經濟連帶遭受重挫，在新政府尚未帶出經濟表現，又遭逢重大挑戰下，經濟議題的論述則改以感性訴求，向全民進行信心喊話。

我國競爭力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排名從去年第 17 名一口氣上升到今年第 12 名，進步了 5 名；也在世界銀行「2010 年全球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0)中從 61 名上升到 46 名，進步了 15 名。經建會的景氣燈號已連續三個月呈現黃藍燈，今年第三季的經濟情況又比第二季明顯改善，代表景氣已脫離谷底，經濟開始回穩。(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今年 5 月瑞士國際管理學院(IMD)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排名世界第六，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今年 9 月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全球競爭力評比，我國競爭力分數創五年來最高分，排名全球第十三，其中有 8 項指標全球第一。(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依據 2012 年的統計，每 100 美元貿易額中，可以獲得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免稅或優惠的金額，新加坡高達 63 元，韓國也有 34 元，我們原本只有 0.14 元，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生效三年後，才增加到 4 元，但仍然遠遠落後新加坡與韓國。(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在馬英九六篇國慶演說當中，有三年都出現以全球性經濟數據排名作為經濟論述的基礎，引用上升的數據告訴國人，經濟風暴已經度過，一切將要好轉。同時也用貿易額的數字，凸顯我國與其他國家間的競爭差距。雖然在經濟議題中，幾乎一面倒使用理性訴求呈現，但在馬英九政府第一任期，隨即遭遇全球性金融風暴，加上新政府尚未有任何經濟施政成果，改以感性訴求呈現經濟議題。

我們深刻體會經濟不好，帶給民眾的痛苦。這些痛苦一日不能消除，我們政府的責任就一日未了。各位父老鄉親，這段日子以來大家辛苦了，最近美國發生金融風暴，台灣受到牽連，景氣也不好、股票下跌、頭路難找、生

意很難做，大家日子過得很辛苦，你們的痛苦我都瞭解，我心裡也很難過。(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在馬英九第二任期中，雖度過金融海嘯衝擊，還得面對全球經濟整合的挑戰。因此除了理性訴求呈現經濟議題，馬英九同時也運用可信度訴求向國人喊話，希望國人能支持國家當前的經濟政策。整體而言，在經濟議題中仍以理性訴求為主。

(四)兩岸關係：理性訴求—宣示政策、協議為主

馬英九在兩岸關係的政策推動上，以兩岸經貿 ECFA 協議為主，因此在兩岸關係議題上，以闡述政策的理性訴求為主要策略，其次則是個人可信度訴求。

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以及「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下改善兩岸關係，是台灣民眾共同的期望，但是我們不會一廂情願。兩岸交往過程，政府一定落實「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台灣的權益，不容退讓；台灣人的尊嚴，一定堅持！(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馬英九在上任之後，即強調其兩岸政策的基礎，即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以「不統、不獨、不武」為原則，處理兩岸關係，這樣的政策宣示，在馬英九六篇國慶演說當中，除上任第一年做出宣示外，在民國 99、100、102 年的國慶演說中，也不斷重複出現。在政策宣示之外，另一個不斷出現的則是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與中國大陸簽署的各項協議，也成為兩岸關係議題中細數的項目。

我們相信未來包括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MOU)、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內，還有很多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的工作，等待我們去開展。(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我們兩年前與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今年 8 月又簽訂了「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兩岸海關合作協議」，以及「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目前 ECFA 後續談判正緊鑼密鼓地進行中。(總統府公報 7054 號，2012)。

五年多來，兩岸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簽署了 19 項協議，

實現了海空運直航、陸客來臺、司法互助、經濟合作等交流，其中包括三年前簽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與今年六月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總統府公報 7109，2013)。

從歷年的國慶演說中可以發現，馬英九總是不忘逐項點出與中國大陸簽署的重要協議，藉此彰顯兩岸在交流談判上的實質成果。在理性訴求之外，兩岸關係議題中另一個使用的為可信度訴求。

各位先進、各位同胞：辛亥雙十是海峽兩岸共同的記憶與資產。因此，英九要藉這個機會，呼籲大陸當局：紀念辛亥雙十，就不能忘記國父建國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國家，大陸應該勇敢地朝這個方向邁進。(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四天前，蕭前副總統以我國領袖代表的身分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在印尼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談，陸委會王郁琦主委也與大陸國臺辦的張志軍主任會面，並互稱官銜。這都是兩岸在「正視現實，互不否認，共創雙贏」的基礎上開創的成果。(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就像嘉義電子商務業者「東京著衣」，七年級的品牌總監周品均小姐告訴我，她大力支持兩岸「服貿協議」，因為政府為電子商務業爭取到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優惠待遇(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兩岸關係議題中，主要使用理性訴求呈現兩岸在談判上的具體結果外，也使用可信度訴求，如馬英九以總統身分的宣示，派出官員或黨政要職人員與對岸領袖進行實質交流，或是在宣傳兩岸經貿政策時，列舉台灣企業家為政策背書。

(五)內政：理性訴求—數字呈現政策成果

內政議題上，以宣示政策為主要目的，因此以理性訴求為主要呈現方式，另外馬英九多以總統身分做政策宣示，可信度訴求則為其次呈現方式。以理性訴求呈現的內政議題，更可以發現馬英九總統習慣使用大量的數字，來呈現政策實施的具體成果，使用大量數字呈現政策的方式，與一般只使用文字敘述的呈現方式相當不同。

事實上，在莫拉克颱風造成災害前，就有 21 個村落的 33 位鄉長、村長、警員與土石流防災專員，斷然撤離 9,100 人到安全地區。如果當時沒有及時撤離，死傷估計還會增加 1,046 人。(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災後政府與各地民眾、慈善團體，熱心積極投入災區服務，踴躍捐輸，捐款總額達 178 億餘元；國軍出動超過 56 萬人次，警察、消防與工程人員出動超過 41 萬餘人次，志工超過 14 萬人次投入救災行動。(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2009 年發生的莫拉克風災重創台灣，馬英九政府在救災方面遭外界指責慢半拍，也重創馬英九政府的形象與民眾信心，嚴重風災也導致兩個月後的國慶大會決定停辦，在國慶演說當中，馬英九將災區各項數據、撤離與救援人數等在演說當中呈現的巨細靡遺，希望擺脫救災不力的罵名，同時宣示防災政策為「防災重於救災」並將國軍納入救災系統。

在內政議題中使用數據呈現的不僅只是莫拉克風災後的相關國土政策，在環保、政府組織再造中也多用數據說明。

一年來全國民眾節省電量 45 億度，相當於臺南縣市 187 萬居民的全年用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減少了 288 萬公噸，相當於 7,784 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以「政府再造」為例，我們將行政院組織從 37 個機關減為 29 個，這是 20 年來許多任政府想做，卻無法做到的大工程，我們做到了。(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

去年我們的捐血率 8%，在世界數一數二；我們認養了 30 萬貧童，20 萬人在國外；每年慈善捐款超過 350 億元，絕大多數來自一般人民。(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除了理性訴求外呈現內政議題，其次則是可信度訴求，以總統高度為政策背書。其中，2013 年發生因不當管教虐死士兵的洪仲丘案，馬英九即是使用可信度訴求，為政策改革背書。

今年七月陸軍士官洪仲丘不幸事件發生後，我們立即修法將軍事審判移轉普通法院，並進行全面的軍政改革，既要保障軍人人權，也要維護軍中紀律，同時提升國軍戰力。英九承諾，我們不僅要讓我們的子弟安心服役，學習專業技能，更要重振軍人士氣，恢復軍人榮譽感，讓國軍受人民尊敬。(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當時洪仲丘案引起社會極大爭議，還造就新一波公民社會運動崛起，迫使馬英九政府不得不出面正式回應，同時在國慶演說中使用可信度訴求方式，以總統身分做出承諾。

雖然在內政議題中，以總統身分對政策進行宣誓已是常見方式，但在國慶演說中針對單一個案做出回應則較為特別。

(六)小結

總結馬英九在六篇國慶演說中的實質內容分析中，在國家主體意識議題中，使用感性訴求論述，但內容偏重中華民國創建的歷史過程，由於馬英九執政期間遭遇民國九十九年與民國一百年，數字上具有特殊意義，因此馬英九在國慶演說中對於國家主體意識的論述上，首先注重中華民國的歷史脈絡，以及遷台後六十年與台灣的連結。

在外交議題中，由於外交是馬英九政府表現最為亮眼的領域，這六年來推展活路外交成果斐然，不僅與多數國家達成免簽協定，經濟上更受到外交議題嘉惠，與多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因此在外交議題呈現上，及多使用數字來呈現目前給予我國免簽國家的數目，彰顯政府在外交領域上努力的成果。

然而馬英九在國慶演說中特點，及是相當喜愛講述數字和相關數據，不僅僅是在外交方面發揮，在經濟、兩岸關係和內政方面，都大量使用數字和政策宣示並陳的理性訴求方式呈現。

四、內在分析：馬英九國慶演說風格形式

在馬英九國慶演說中風格形式分析中，將其國慶演說分為五大議題進行分析。從中進行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分析。

(一)國家主體意識：反覆、排比—語勢澎湃

在馬英九的國慶演說中，國家主體意識議題多訴諸中華民國歷史脈絡以及建國之艱辛，其後才逐漸與台灣主體意識連結，強調台灣精神之重要。但整體而言仍以中華民國為主體論述。消極修辭上，馬英九用詞多強調「我們」，以拉近距離感並使用肯定語氣。積極修辭則多使用排比與反覆等方式，更加強化語氣、情緒上的表現。

再過四百多個日子，就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一百年前革命先烈的呼喚，仍在我們耳邊迴響；一百年前建國先賢的理想，仍在我們眼前閃耀。民有、民治、民享依然是我們共同的誓言；民族、民權、民生仍是我們奮鬥的目標。為了慶祝這個偉大的日子，並告訴我們的子孫，中華民國在狂風暴雨中，永遠屹立不搖。（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在國家主體意識中，馬英九多在國慶演說中提到國父、革命烈士建國的理想，並運用反覆與排比加強語氣，如文中的「民有、民治、民享」和「民族、民權、民生」等排比方式。其後並將歷史脈絡，延伸至中華民國遷台六十年的歷程。

六十多年來，中華民國不僅保障了臺澎金馬的安全，延續了中華文化的命脈，創造了臺灣經濟與政治的奇蹟，實現了臺灣先賢追求議會自治的理想，而且還向世人證明：民主可以在華人社會的土壤中生根、開花、結果。

今天，臺灣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富足的生活，也凝聚對國家—中華民國—堅實的認同，中華民國憲法更早已成為全民共識的基礎。國父建國的理想，當年在大陸沒有機會實施，如今卻在臺灣完整實現。（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活力創新的中華民國、人文關懷的中華民國、開放自信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形象。（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從歷史脈絡的延伸下，馬英九將國家主體意識的主軸擺在中華民國上，並將台灣作為中華民國主體的延伸，強調對中華民國主體意識、國家意識的認同，同時運用排比加強語勢。

(二)外交：略語、排比—肯定語氣

在外交議題中，馬英九主要希望彰顯政府在推展活路外交政策的成果，因此

羅列出與其他國家簽署各項協議、免簽甚至是主權談判的成果，除了用數字呈現外，卻也包含許多專有名詞的使用，在消極修辭上使用略語，即是對相關協議或組織的簡稱，卻有可能造成聽眾困惑，拉大演講者與聽眾的距離感。在積極修辭方面，則多使用排比和比喻的方式，羅列出政府在外交領域上的具體成果。

不論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袖會議、「政府採購協定」(GPA)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參與，都有突破性進展。我國在今年五月批准聯合國 1966 年的兩項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也頗受國際人權界好評。(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我們也參加缺席 38 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加入曾經被拒絕 6 年的「政府採購協定」(GPA)，並與美國重建高層互信，恢復重要軍購，也重啟「貿易投資架構協議」(TIFA)的協商。(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

國慶演說中強調政府參與的各項組織，不論是英文或是中文名稱，屬於專有名詞或是省略性用語，在外交政策和成果的宣示上，無法有效和聽眾拉近距離，還會因此造成聽眾混淆。此外，在宣揚外交成果上，則使用時間排比的方式，強調政府在外交上逐步展現成果，也呈現出韻律感。

十天前，英國成為第七個與我國簽署青年打工度假協定的國家；五天前，荷蘭也給我們 6 個海外領土的免簽證待遇；後天布吉納法索給我們落地簽證待遇將正式生效，使國人享有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國家（地區）總數達到 124 個，比英九上任時增加了 70 個國家（地區）。(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不僅使用天數呈現還有使用月份排序，由於發生與日本在釣魚台海域的漁業爭端，與菲律賓的廣大興號事件，都在考驗政府在外交場域上斡旋、談判的實力，馬英九在 2013 年國慶演說中，強調該年是活路外交的收豐年，強調二到八月分都有實質成果，使用月份排序，增強在外交議題上的論述力道。

今年二月，我們和美國簽訂「特權、免稅暨豁免協定」，使雙方互派人員可以獲得更多保障；三月，我們和美國重啟延宕六年的「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之下的談判，頗有進展；四月，和日本簽訂「臺日漁業協定」，

解決了困擾兩國四十多年的漁業糾紛，達成「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步」的目標；五月，我們第五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大幅增加我方的雙邊會談次數與國際能見度；七月，我國也和紐西蘭簽訂「臺紐經濟合作協定」，這是我國與無邦交國簽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意義重大；八月，我們解決了與菲律賓就廣大興 28 號漁船的爭執，為我國漁民爭取到正義與權益；九月，我國以特邀貴賓的身分，參加了睽違四十二年的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就在這個月，我們派遣蕭前副總統萬長先生出席亞太經濟合作（APEC）的領袖會議，與美國、中國大陸、日本等多位亞太經濟體領袖或領袖代表舉行雙邊會談，進一步創造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等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由於活路外交強調要讓國家走出去，因此在用詞上，馬英九也使用比喻等修辭手法，強調國家外交不能再是鴛鴦心態，明喻在外交場域上，必須正面迎接各項挑戰。

(三)經濟：比喻、設問、排比—用語生動

在經濟議題上，馬英九在國慶演說中的應用多元，消極修辭中使用上，雖然對於經濟層面遭逢的挑戰，大部分仍使用經濟數據呈現，但也使用俗語、呼告等方式，讓用語不致太疏離。積極修辭上運用更多元的方式呈現，如排比、呼告、反覆、映襯和反問等等，加強國慶演說中經濟議題的語勢。

人家說「天公會疼惜努力的人」，我們台灣的經濟基礎非常好，我希望大家一起來打拚，疼惜台灣、建設台灣，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度過這個難關。（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俗話說：「打斷手骨顛倒勇」，臺灣不但沒有被金融海嘯擊倒，反而比以前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應付外來的挑戰。（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馬英九政府一上任，立即遭遇百年一見的金融海嘯衝擊，導致全球包括台灣經濟全都走向谷底，為了激勵社會大眾對經濟前景的信心，馬英九使用台語俗語

比喻國內目前經濟現況，希望拉近和社會大眾的距離，

我們首先遭逢國際金融海嘯，全球許多銀行倒閉，股市狂跌，人心惶惶，伴隨而來的是出口停滯、訂單銳減、經濟衰退、失業大增。(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各位鄉親：大開放、大身手、大舞臺、大希望，這就是我們對青年的大承諾。

各位鄉親：我們希望將來的臺灣，是具有三高特質的自由經濟島：人民的生產力高，產品的附加價值高，更重要的，人民的所得與福利也要跟著提高。(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其次，在經濟數據以及經濟政策的宣示外，也多使用排比方式增強語勢，不論是在描述經濟遭遇的困境，或是政府可望提供的經濟政策前景，都使用排比加強語氣。

現在臺灣經濟固然快速復甦，但是經濟發展的果實，如果不能為全民分享，創造再高的經濟成長率又有什麼意義？(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

在國際經濟上，我們要做面對自由貿易挑戰的勇者，還是要做躲在保護主義傘下的弱者？(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依據 2012 年的統計，每 100 美元貿易額中，可以獲得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免稅或優惠的金額，新加坡高達 63 元，韓國也有 34 元，我們原本只有 0.14 元，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生效三年後，才增加到 4 元，但仍然遠遠落後新加坡與韓國。各位鄉親，我們還能不急起直追嗎？(總統府公報 7109 號，2013)。

同時，為了向社會大眾推行政府經濟政策，並且說服民眾認同政府對於經濟的規劃，馬英九在經濟議題上也使用不少反問手法，甚至是將經濟對手韓國搬出來做映襯，強調政策推行已經刻不容緩。

(四)兩岸關係：專語、排比—語勢澎湃

在兩岸關係議題上，在馬英九政府上任後，兩岸在和解的態勢下展開更全面

的交流，從經濟協定的簽署、結束外交上的競逐，甚至向對岸開放也影響到我國在內政上的建設。因此，在兩岸關係議題上與其他四大議題均有所連結，在此將聚焦於馬英九所推行的兩岸政策上。

馬英九在任內推行的兩岸政策一直到其連任後，都仍是以經貿關係為主要發展主軸。因此兩岸關係議題也圍繞在我國與中國大陸簽署的各樣協議上，協議的名稱也不斷重複提起，在消極修辭上使用專語與略語，聽眾並不容易明白。其次，馬英九對兩岸政策推行的原則，在其任內也不斷複誦。兩岸政策就像文字遊戲，修辭呈現上不僅字數一致、排比，聽起來韻律感十足，但也因此在馬英九兩岸關係的呈現上，用詞缺少比喻、生硬而非生動。

我們相信未來包括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MOU)、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內，還有很多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的工作，等待我們去開展。(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我們兩年前與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今年 8 月又簽訂了「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兩岸海關合作協議」，以及「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目前 ECFA 後續談判正緊鑼密鼓地進行中。(總統府公報 7054 號，2012)。

馬英九推行的兩岸政策，圍繞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上，在其架構下又包含眾多協議。因此，在馬英九六年的執政過程中，幾乎是每年都會提起相關協議名稱，內容不僅重複性高，隨著簽署進度覆誦的協議名稱也跟著增加。

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以及「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下改善兩岸關係，是台灣民眾共同的期望，但是我們不會一廂情願。兩岸交往過程，政府一定落實「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我們與大陸簽署十四項協議，每一項協議都做到「對等、尊嚴、互惠」、「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捍衛了國家主權與臺灣尊嚴。(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

過去三年多，政府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為基礎，推動兩岸關係，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現狀，並得以大幅降低臺海緊張，贏得國際社會的肯定與支持。三年多來，我們與大陸簽署 15 項協議，每一項協議都做到了「對等、尊嚴、互惠」、「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總統府公報 6996 號，2011)。

同樣被不斷複誦的，還有馬英九政府在推行兩政策上奉行的基本原則，如「不統、不獨、不武」、「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或「對等、尊嚴、互惠」等原則。雖然透過排比等方式，可望加強語勢效果，但若拉高到馬英九執政六年的國慶演說整體來說，則淪為生硬的政策宣示，缺乏新意也欠缺生動。

(五)內政：反覆、排比、映襯—肯定語氣

在內政議題中，實質內容上多用數字凸顯政府施政成果，在風格形式分析中，則多以肯定的語氣、加強語勢為主，如以總統自身做出承諾，為政府推行的政策做出保證，如此一來，在消極修辭上不論是以數據或是政策宣示，表現都相當簡單明白，積極修辭中則加強氣勢。除去政策宣示外，在莫拉克風災時，一改政策宣示的生硬用詞，使用比喻修辭或是適時運用映襯，讓用語顯得生動。

這也再一次印證：面對極端而多變的氣候，「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料敵從寬、禦敵從嚴」、「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的策略是正確的。(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

在內政議題政策原則上，呈現方式與兩岸關係議題有相似之處，多運用文字排比、字數相同等方式，顯示出語勢上的韻律感。

英九在此要特別指出，我們施政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公義的社會」。英九保證，只要涉及社會正義、環境正義與司法正義的問題，一定採取積極行動，回應人民期待。(總統府公報 6944 號，2010)。

英九要在此宣示：在兼顧國家安全與利益的前提下，將大幅放寬外來資金投入臺灣產業的限制；未來開放是常態，管制是例外。(總統府公報 7054 號，2012)。

今天我們推動新政，也要以同樣的血性與豪情，只要我們堅持方向，相互砥礪，風雨過後，必是晴天！（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馬英九以總統身分做出保證，為政策實施背書，為整體語勢做最強烈宣示，不僅用總統身分做語勢上的加強，同時搭配呼告，期望國家能在新政的推行下突破困境，也是加強語勢的作法。

這是因為「八八水災」有 700 多位同胞罹難或失蹤，我們感到就像失去自己親人一樣的哀痛，實在沒有心情舉辦國慶活動。（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一年來全國民眾節省電量 45 億度，相當於臺南縣市 187 萬居民的全年用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減少了 288 萬公噸，相當於 7,784 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總統府公報 6886 號，2009）。

在生硬的內政議題中，也出現不同的修辭方式。在莫拉克風災中，因為國內災情慘重，加上政府遭批評救災不力，馬英九政府即決定取消國慶慶祝典禮，面對慘重的災情和大量同胞罹難，將之比喻猶如喪親之痛。另外，在推行節能減碳政策時，前半部用數據呈現，再使用映襯修辭，讓環保政策的成果更加具體。

(六)小結

馬英九在任內六篇的國慶演說中，在五大議題政策性的宣示上，多採用排比、反覆等加強語勢的修辭方式呈現。雖然在用語上偶爾有生動的描述，但比例相當低，取而代之的是僵硬的政策宣示，以及數據呈現。

這樣的情況出現在外交、內政、經濟和兩岸關係上，使的在修辭上並沒有太多突出的變化，也顯得死板。其次，雖然馬英九在演說中常會使用「英九」自稱，頗有與聽眾拉近距離的意味。但是綜觀其六年演說，大量的數字呈現與用詞重複出現，雖然呈現出馬英九在演說中使用具體數據佐證的風格，卻讓整體的修辭用語和一般大眾之間不再親近。

五、內在分析：馬英九國慶演說組織方式

在馬英九六年的國慶演說中，原本國慶演說分為「總統講話」與「總統蒞臨

國慶大會致詞」，在 2009 年因莫拉克風災取消國慶慶祝活動後，兩者則合併為「總統講話」單一篇。

馬英九的國慶演說組織方式也隨著做出改變，在 2008 年首次上任發表國慶演說時，國慶演說的組織方式仍是依照「開場」、「正文」、「結尾」等簡單的架構作區別。

今天是中華民國的生日，九十七年前的今天，武昌起義的槍聲震醒了古老的心靈，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結束了五千年的皇權專制，開創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總統府公報 6826 號，2008）

在文章的正文的部分，則是針對研究中分出的五大議題「國家主體意識」、「外交」、「經濟」、「兩岸關係」和「內政」等議題做出論述。

今天我們推動新政，也要以同樣的血性與豪情，只要我們堅持方向，相互砥礪，風雨過後，必是晴天！

各位父老鄉親，現在讓我們一起呼口號：

台灣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文章的結尾，則是依照慣例由總統帶領現場所有聽眾，呼喊口號作結束。但這樣的組織方式在 2009 年時於講稿的編排上出現變革。

從 2009 年的國慶演說開始，講稿中即會點出今年演說的重點，如在 2009 年的主題是「挑戰中成長，重建中進步」，2010 年則為「改革、開創、追求公義」，2011 年適逢民國一百年，主題則是「百年奮鬥，民主台灣」。使用標題清楚點出演講主旨，而該年的國慶演說主軸也會圍繞在標題上。

不僅如此，在正文方面也用子標題分成好幾個段落和主題，如在 2009 年的國慶演說中，正文的子標題分別為「做好國土規劃，告慰罹難災民」、「打斷手骨顛倒勇，化危機為轉機」、「重建兩岸，擴大國際參與」、「開創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和「承先啟後，慶祝建國百年」。

在正文中這樣的安排，子標題不僅都呼應該年國慶主題，用子標題分類呈現

的方式，讓演說內容更容易做出區分，同時更有主題性。不過整體而言，除了多加了主標題與子標題的改變外，在演說上國慶演說的組織架構，大致上仍舊分為「開場」、「正文」與「結尾」三大區塊。



第三節 陳水扁與馬英九國慶演說的語藝類型比較

本研究針對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國慶演說進行內外分析後，歸納出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呈現的語藝類型，以下使用表格整理兩位總統於實質內容、風格形式和組織方式中異同之處。

一、實質內容比較

表-3 總統國慶演說實質內容比較

實質內容：議題與訴求	陳水扁	馬英九
國家主體意識	感性訴求：台灣精神	感性訴求： 中華民國為主體
外交	理性與可信訴求： 突破外交困局	理性訴求： 呈現政策成果
經濟	理性訴求： 宣示經濟政策	理性訴求： 數字呈現經濟成果
兩岸關係	理性與可信度訴求： 兩岸和解與威脅	理性訴求： 宣示政策、協議為主
內政	理性與可信度訴求： 宣示政策	理性訴求： 數字呈現政策成果

兩位總統在實質內容的表現上，陳水扁與馬英九在國家主體意識中，都是使用感性訴求，但在議題上卻大相逕庭，陳水扁談的是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精神，而馬英九則是以中華民國為主體，著重於國家歷史脈絡。另一項雙方同中有異德訴求則出現在經濟議題上，都是使用理性訴求，不過陳水扁著重於使用文字宣示經濟政策，馬英九則大量使用數據呈現經濟政策結果。

其次，出現較多差異的則在兩岸關係與內政議題上，陳水扁以理性訴求和可信度訴求並陳，多訴諸宣示政策並加入個人可信度加強宣示效果，馬英九則多以理性訴求為主，目的則都在於宣示政策結果。

最後在外交議題上，雖然是屬於偏重政策面的議題，陳水扁以理性訴求和可信度訴求為主，馬英九則仍是維持理性訴求，大量使用數據呈現施政結果。

二、風格形式比較

表-4 總統國慶演說風格形式比較

風格形式：議題與修辭	陳水扁	馬英九
國家主體意識	反覆、排比 語勢澎湃	反覆、排比 語勢澎湃
外交	呼告、比喻 用語生動	略語、排比 肯定語氣
經濟	反覆、排比 肯定語氣	比喻、設問、排比 用語生動
兩岸關係	映襯、比喻 用語生動	專語、排比 語勢澎湃
內政	排比 語勢澎湃	反覆、排比、映襯 肯定語氣

兩位總統在國家主體意識上所使用的風格也一樣，多使用反覆、排比來加強語勢。外交議題上，陳水扁呈現的風格較馬英九生動許多，使用比喻法和呼告闡述外交困境。馬英九則是為呈現外交政策施政結果，多以排比與大量略語呈現簽署的協議和結果。

從風格形式的比較中，陳水扁在兩岸關係的風格形式中，使用的修辭較為生動，馬英九則專注於兩岸政策的政績宣示，因此多使用專語與排比法。相反的，在經濟這種偏政策面的議題上，馬英九的修辭反而比陳水扁生動許多，除了一般的排比外，還使用了比喻與設問法。內政議題的風格形式上，兩位總統多以宣示政策為主，陳水扁使用排比呈現，馬英九則多了反覆及映襯法。

三、組織方式比較

表-5 總統國慶演說組織方式比較

組織方式	相同	相異
開場	使用祝賀語 問候現場嘉賓	重大天災取消慶典(馬英九) 首次國慶宣示歷史意義(陳水扁與馬英九)
正文	對過去施政檢討 宣示政府政策 闡述施政政績	受國內情勢影響使用劣語、取消國慶(陳水扁) 首次國慶闡述議題互異
結尾	展望未來 呼喊口號	百年國慶講述歷史意義與個人典故結尾(馬英九) 講述詩詞做結(陳水扁)

在總統的國慶演說中，組織方式的類型相當固定，結構上都是以三大區塊作為區分，分別為「開場」、「正文」和「結尾」為主。其中開場不外乎問候現場文武官員、典禮主席、外國使節和歸國僑胞，並多使用祝賀語。內文則是在各項議題、施政進行檢討、宣示與闡述政府施政結果，結尾則再度使用祝賀語、展望未來，並且帶現場來賓呼喊「中華民國萬歲」或「台灣加油」等口號。

儘管國慶演說在結構上相當固定，但在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任總統任內，仍有因外在事件影響或特殊年分，讓固定的組織結構出現相異之處。在開場部分，兩位總統在首度上任並且為第一次主持國慶典禮上，陳水扁不單只是使用祝賀語作為開場，還加入相當篇幅闡述國家首度經歷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的重大歷史意義。馬英九則在首度上任的國慶演說中，以相當篇幅闡述中華民國的建國歷史脈絡，隨即帶到國家目前遭逢嚴重的經濟風暴為開場。兩位總統在首度上任的首

次國慶演說中，少了佔大多數的問候、祝賀語，反而以不同的方式闡述新政府上任的歷史意義。在 2009 年馬英九第二次的國慶演說中，因國內發生慘重風災，馬英九不僅取消國慶中樞典禮，當年國慶演說也不已祝賀語開場，改以沉痛語氣宣布國慶將取消多數慶祝活動。

在國慶正文的相異之處上，陳水扁在 2006 年國慶演說中，因為受到在野黨嚴重杯葛，不僅少了政策上的宣示，反而多了許多情緒性的發言，暗喻國內政黨惡鬥導致國慶也受影響，甚至在國慶典禮這類儀典演說上，罕見使用劣語抨擊在野黨的行徑。國慶在正文的呈現，除了在議題表現上互異外，兩位總統在首度上任的首次國慶演說中，正文的編排上由於首度上任還未有任何實質政績，陳水扁在正文呈現上，不以各項議題為主而是闡述族群融合、國家民主歷程與台灣精神為主題。馬英九則是以國家當前經濟、國際和兩岸局勢等外部事件為主，並提出呼籲和信心喊話。

最後，在結尾的相異之處的呈現上，陳水扁在 2001 年的國慶演說中，朗讀台灣本土詩人的詩作做結，闡述台灣的歷史意義而非帶領來賓呼喊口號。馬英九在任內經歷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特殊年分，結尾雖然也帶領來賓呼喊「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但在呼喊口號做結束前，還特別加入個人與國家的故事典故。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語藝取徑中的類型批評法，針對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分別於實質內容、風格形式與組織方式三部分進行講稿內容的內在分析。另外則是對總統陳水扁與馬英九任內，於國慶演說中提及的重大新聞事件、兩岸政策和相關國內情勢做外在分析。

本章將彙整第四章的內、外分析結果，對本研究所提出的三項研究問題依序回答。首先將針對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講稿中，於內在分析三項實質內容、風格形式與組織方式等重複出現的內容建立類型。並比較兩位總統在處於相同的國慶情價下，所展現的語藝類型異同之處。

其次，再綜合外在分析中的重大新聞事件、兩岸政策與國內情勢比較，觀察兩位總統在不同的兩岸政策和國內情勢影響下，在國慶情境中展現各自的語藝策略。再探討在國慶情境下，來自不同政黨的兩位總統，政黨立場對他們在國慶演說中的語藝是否產生影響。最後，針對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提出說明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陳水扁與馬英九國慶演說語藝策略類型之異同

歸納出陳水扁與馬英九在實質內容、風格形式、組織方式等三項類型後，接下來則是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也就是這兩位來自不同政黨的總統，在相同的國慶儀式情境下，所表現出的語藝類型有何異同之處。以下將先說明兩位總統在語藝類型上的異同之處，究竟哪些類型受制於情境，哪些類型又展現出個別之處。

(一)、實質內容：國家主體意識、經濟、受制於國慶情境

在第一章節中，說明總統在國慶演說中重要的目的，即是向國人宣示過去政府所做的政策以及未來的施政目標，同時另一個目的即是說服大眾認同政府所提出的理念。

在第四章分析的過程中，將國慶演說分為五大議題分別為：國家主體意識、

外交、經濟、兩岸關係與內政。經過實質內容歸納後發現，在國家主體意識和經濟議題上，兩位總統所使用的訴求是一致的。在國家主體意識中，雖然兩位總統在論述主體上，陳水扁以「台灣」為主體，馬英九則是以「中華民國」為主體。

不過在國慶演說的情境之下，為了喚醒社會大眾對國家意識的認同，兩位總統一致的採用感性訴求，以情緒強烈的口吻，希望打動民眾對國家認同或本土認同的意識與情感。

另外在經濟方面，兩位總統均採用理性訴求為主，由於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總統上任之初，都同樣遭遇全球性的金融風暴襲擊，加上經濟議題是偏向政策面的宣示與論述，因此兩位總統都是以理性訴求作為經濟議題的語藝策略，一方面宣示政策，一方面提出數據說明國家經濟體質與競爭力，希望說服大眾能支持政府當前提出的經濟政策，也希望說服大眾對國家的經濟前景能夠具有信心。

(二)、實質內容：外交、兩岸關係、內政訴求出現差異

在五大議題中，就外交、兩岸關係和內政議題上，兩位總統在實質內容的訴求應用上則出現差異，陳水扁在這三項議題中，雖然主要仍以理性訴求為主，但也使用個人可信度並陳，馬英九方面則是都以理性訴求為主。

研究結果發現在論述的目標上的不同，讓兩位元首在訴求上出現差異性的結果，例如，陳水扁在外交議題上的目標，是希望突破當前的外交困境，期盼不再受到中國大陸和國際的打壓，因此在理性訴求之外加入個人可信度訴求，向外提出呼籲，爭取更多的國際空間。

馬英九在外交議題上則訴諸活路外交政策成果的展現，而非突破外交困境，因此馬英九使用理性訴求為主，呈現活路外交在多國免簽證、協議上的具體成效，由於馬英九政府採取與中國大陸外交休兵政策，不如過去陳水扁政府採取的烽火外交策略，使兩岸在外交場域上針鋒相對。馬英九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兩岸關係和緩情況下，反而將論述重點置於外交成效上，而少了以個人可信度的呼籲。

內政議題中，馬英九單純採用理性訴求，以大量數據呈現在施政上的具體成果。陳水扁則又是以理性和可信度訴求並陳的方式呈現，會加入個人可信度訴求

的原因，從外部分析中可以窺見，陳水扁在無論是在第一或第二任期間，都遭遇相當嚴重的朝野惡鬥，也迫使陳水扁必須在國慶演說當中，多次以總統的身分公開呼籲，希望政治能回歸平靜不再陷入兩黨惡鬥的泥淖，社會的對立衝突能夠降低。這樣的結果同樣也在兩岸關係議題上展現，陳水扁同樣也為了兩岸關係浮浮沉沉的關係，多次以總統身分公開呼籲，希望兩岸能和解與和平；而馬英九則完全偏重於使用理性訴求，呈現政策的具體成果。

(三)、風格形式：國家主體意識受制於國慶演說情境

在風格形式類型的展現上，兩位總統在五大議題中使用的方式多元，唯獨國家主體意識上的類型一致，前述提到在國家主體意識中，偏重的是情感、情趣的展現，因此實質內容使用感性訴求為主。

在風格形式類型中，兩位總統都是使用排比、反覆等修辭手法，加強在語勢澎湃與情感上的力道。但可以發現，兩位總統在國家主體意識上，不論是實質內容或是風格形式上，使用的類型都受制於國慶演說情境而趨於相同，但是在論述的主體上卻大相逕庭，相關差異將在下一小節中詳細說明。

(四)、風格形式：外交、經濟、兩岸關係、內政等議題應用多元風格

相較於在實質內容類型中單純的類型展現方式，在風格形式上，則因為修辭手段應用的不同，兩位總統在修辭的應用上也相對多元。

陳水扁與馬英九在風格形式中，對於消極修辭的掌握一致，用語都能掌握明白、準確和適當等原則。在修辭的應用手法上，陳水扁在用語上較馬英九親近且生動。在用語上陳水扁多自稱阿扁，拉近與聽眾間的距離，同時適時的運用比喻、映襯搭配讓用語生動，即便是在偏重政策面宣示的議題，修辭運用也不會顯的生硬。

馬英九在修辭手段上，除了國家主體意識議題外，其餘四大議題均偏重在政策成果上的呈現。尤其不論在哪一種議題，均大量使用數據做為論述方式，同時也使用大量的專有名詞或是省略語，雖然在呈現上顯得精要、具體，但專語、略語和數字上的大量使用，卻容易讓演講者與聽眾間拉開距離，也容易讓聽眾產生

混淆。

(五)、組織方式：受國慶情境影響 組織方式固定少變化

國慶演說屬於儀典演說，受到國慶情境的影響下，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在組織方式上，組織類型呈現上都相當固定，大抵分為「開場」、「正文」和「結尾」三部分。但即使組織方式類型固定，兩位總統的組織方式中，仍有受到外部因素影響而出現不同變化，例如兩位總統在首次上任首度主持國慶演說的組織方式上則有不同呈現方式，或是受到外部因素如在野黨杯葛、重大風災而必須縮減或取消國慶相關慶祝儀式等，在組織和內容上才出現部分變動。

二、陳水扁和馬英九的兩岸政策與語藝策略

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中，第二項即是在不同的兩岸政策主張下，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元首身處相同的國慶儀式情境下，如何各自展現其語藝策略？

關於這點，特別將五大議題中的「兩岸關係」議題拉出來談。從外在分析中可以得知，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各自承接其發展脈絡，陳水扁從剛上任訴求兩岸必須走向和解的道路，經過「一邊一國論」、「廢除國統會、國統綱領」等多項風波後，陳水扁主政下的兩岸關係，逐漸走向緊縮的道路。

馬英九在陳水扁後上任，甫上任也是以兩岸和解為主要訴求，並在兩任期中均是以一貫經貿議題和開放的走向始終未變。在外在分析的脈絡下可以發現，兩岸關係議題中，不論是在實質內容和風格形式上類型都不相同，論述的目標也不一樣。

陳水扁在兩岸關係議題中的實質內容與風格形式上，由於兩岸關係的搖擺與動盪，八年執政期間的國慶演說中，實質內容上不斷重複以兩岸和平為理性訴求，並不斷以個人可信度訴求提出呼籲，希望兩岸能走向和解、撤除飛彈。在風格形式類型上，陳水扁則是使用映襯、比喻方式論述，將中國大陸形容為專制獨裁、恐怖陰影等形像，台灣則是象徵民主、開放自由，呈現出兩岸極大落差與對立層面。陳水扁的兩岸關係政策也影響到外交議題的呈現，由於兩岸關係的惡化，導致對岸中國大陸在外交場域上也處處打壓、排擠，導致我國外交空間遭嚴重限縮，

迫使陳水扁必須使用個人可信度訴求的方式，在外交議題上頻頻提出呼籲，希望突破外交困境。

馬英九對於兩岸關係的處理，始終著眼於兩岸的經貿關係、協定，鮮少出現大幅度的變動，雖然在語藝類型上的呈現較為單調，以理性訴求或是專語、排比呈現政策實施的結果。同樣結果也出現在外交議題上，穩定的兩岸關係，不再與中國大陸與外交場域上互相打壓競逐，反而著重在實質協定、免簽上的推動，也讓馬英九在外交議題上，仍是以理性訴求、排比的方式呈現其政策推行成果。

三、政黨立場與國慶儀式情境對總統語藝影響

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來自政黨立場迥異的民進黨與國民黨，兩位總統政黨立場截然不同，在上述的兩岸關係議題可以看見其差異外，政黨立場對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帶來最為顯著的影響，即是在國家主體意識的議題上。

在國家主體意識的議題中，經由類型的歸納可以發現，陳水扁與馬英九不論是在實質內容或是風格形式上，其類型都相當一致，實質內容都使用感性訴求，風格形式均是以排比、反覆來加強語勢。

不過，政黨立場卻讓國家主體意識在論述的主體上有極大的落差，民進黨與國民黨最大的差異，即是來自於對國家統獨立場間的差異。因此，可以發現來自民進黨的總統陳水扁，在其八年的國慶演說當中，甚少提及中華民國反而都是以台灣代替，並且在國家主體意識中，特別強調台灣精神、台灣經驗等本土意識。

馬英九則站在另一個極端，在國家主體意識議題中，主要以中華民國作為主體，雖然也曾出現台灣二字，但也是在中華民國作為主體的脈絡下進行連結。面對國慶情境的限制，政黨立場雖然沒有推翻、改變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當中呈現的類型，卻直接影響類型中各自論述的主體與目標。

第二節 討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演說情境與政黨立場影響力

本研究發現，情境因素對於演說者在議題的呈現方式上有很大的影響力，例如總統在談及相關國家政策及議題時，不一定只會在國慶演說中談論，也會在元旦文告、就職演說或是其他場合。但相同的議題在不同的場合上談論的方式也會隨著情境而產生變化。

亞里斯多德曾經依照演說情境不同，經情境區分為「法律性」、「政治性」與「儀式性」情境三種。在本研究中，總統的國慶演說被界定為儀典演說之一，在亞里斯多德的分類中，屬於儀式性情境的一環。

然而，作為一位總統，在國家體制之下發表國慶演說，在儀式性的情境下，依照類型批評的假設，總統在國慶中的演說理應依循著相對應的演說類型前進。本研究在分析卻發現，儀式情境外政黨或政治立場卻在其中發揮另一項影響力。

因此，透過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的國慶演說可以發現，儀典演說的情境新加入政治性情境的因素，讓國慶演說不再只是單純的儀典情境，而是混合儀典情境與政治性情境的混合型情境。

例如陳水扁在任內國慶演說中，加入大量有關於「獨立」的因子與論述，加強對台灣主體意識的描述，這是在政黨輪替之前未曾發生過的情況，也可以明白國慶演說中出現獨立等政治性論述情境，是與陳水扁背後的政黨色彩有關。

再回到本研究的分析中，來自政黨立場因素的影響也出現在特定議題上，例如在本研究中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對於兩岸政策都抱持開放態度，但因政黨立場在統獨認知上的差異，對於兩岸關係議題的呈現方式也大相逕庭，陳水扁將兩岸形容成兩個極端，自由與專制的落差，強調兩岸要開放得先平衡之間的巨大差異。馬英九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則不會強調兩岸間的落差，甚至也極少談論對岸的威脅，反而不斷強調兩岸得更加密切的合作。字裡行間都可看見政黨立場在其中運作的軌跡。

然而，對於研究中所謂的政黨立場影響，目前認為最明顯之處在於政黨間對

於統獨立場的極大差異。但是在對於總統以及國慶演說的研究中，不僅僅只有國家主體意識和兩岸關係受到統獨立場影響，其他如內政、外交、和經濟等議題和政策，政黨間恐怕都還有統獨以外的立場和主張，但過於細碎和複雜，僅僅只能以最為顯著的統獨立場做探究，雖然看似研究上的限制，卻也是未來相關研究可繼續探究的路徑之一。未來的研究當中，若能加入更多不同總統的國慶演說文本，不一定侷限於不同政黨間的總統，即使是同黨籍恐怕也在各項議題上各擁不同立場，以致對於國慶演說的類型帶來影響。

最後，綜合以上所述，我國總統的國慶演說中，儀典演說的情境已經不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反而是來自總統背後的政黨立場、政治性情境的因素，成為左右總統在國慶演說中語藝類型表現上的重要因素。

二、個人風格的影響

在對陳水扁與馬英九國慶演說的內容，進行內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兩位總統在國慶演說當中，各自展現強烈的個人風格，例如陳水扁在演說中，獨樹一格的自稱「阿扁」等親近的自稱，一改過去總統謙稱「本人」或是名字的方式，一改在以往在儀典演說中較為嚴肅的論述方式。

另外研究還發現，馬英九在國慶演說當中，相當喜愛使用數據呈現任何議題和政策結果，就連談論國家主體意識上，馬英九都相當喜愛運用數字，例如對於國家歷史年分一一點出，在外交議題上對於幾月簽了幾項協議，或是達成多少國家的免簽證協議，內政上甚至連國軍出勤數目、救出災民人數、排碳數量、省電幾億度，馬英九在論述上都算得一清二楚。與陳水扁大多單純使用文字敘述政策的做法上，馬英九在這方面展現出強烈的個人風格。

本研究分析中發現，政黨立場的政治性因素成為影響總統國慶演說的關鍵因素，卻也發現陳水扁與馬英九除了在政黨立場出現差異外，兩位總統在個人風格的表現上也各自鮮明。

在這次的研究中，著重於情境與政黨立場帶來的影響，建議未來的研究上，可加入個人風格對演說帶來的影響，將有助於探討個人風格與情境之間是否也相

互影響，甚至是個人風格可能突破情境限制，而出現不一樣的類型方式。

最後，我國在 2000 年後至今，已經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從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的內外分析中可以發現，國家在政黨輪替之後，兩位總統最終卻也都陷入藍綠二元的爭鬥中。政治性的藍綠因素，也出現在儀式性為重的國慶演說中，甚至成為左右國慶演說語藝呈現的重要因素。

未來，我國在政黨政治的運行下，同樣會再度遭遇政黨間的輪替更迭、交替執政，政黨立場等政治性的因素，是否持續如何影響國慶等儀典演說語藝類型的發展，希望在未來的研究中能夠持續關注。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桃芝颱風創全台 至少 43 死 113 失蹤〉，(2001 年 7 月 29 日)。《中國時報》，要聞 1 版。

〈納莉重創台北 至少 31 死 15 失蹤〉，(2001 年 9 月 18 日)。《中國時報》，要聞 1 版。

TVBS 民調中心。〈2004 總統大選選前十天民調〉。上網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
取自 http://home.tvbs.com.tw/poll_center。

TVBS 民調中心。〈油價 電價上漲民調〉。上網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取自
http://home.tvbs.com.tw/poll_center

TVBS 民調中心。〈馬總統連任就職前滿意度民調〉。上網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
取自 http://home.tvbs.com.tw/poll_center

TVBS 民調中心。〈馬總統滿意度民調(美牛、禽流感爭議)〉。上網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取自 http://home.tvbs.com.tw/poll_center

TVBS 民調中心。〈國民黨撤銷立法院長王金平黨籍 馬英九總統滿意度〉。上網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取自 http://home.tvbs.com.tw/poll_center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總統就兩岸和平協議議題召開記者會〉。上網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取自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626>

內政部消防署網站。〈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應變處置報告第 74 報〉。上網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http://www.nfa.gov.tw/main/List.aspx?ID=&MenuID=556>。

王光慈(2013 年 7 月 16 日)。〈馬英九重話 徹查管教不當〉，《聯合報》，A1 版。

王秋婷(2010)。《政治模仿秀之幽默語藝分析：以全民最大黨為例》。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美華(2008)。《馬英九政府與陳水扁政府的大陸政策比較研究》。政治大學國際

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齊賢(2005)。《馬英九語藝視野研究：1998 年—2006 年演講文本分析》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年代民調中心。〈「民眾對王金平被撤除黨籍後續發展看法民意調查」〉。上網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取自 <http://survey.eracom.com.tw/item/i126.xml>。

朱沛淳(2006)。《候選人競選期間危機傳播策略之研究—以 2005 年彰化縣長選舉為例》。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慧君(2003)。《情境、形象修護策略與策略效果之關聯性研究：以男性政治人物之性醜聞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自由電子報。〈扁：和解讓台灣不再空轉〉。上網日期，2013 年 11 月 8 日，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may/9/today-fo6.htm>。

李允傑(2013)。《ECFA 後的兩岸關係中》。台北：麗文文化。

李明賢(2009 年 8 月 11 日)。〈救災一團亂 苦民所苦成口號〉。《聯合報》，A13 版。

李明賢(2009 年 8 月 19 日)。〈決策大致正確 馬：我在執行強有力領導〉。《聯合報》，A3 版。

李儼峰(2009)。《危機情境與危機溝通策略之研究—以陳水扁在扁案的辯解策略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汪莉娟、李春(2006 年 3 月 5 日)。〈賈慶林嚴批「法理台獨」〉。《聯合報》，A3 版。

林又唯(2002)。《危機事件中政府首長的形象修復策略與媒體呈現的評價：以台北市長馬英九處裡「納莉」風災為例》。《行政暨政策學報》，35，頁 235-265。

林柏婷(2007)。《中華航空公司形象修護策略研究：以民國八十三年至九十五年空難事件為例》。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美玲、彭威京(2002 年 8 月 5 日)。〈一邊一國撼動美中台 府院黨四階段滅火 陳總統擬再說明〉。《聯合報》，A2 版。

林淑玲(2006 年 6 月 8 日)。〈展現決不下台意志 扁主動宣布九月訪帛琉〉。《中國

時報》，A2 版。

林雅齡(2004)。《影響醫院面臨危機時所採取形象修復策略的相關因素探討》。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靜伶(2000)。《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林靜伶譯(1996)。《當代語藝觀點》。台北：五南。

邱燕玲(2007 年 1 月 27 日)。〈陳總統：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不違背四不〉，《自由時報》，A2 版。

邵宗海(2001)。《兩岸關係—陳水扁的大陸政策》。台北：生智。

邵宗海(2011)。《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台北：五南。

施懿珊(2001)。《李登輝總統言論之戲劇觀—從柏克戲劇五因語藝觀點分析》。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紀慧君(1994)。《我國元首論述中價值觀之呈現與轉變—民國三十九年到八十三年元旦文告之語藝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淑苓(2004)。《空難新聞報導之內容分析：一個危機處理的觀點》。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唐青(2007)。《台灣政治人物公開道歉語藝研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夏志芳(2010)。《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對美中台關係之影響》。中正大學戰略暨國家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

奚安鴻(2011)。《電視新聞 SNG 連線報導語藝類型研究》。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文興(2002)。《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語藝分析—認同與論辯》。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維憲(2010)。《民進黨政府的大陸政策困境(2000-2008 年)》。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銘謙(2001)。《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決策研究(1986.9.28-2001.5.20)》。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菁黛(2001)。《政治人物的辯解類型—以宋楚瑜在興票案的辯解策略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正杰(2005)。《危機情境、危機反應策略及策略效果—以台北市政府「捷運掀頭皮事件」及「邱小妹醫療人球事件」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宗智(2007 年 6 月 20 日)。〈美促扁徹公投〉，《聯合報》，A1 版。

梁惠娟(2008)。《政府危機處理之研究：一個辯解策略的運用》。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粘淑菁(2006)。《候選人競選期間危機傳播策略之研究—以 2005 年台北縣周錫瑋與台中市胡志強為例》。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智凱(2005)。《演藝人員之形象修護策略分析：以負面感情事件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靜怡(2006)。《風險認知、危機溝通策略與形象報導之關聯—以兩岸媒體對「杜邦鐵氟龍事件」的報導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俊男(2006)。《職棒簽賭在危機情境中的策略採用與效果分析》。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自創、紀碩鳴(2007)。《走出崎嶇路—馬英九及台灣兩岸新格局》。台北：風雲時代。

陳志平、林新輝、范凌嘉(2004 年 1 月 27 日)〈泛藍 14 縣市長反對「違法公投」〉，《聯合報》，A1 版。

陳忠賢(2009)。《馬英九政府大陸政策制定因素及具體實踐》。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東旭(2008 年 9 月 13 日)。〈大陸毒奶粉 25 噸進台灣〉。《聯合報》，A1 版。

陳芳儀(2007)。《政治人物的辯解類型—以總統陳水扁的形象修護策略為例》。世

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思豪(2008)。《陳水扁政府大陸政策變遷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春富(2007)。《政治領袖公共演說之傳播策略與效果—陳水扁與馬英九「總統罷免案」電視演說個案分析》，《臺灣民主季刊》4(4)，頁 109-141。

陳香玫(1999)。《衝突情境下公開信之類型分析》。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陳凌(2005)。《說服傳播—過程與實踐》。台北：五南。

陳敏鳳(2006 年 1 月 2 日)。〈府院黨研判 2008 前 中共無意與扁打交道〉，《聯合報》，A3 版。

陳聖雄(2008)。《台灣作文教學探究—以類型批評為研究取徑》。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靜華(2003)。《企業危機之形象修復策略與學習效果研究—以華航空難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曉珍(2007)。《政府危機溝通策略之研究：比較扁、馬兩市府團隊》。交通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其昌、劉永祥(2006 年 2 月 27 日)。〈避用「廢除」 國統會終止運作〉，《聯合報》，A1 版。

游梓翔(1999)。《演講學原理—公眾傳播的理論與實際》。台北：五南

游梓翔(2006)。《領袖的聲音—兩岸領導人政治語藝批評，1906-2006》。台北：五南。

游梓翔、溫偉群(2002)。〈從語藝取徑分析《獨家報導》在璩美鳳光碟事件中的形象修護策略〉。《世新大學學報》，12，頁 209-231。

黃雅詩(2007 年 3 月 5 日)。〈扁：台灣要獨立〉，《聯合報》，A1 版。

新華社網站。〈胡錦濤強調：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上網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7-10/15/content_6981908.htm

- 楊羽雯(2002 年 8 月 4 日)。〈陳總統：兩岸是一邊一國〉，《聯合報》，A4 版。
- 溫偉群(2007)。《總統電視辯論—語藝策略與類型批評》。台北：五南。
- 齊康玲(2010)。《馬英九政府大陸政策之研究》。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美玲(2005)。《NIKE 喬丹快閃事件之危機傳播與管理》。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歐振文(2003)。《形象修護策略之應用：國軍危機處理案例研究》。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練書瑋(2008)。《危機情境、形象修護策略與模糊策略之運用研究：以馬英九台北市長任內之特別費危機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朝明(主編)(2009)。《馬總統執政後的兩岸新局論兩岸關係新路向》。台北：遠景基金會。
- 蔡鴻濱(2000)。《衝突與回應：聯合報在三次退報運動衝突中論述之語藝類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又銘(2005)。《新聞論述建構之馬英九語藝視野》。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羽潔(2009)。《政治人物之道歉類型與形象修護研究：以 2009 年八八水災馬英九政府表現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戴育真(2009)。《閩南語演講比賽之語藝策略類型：以全國語文競賽為例》。世新大學口語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總統府網站。《總統府公報》。取自 <http://www.president.gov.tw/>。
- 謝進盛(2006 年 1 月 30 日)。〈扁：廢國統綱領 時機成熟〉，《聯合報》，A1 版。
- 韓婷羽(2012)。《危機情境、形象修護策略與效果之研究—以馬政府國光石化危機傳播為例》。世新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靜芬(2007)。《演藝人員危機傳播研究—以澎恰恰光碟事件為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鐘振昇(1994)。《領導式演講：以競選演說為師》。台北：遠流。

饒磐安、黃福其(2009年8月15日)。〈第七天了 中央看電視救災〉。《聯合報》，A2版。

二、英文部分

Benoit, W. L.(2005). *Generic rhetorical criticism*. In J. A. Kuypers (Ed.), *The art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pp. 85-106). Boston: Pearson.

Benoit, W. L., & Brinson, S. L. (1994). 'AT & T': *Apologies Are Not Enough*.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2, 75-88.

Beyer, J. M., & Trice, H. M. (1987). *How an organization's rites reveal its cultur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76, 4-25

Burke, Kenneth (Duva).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6, II, 653.

Campbell, K. K., & Huxman, S. S. (2003). *The rhetorical act: Think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critically*(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E.Black, *Rhetorical Criticism: A Study in Method* (Macmillan Co., 1965; rpt. by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78)132-34.

Foss, S.(2004).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3rd ed.).Long Grove,IL:Waveland.

Fairclough, N. (2000). *New Labor, New Language?* London : Routledge

F.I. Hill, "Aristotle's *Rhetorical Theory*. *With a Synoptsis of Aristotle's Rhetoric*," in James J. Murphy, et al.,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2nd ed. (Davis, CA: Hermagoras Press, 1995)51-109.

Hart, R. P., & Daughton, S (2005). *Modern rehetorical criticism*. (3rd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H.Zyskind,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the Gettysburg Address*," *Journal of General Eduction* 4(1950): 202-12.

Hart.P.(1997).*Modern Rhetoric Criticism*(2nd ed.).Boston:Allyn & Bacon.

K.K.Campbell & K.H.Jamieson, "Introduction to Form and Genre," in Karlyn Kohrs
Campbell & Kathleen Hall Jamieson, eds., *Form and Genre: Shaping
Rhetorical Action* 16-32

Kernell, S. (1997). *Going public: New strategie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3rd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Lewis, D. (1997). *The two rhetorical presidencies*.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5,
380-395

Rybacki, K., & Rybacki, D. (1991). *Communication criticism: Approaches and gen-
-res*. Belmont, CA: Wadsworth.

Rosenfield, L. W. (1968). *A case study in speech criticism: The Nixon-Truman analog*.
Speech Monographs, 35, 435-450.

Van Noije, L & Hijmans, E. (2005),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in New
Year's Speeches of French Presidents", *Communications*, 30, 23-54

Ware, B. L. & Linkugel, W. A. (1973). *They spoke in defense of themselves: On the
generic criticism of apologia*.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9, 273-283.